

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 ——嫫祖诞生地还有争议的最后确证原理

天文杨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y-tx@163.com

Abstract: 摘要: 要解决类似李进副省长提出的“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 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难题, 面对国内国外的各自为阵, 说明不是一批专家单纯用史料和文物能决定下来的。本文借用“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来科学解读, 是几十年间笔者与各派专家交流的最新感受。

[天文杨. 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 ——嫫祖诞生地还有争议的最后确证原理. *Academ Arena* 2019;11(11):35-110].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5. doi:10.7537/marsaaj111119.05.

Keywords 关键词: 科商 青藏高原 维京人 天下人 摇钱树

0、前言

上海“观察者”网从2019年1月15日开始连载的《“70年对话 5000年”之中华早期文明》的长文值得一读。该文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教授对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主要民族社会历史人文地理演变的原理大分析, 很有深度。2019年5月18日--5月31日笔者到“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尼亚+俄罗斯”旅游, 这之前读文扬教授的该连载文章, 总还觉得有美中不足之处, 但说不出来。旅游期间一路听北京国际旅行社领队李志杰导游(留学俄罗斯, 生于哈尔滨), 瑞典导游段博士(已入瑞典籍, 留学澳大利, 生于山东省)和圣彼得堡导游宋美博士(生于哈尔滨, 圣彼得堡大学留学)讲古“维京人”在欧洲和世界打拼的历史, 觉得有意思。

2019年6月16日在绵阳市“王子大酒店”参加“第七届四川省嫫祖文化活动暨古蜀文化研讨会”, 听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会长段渝教授作《巴蜀艺术与近东文明》、西南科技大学李德书教授作《东汉以前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物佐证》、雷波县总工会苏杰兵主席作《古蜀文明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之我见》等报告, 以及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进同志讲话, 提到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 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 她希望我国的专家学者能最后确证下来。李德书教授也提到有关大禹的“涂山”除在四川北川外, 还有省市多说。

6月14日连载的《70年对话 5000年(11):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 该怎么理解?》一文, 似乎能把古欧洲“维京人”与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与现代争论中的不确定的难题联系起来, 作类似原理性科学分析, 供抛砖引玉。

1、什么是“天下人”?

笔者说的“天下人”, 泛指“中华民族”, 是借用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 5000年(11): 中国

“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 该怎么理解?》文章中, 他对文明原理分析总结的归类。文扬教授说: 在汉人看来, 匈奴是“蛮夷之人”, 居于“苦寒之地”---典型的无天下的定居文明, 如历史上的印度社会, 有大规模的定居, 但支离破碎、各成一体, 不成天下。典型的游牧-游猎文明, 例如历史上中国北方的戎狄或诸胡和欧亚大草原上的各个骑马民族社会, 没有固定的都城和要塞, 只有移动的毡帐。典型的游商文明, 例如历史上往来于欧亚非三大洲枢纽地带, 使用骆驼以及地中海上使用船舶的各个行商民族的社会, 城市就是商路驿站, 经济就是长途贩运。典型的游盗文明, 例如历史上西北欧和俄罗斯一带, 专以入侵南方定居社会家园, 并鹊巢鸠占为能事的森林里的蛮族社会、草原上的骑马民族社会、或海上的海盗民族社会---这里文扬教授说的就是与“天下人”的“中华民族”相对的北欧导游们讲解的“维京人”。

文扬教授还说: 他系列文章一直在交替使用以下几个概念说明中华文明的唯一性: 一个是唯一延续的文明, 一个是“广土巨族”, 一个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这就是“天下人”说概念的来历---第一个, 是流行已久并流传很广的定论; 第二和第三个, 是他本人近几年创造出来并尝试着用于理论建构的---他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在论述中三个概念会交替使用, 但在逻辑上, 这三者却不是并列的。在他的概念体系中, 前两个其实是后一个的结果---“广土巨族”是文明的空间特征, 5000年延续未中断是文明的时间特征, 归根结底都源于“天下”型定居文明这个本质。因为是天下定居, 所以最终形成了广土巨族; 因为是天下定居, 所以生存下来并发展至今。概言之, “天下”型定居文明, 是中华文明区别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为了清楚地论述这个问题, 需要界定一些基本概念: 从逻辑上讲, 天下与无天下相对, 定居与游动相对, 广土与狭土相对, 巨族与小族相对, 文明延续与文

明覆灭或中断相对，文明社会与蛮族社会相对，农耕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渔猎社会和畜牧社会相对，中原与草原地带、森林地带、戈壁地带和高原地带相对。

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5000年》，阐述中华文明诞生历史是一个“天下”型国家---“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文扬教授的这一思想与赵汀阳教授的书《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和杜钢建教授的书《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以及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等中的思想，是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是对新时代党中央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的响应。

这是一种新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梳理和探索，他们各自的缺环可相互补充和校正---如杜钢建教授等推动的“人类文明起源于湖南热”，与巴蜀远古文明及中华各民族人，“本是来自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那里的河流和堰塞湖因大地震溃坝形成远古巴蜀盆塞海，及其远古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和远古联合国”不矛盾---杜钢建教授说：“从历史文物看，关于有巢氏记载的历史文物有四川绵阳地区盐亭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龟碑。该碑相传是禹王时期所立的盘古王表石碑”---杜钢建教授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揭示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也推翻了20世纪考古发现所带来的判断，即北非与亚洲，包括西亚两河流域、东亚大陆的中国，同属于世界农业起源中心。对此“天府学”也赞成谢维扬教授的《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文中的意见：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这需要新世纪的古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

如《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初探》文章中说：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的贡嘎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是有区别的。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

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贡嘎山雪人”约200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代约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

其次，出生在四川盐亭县的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何拔儒曾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盐亭县梓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作为具体考古平台，提出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假说。他说这种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巴蜀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是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中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

第二个孵抱期“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文明，有没有形成原始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文中的解读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斯克兰顿说：“过去也没有一个人人类学家会去把一个简单的部落涂鸦和神秘的科学图表进行比较。但是当这样的比较一旦发生，我们就会发现二者令人惊奇的相似”。

斯克兰顿对多贡文化研究提供的模板，正好供我们去理解非洲多贡人与四川贡嘎山“雪人”的现在品种繁多的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科学之间的联系。因为在远古嫫祖发明“丝绸”和开辟“丝绸之路”，类似“高科技”---多贡人物理的贡嘎山解读比较---如果我们不怀疑原始的非洲多贡人有“高科技”的需要---因为最基础物理、数学原理，是不分时间、空间、物质、能量，逻辑也都能成立，是一种抽象思维“智力”，更是自然运动的组合，不然宇宙也不会诞生出“人”这种复杂的东西。在《被禁止的科学》一书中，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解读多贡人的许多物理学的例子和方法，都可以联系华夏上古文明，和新中国解放后70年来的事情，作比较学解读。

例如，斯克兰顿的《物理学家多贡人》后半部分，抬出国际主流前沿科学的“弦理论”来作评判标准，这使他和嫫祖之间获得有了一个共同的比较基础---丝绸也类型“弦”。斯克兰顿在《物理学家多贡人》中说得很清楚：“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走在了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是一些微小的一维闭合圈，即闭弦，

这些闭弦像橡皮筋一样按不同速度在振动。这些振动反过来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量子力和基本粒子……根据弦理论，能量弦的一个功能就是产生粒子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重力、电磁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在每年一次的宗教仪式上，多贡人会在地上画一个图形用来代表阿玛神的 266 个种子或者符号。这个图形由一个大圈和大圈里面的一个小圈所构成。在这两个圈之间的空间里画满了一系列的曲线……这个完成的图形和现代科学所画的量子弦的一种典型的振动模式图非常相似”。由于研究嫫祖不是国家主体或国际主体的科学，而是在没有科研经费和弦论专业培训下的社会基层的业余自学；独立研究弦论的道路，也类似是非洲“多贡人”——是“贡嘎山”多贡人，研究丝绸“弦论”。

非洲多贡人，生活在马里中部高原尼日尔河的一条近 200 公里长的有河湾的大峡谷。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思维》书中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一种与现代人类思维一样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和富于理智的思维方式，有其存在价值和理由。即原始人类也具有很强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例如多贡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就很强，多贡人弦学的思想体系要比绝大多数的其他非洲民族来得更为抽象，而连接古今一带一路。如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科书，但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如文扬教授说：秦汉不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秦汉之于中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历史——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物。而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

2、什么是“维京人”？

维京（Vikings）一词带有掠夺、杀戮等贬义。维京人对欧洲历史尤其是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

据“百度百科”解释：维京人，古挪威语：vikingar，别称北欧海盗——他们从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不列颠岛屿，其足迹遍及

从欧洲大陆至北极广阔疆域，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 Age）。在古英语中，“viking”是在海湾中的人，而“wicing”代表海盗；“vikingar”在冰岛的土语中也意味着“海上冒险”。

维京人的老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麦，开始只是打劫西欧大陆沿海的修道院，后逐渐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有组织的入侵，从爱尔兰到不列颠，从法国到东欧，维京人的身影随处可见，除了征战，维京人还是伟大的航海家，向西他们逐渐发现了冰岛和格陵兰岛，并最终到达北美。向东他们一度到达了里海，最早见于历史记载中的维京海盗，是在公元 789 年一次对英国的袭击，当时他们被当地官员误认为是商人，这些海盗杀死要向他们征税的官员。

第二次记录是在公元 793 年。以后 200 年间维京不断地侵扰欧洲各沿海国家，沿着河流向上游内地劫掠，曾经控制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据说他们曾远达地中海和里海沿岸。其中的一支渡过波罗的海，并远征俄罗斯，到达基辅和保加利亚。有些船队远航至里海，前往巴格达和阿拉伯人做生意。而更为著名的一支维京人向西南挺进，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掀起轩然大波。他们大肆劫掠不列颠群岛，并且还向欧洲大陆进行了侵扰。11 世纪时的德国海盗们在西兰岛聚集了大量的黄金，这些海盗被他们自己人称为维京（阿斯考曼尼），向丹麦国王纳贡。13 世纪时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一世将这些海盗从苏格兰及附近岛屿清除出去，部分维京人逃到冰岛。

北欧的传说将维京人描绘成无畏的英雄，但到了 18 世纪的传奇中又把他们描绘成强盗——他们被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业余去做海盗，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可能这些人只是非法的强盗。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斯拉夫人中的海盗逃亡落脚在北欧。维京人从他们在斯堪的那维亚的老家散布开来，会以龙船——因为在这种小船的船头和船尾雕上龙头而得到这个称号——横渡海洋并突然作出攻击。

他们会先作出突袭然后洗掠，在任何庞大的抵抗部队能作出攻击之前就会自行撤退，不过他们的行径却逐渐变得更为大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占领并定居在欧洲重要的地区。身为异教徒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害教士和掠夺教会的财产。一般人都会惧怕于他们的无情和残暴，他们就像来自地狱的魔鬼。在当时，他们是卓越的工匠、水手、探险家和商人。维京的老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麦。他们和后代曾一度控制了大部份的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的内陆、法国的诺曼底、英国、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他们在 825 年时发现冰岛并在 875 年定居下来。985 年他们又在格陵兰殖民。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五百年，他们就曾到达纽芬兰并探索了部份北美地区。

1) 文扬教授谈维京人“海洋行国”分化延伸

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解读，定居等于文明，游居等于野蛮，这组恒等式在文明史上长期成立——在地中海地区，亚述人和希腊人的古代文献都记录了在他们定居区周边四处游动的蛮族部落。罗马时代也是如此，他们将所有的非罗马人都称为野蛮人。但这种分化是在世界的另一端的地中海，大约在中国的商周之际，毁灭掉东地中海沿岸各个定居王国的民族，却主要不是骑马民族，而是一种乘坐船只的“海上民族”。文扬教授认为：相对于地中海的城市文明，海上民族毫无疑问属于蛮族，而且与骑马民族一样，属于游居的蛮族。正如那些游走在大陆上的游团一样，人们根本无从知道他们的行踪。

他说埃里克·H·克莱因写道：除了埃及人的文献记载之外，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对于海上民族的起源我们也无法确定：一说源自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一说来自爱琴海地区或安纳托利亚西部，甚至塞浦路斯或地中海东部地区。迄今发现的古代遗址中从未找到他们的发源地或出发点。我们推测，这些人一直在不停地迁移，所经之处，一个个国家和王城皆被征服。在埃及，虽然拉美西斯三世成功击溃了海上民族的进攻，可是整个国家也被拖得精疲力竭，滑向了衰弱和分裂。最终的结果，不过是蛮族以某种“和平渗透”的方式，在此后两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而在希腊地区，却是“突然死亡”的方式，曾经毁灭了米诺斯社会的迈锡尼社会这一次遭遇了更为彻底的文明毁灭，“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黄金销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样式也已弃而不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地中海世界与这些海上民族，长期以来完全不在中国人的视野之内。

中国人不知道，与自己所在的中原类似，在地中海也有一个定居农耕社会和游居蛮族社会相互混合的“天下”；在那个以海洋为中心的“天下”，定居社会沿海岸呈半环形分布，而中心区域却留给了游居的蛮族——海上民族。在东亚，最终秦国统一了中国；而在地中海所对应的事件，就是罗马海军击败了迦太基海军，成为地中海唯一的海上霸主，将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内湖。布匿战争是海洋霸政的杰作，尽管迦太基英雄汉尼拔以劣势兵力围歼优势之敌给罗马以沉重打击，但罗马海军所创造的接舷战，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海洋争霸史。此后在地中海历史上出现的一代又一代强权，通过在地中海上无数次罗马模式的激烈海战，磨砺出一种特殊的战争能力。就像草原行国通过经年累月的草原作战培养出横扫一切的铁蹄政策一样，海洋行国也通过持续的海战获得了从海洋上发起进攻的炮舰政策，并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将这种政策强行施加在了

原本没有持续性海战传统的所有地区。围绕地中海这个“海洋中原”的海洋行国争霸战，持续了约 1000 年，直到伊比利亚人从大西洋方向冲了出来，先后绕过了诺恩角和好望角，打破了原来的小天下格局，进入了大天下新时代。

此后，在历史上就不再有两个大洋而只有一个大洋，并且从那以后世界贸易就转到了跨大洋的水手们手中，因为货物经由海上运输更节省能量。文明的又一个伟大进步就此得以实现。达·伽马从印度回来后，不到五年时间，过去常常带来香料的来自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的桨帆船，进入威尼斯港时就成了无货可运的空船。在他回来后的 12 年内，葡萄牙完成了对东印度群岛的征服，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海和马六甲海峡被击败，葡萄牙在印度沿岸建立了自己的势力。直到这个时期，中国人才第一次在闽粤外海遇到了来自西方海洋行国的舰船。由于从来不了解海洋行国的情况和它们的海洋争霸史，从那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与最初遭遇草原行国时类似，中国也先后经历了惨痛的失败；在 19-20 世纪之交，一时间各大海洋行国齐集中原居国，让中国度过了一段堪比于公元 4 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最黑暗时期。

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些游居的海上民族始终未被定居的王国打败，事实上，正是由于海上民族的长期传统，当地中海地区各个强国先后崛起时，都发展成为了拥有强大海军的“海洋行国”。关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争霸战，即希腊与波斯之间的萨拉米斯海战，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写道：一个海上民族只能通过一个海上强国去征服。因此，波斯最后是使用其属地的船只，尤其是腓尼基人的战舰，也有西利西亚人甚至埃及人的战船，试图征服大海另一边的希腊。但是，与波斯相比，希腊是一个更为典型的海洋行国。在战争开始时，小小的海上城邦国家雅典竟然完全放弃自己的城市，所有市民全部集结到海上与波斯人决战；最终结果，是更懂得海洋的希腊摧毁了偏重大陆的波斯，迫使波斯舰队在数量仍然占优的情况下收兵撤退，从此失去了制海权。从此以后，海上民族各自为战的时期被此起彼伏的海洋行国称雄争霸时期所取代，地中海这块海域成了地中海这个“天下”的中原；逐鹿中原的争霸战，在这里成了制海权的争夺战。

2) 维京人特征的早期记录

公元第八世纪的后期，丹麦人攻击和掠夺英国东北海岸的在林狄斯芬上有名的海岛修道院，这种攻击和掠夺开始成为趋势。由于突袭英国、法国和日耳曼的规模和次数增加，因此逐渐变成入侵。从公元 780 年开始，维京人越来越多的外出活动。他们需要更多的贸易市场，需要更多的掠夺场地。他们主要偷盗牲口和谷物，也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

财宝。他们迅速出击，得手后同样迅速的离去。附近的居民深受其害，将维京人视作蛮人，冷血的战士。

A、维京小镇考古维京人

2014年5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瑞典南部海岸小镇 Foteviken 生活着一群维京人，他们沿袭着古代维京人的生活方式，却也热爱和平，悠闲的生活方式也是自得其乐，引来不少游客参观。

维京人，又称为北欧海盗，是一群凶猛的战士，以其可怕的海上攻击和难以置信的创造能力闻名于世。Björn Jakobsen 是一群生活在瑞典马尔默的现代维京战士的领头人，他和自己的子民向世人展示，维京人的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维京人从未走远。

Björn 和他的维京战士们在这个小镇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在周围的田野工作，工作完后尽情喝酒。并且，如果某个维京人某件事做的好，例如成功地将船靠岸，就会得到烈酒和肉类食物的奖励。小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海盗维京人的生活，但只有一部分内容不允许重现，那就是发动突袭。但现代维京人也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Björn 说：“欧洲各地都有现代维京人，我们会去拜访他们，参观彼此的集市，交换维京人的工具”。

B、维京人社会记录

维京人的社会体系包括三个阶层：王侯，多为大领主，世袭的贵族。自由人，军队的主力，武士阶层。最底层的奴隶。但这种划分不绝对，一个自由人可以变成奴隶，如果他丧失了所有自己的份地。一个奴隶也能变成自由人，忠诚侍奉主人，就会得到赎身的机会。贵族与自由人定期开会，决定重大事件，解决争端。最早的时候，国王是最大的贵族，他做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以至于部族会议只负责一些地方事务。但在冰岛，由于从来没有国王，部族大会决定一切，全岛的贵族与自由人都要参加，每年定期在某个地方召开，为期两周。

维京人无条件接受国王和大会的全部法令，这些法令为每个人所熟知。违背的人将被开除出部落。被放逐者，不能耕作任何土地，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们只能住在山洞中，过着躲藏、偷盗的生活。

C、维京人军事记录

从孩提时代开始，维京人就喜爱种种竞争激烈的游戏，他们比试马术、举重、划船、操帆和游泳，每年的部族大会同时也是北欧的奥林匹克。最热衷的运动是摔跤，划出一片空旷的场地，中央放置一块尖头的界石，比赛的双方用力将对方推到石头上。此外他们还比试射箭、滑雪、溜冰。所有这些比赛，都是为了锻炼出更加强壮的战士。哪怕冬天躲在屋里玩的游戏也是如此，从阿拉伯流传来的棋盘游戏，内容总是围绕着攻守技巧。维京人是强悍

的战士，他们的人数较少，于是就得依靠周密的策划与出其不意的突袭。在战斗中他们又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狂热，悍不畏死，于是人们谈海盜色变。

他们的突击常分成两节：先在远距离上投掷长矛；然后用剑和战斧做近距离的了断。在海上相遇时，海盗遵守古老的传统，一声不吭的将船系一起。在船头搭上跳板，然后依次上场单挑，每个走上跳板的人都面临这样的命运：或者将对方统统杀光，或者自己战死，由后面的同伴替自己复仇。如果感到害怕，可以转身跳进海里，没有人会追杀逃兵，但放弃战斗资格的人与死者无异，从此连家人都会忽视他的存在。因此排在船头第一个上阵的，通常是最精锐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赤裸上身，发着粗野的吼声，忘情的享受战斗的酣畅。他们知道，脚下的跳板浸透着祖辈的鲜血，自己的后代也会落脚在同一个地方。愤怒使维京海盗显得强大而骇人，这种战士即被称为狂战士。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种原始的战斗会激发出这么惊人的人类本性，狂战士的故事被代代相传。战斗中生存下来的男人慷慨分享胜利。

维京人的第一位国王名叫哈罗德，绰号细头发，他统治的地域就是今天的挪威。一个夏天他出发去讨伐打劫他领地的海盗，征战时间过长，以至不得不在奥克尼（苏格兰北部岛屿）过冬，顺带就占领了苏格兰、设得兰和赫布里底群岛。第二年开春大队人马要回挪威，这位国王就把新的领地交给罗根伐德伯爵统治，因为这位伯爵在远征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因为齐格尔德伯爵在战斗中救了他一命，所以罗根伐德又把领地谦让给齐格尔德伯爵。今天苏格兰还有以齐格尔德命名的港湾。

D、维京人文化记录

北欧海盗喜欢听故事和诗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纪录历史。每个部落中有人专门记录这种故事，并编写新的传说。将这些冗长的故事用文字刻到骨头上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维京人在漫长的冬季躲在屋子里讲述父辈流传下来的故事。职业的艺人或吟游诗人四处采风，参加每年三次的节日，也参加婚礼和宴会。这种场合总需要歌唱与舞蹈，讲故事的人会得到某种形式的礼物，戒指或者项链。他们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夸张，某人杀死了屋子那么大的野猪；某主妇一天挤完了一千头奶牛。维京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值得描述的功绩不是已经做了什么，而是能够做些什么。

北欧人喜欢玩文字游戏，他们的沙加满是比喻的复合词，用来指代某种事物而不用直接提到名字。比方说，剑被称为战斗调料，这样的比方让后世的考古学家迷惑了很久。他们还喜欢猜字谜，交换各种字谜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维京人信仰很多神

灵，有男有女，不同神灵照看着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他们时不时的在各处显灵，让适当的事情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发生。故老相传，神灵都住在一个叫阿斯加德的地方，相当于天堂所在。在地底的世界自然也有地狱，叫做尼夫海姆。海盗们坚信，如果一个男人光荣战死，灵魂就能进入天国阿斯加德的神宫瓦尔哈拉，勇士的英灵在那里饮宴、欢歌、讲述传奇。如果生为战士而很黯淡的是死在床上，那就只配进地府。

从这点出发，维京人相信人死不过是去另一个世界旅行，他们就在死者的墓穴中堆放很多的陪葬品，供其路上花用。有吃有穿，各式工具，诸般兵器。更有甚者，如果死的是国王或者了不起的大英雄，会将死者生前的战船与之一起埋葬，即是很有名的“海盗的葬礼”。维京人认为，在动物中亦埋藏着神性，他们据此将动物分成善良的和邪恶的，相信幽灵的存在，地精和大地精也来自维京人的神话。维京人相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他们将这些先知称为真言者，这些隐士居住在偏远的乡间，受着四方膜拜者的供养。

E、维京人的帐篷

维京人过着家族生活，父母子女祖孙姑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们彼此忠诚，家族中的一员受了欺负，全家人就一起去部落大会要求公正。如果一名男子被杀，他的家族多半会要求得到金钱或是土地的赔偿。如果部落大会认为他们确实有权力做出这样的要求，凶手的家族爽快的付了赔款，那就万事照旧；但如果死者的家族觉得裁决有欠公正，他们就会私下里杀死对方的一名成员，于是怨怨相报，没完没了的世仇可能成为古老家系的额外传统。

女性谈婚论嫁由全家人决定，但她有权力从列出的清单中挑选一名。婚后她还保有以前的财产，并且在丈夫出远门时负责照看家里的土地。离婚很简单，夫妇俩发表一个声明，当着公证人的面说清他们离异的原因。有些理由看来很可笑，比方说有丈夫抱怨他的妻子老是穿裤子而不是裙子。孩子们则与长辈住在一起，直到他们成年后，出去加入另一个家庭。在这之前，男孩子学习耕作、战斗技巧和航海术，以及工具和武器制造；女子则学习纺织布，制作黄油与奶酪。

大多数维京人平时是职业农夫，他们住在乡间。荒蛮之地没有大城镇的概念，只有少数几个重要的港口如约克和博卡，更多的维京人与其家族一起生活在小农场上。根据记载或者挖掘到的遗址，可以复原当年的房屋，发现所有的农场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主建筑是幢长方形的屋子，考究一点的，会额外增加一些独立的小屋，充当牲口栏和手工作坊，农夫在作坊内自己制造工具和武器。

在早期的长屋中，只有一到两个房间，全体家

庭成员就在一间屋子工作、生活。并且与饲养的牲口混居在一起。这样的屋子一般有 20 米长，6 米宽。厕所同时也是浴室，北欧人喜欢洗蒸汽浴。正对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火塘，全家做饭或者取暖都在这里。这间屋子同时也是储藏室。每面墙上固定着木质的长椅，白天坐、晚上睡，底下还堆放着各式杂物。每户人家有一到两张高背椅，只有一家之主才有资格坐坐，或是来了什么特别尊贵的客人。除了见过世面的国王以外，北欧海盗没有床的概念。

长屋中阴暗潮湿，没有地板，踩的就是泥地。北方苦寒之地，树木稀少，偏偏石头都很少见，维京人垒墙用的是草砖，即将草和泥土的混合胚子稍加烧制，在冬季这种砖很保暖。有些人家在砖墙内侧用木板再做一道夹墙，中间要空开一段距离，以免木板受潮发烂。长屋通常有两扇门，窗很少，实在要有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窟窿。可以自由开合的窗户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余的装饰。全部的采光来自门，火炉上方为了排出炊烟的小孔。夜晚照明用蜡烛，但是用动物的油脂做的，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点起来，可想而知是什么味道。

妇女在屋里纺线织布，所有衣服都是家庭手制的，手巧的主妇会加上较多的装饰。她们把羊毛或者亚麻纺成线，织成布。用蔬菜汁染上不同颜色，无外黄、黑、绿、褐、蓝、红等鲜艳的颜色，维京人喜爱这种醒目。最后将布剪裁成衣服。整个过程复杂漫长，所以每个人没有几件衣服，身上所穿的连续用上好几年。其实日常维京人的衣服只要舒适就好，并不讲究式样，弗论什么时尚，以至于数百年的时间中，他们的装束一点没有改变。

大多数农场规模是很小的，依靠单独的家庭经营。较大的农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夫可以雇用没有土地的自由人，或购买奴隶。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至今没什么变化：春天播下种子，晚秋收获。不能留过冬的牲口在秋天最肥壮的时候被宰杀，肉经过熏、腊、腌的方式被保存下来。农夫的另一种身份是海盗，劫掠与耕作相交替。海盗每年外出两次，春播或秋收之后，妻子会顶替他在家中打点一切。冬季的气候总是很恶劣，北欧人躲在屋里修补工具，缝制衣物，硝制兽皮。当时家居的遗址和维京人的垃圾堆还有保存的，揭示了他们的饮食结构。维京人的主食以肉类和鱼类为主，他们饲养猪、鸡、鹅、鸭、牛、羊，得到肉、奶、蛋，偶尔还打猎捕鱼。他们种植黑麦和大麦用来做面包，用甘蓝和洋葱作调味品，此外还有大蒜和水芹。他们用木杯或镂空的牛角喝啤酒、牛奶以及一种用蜂蜜自制的酒。一天照例吃两顿，早上 8 点左右是早餐，晚上 8 点左右是晚餐。全家人聚在一起，用木制的锅碗瓢盆做饭。维京人用刀和勺进餐，但没有叉子。

H、维京人的船

维京人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船有密切联系。维京船制造的材料主要取自高大笔直的橡树。维京船分为战船和货船两类。战船较轻，船窄，灵活轻便，又很耐风浪；而货船的船身又高又宽，船体也很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载重航行时可保持稳定。两类船都有通常所说的弯曲船首，用一整块完整的橡木精雕细刻而成。

G、维京人奇怪的信仰

一是维京人相信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一个巨人的臭腋窝里的汗变的；天空是由四个矮人在四座高山上托起的，那四个矮人的名字叫：东、西、南、北。二是维京人相信在战争里死去的维京人死后会登上维京天堂，那里有桑拿、美酒、盛宴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在战争外死去的维京人会被贬下维京地狱，在那里，维京人会被关进一个寒冷刺骨的狭小空间里，全身被锁链锁着，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除了山羊的尿），头顶上每秒都会滴毒液下来。三是维京人相信他们的神“索尔”，曾经男扮女装去欺骗一个巨人，那个巨人偷走了他的神锤，索尔要把他的锤子骗回来，令人吃惊的是，他成功的夺回了他的锤子。

M、维京人的贸易

维京人的农场出产几乎全部日常生活用品，从工具到衣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擅长制造某种器具的人慢慢成了专门工匠。他们随处开设店铺，但铁匠的铺子总在镇子的边上，因为炉子有失火的危险。工匠生产的器具经过更多的装饰，他们制造工具、武器和珠宝。维京的珠宝享誉至今，有很复杂的制作工艺，胸针通常是用白蜡为胚，白银或青铜浇铸，加以打磨制成，上面镶嵌彩色的石子或者珠宝。琥珀和染色的小石子可以制成项链。黑玉和绿松石则制成骰子和筹码，用来下棋，来往的货郎冲州撞县的兜售这些做工精美的首饰。维京人与很多地区保持着贸易上的往来，考古学家从北欧的墓葬群中也找到了不少别的产品与钱币。不过他们更加喜欢白银，商人随身带着天平，用银块充当砝码。

石刻与传说记载了他们的旅行：公元 860 年，沿着伏尔加河下溯的维京人来到了俄罗斯（其时还不叫俄罗斯）。他们同当地的斯拉夫人作交易，从诺夫格罗德南下，沿河来到波尔加，用奴隶换取蜂蜜和毛皮；再顺着伏尔加河进入里海，换乘骆驼，一直来到巴格达，交易丝绸和香料。另一条贸易路线是沿着第聂伯河到达基辅，进黑海，到达盛产葡萄酒、丝绸，出售精美的珠宝首饰之地。维京人是很好的水手和船匠，相比较，别国的船去不了远海，设计也很笨重。维京人的船分量轻，船身狭窄，吃水浅，可以在欧洲所有河流中航行。

维京人在冬天建造或者修补他们的船只，通常

在露天建造，偶尔会搭个工棚。船身和船桨用橡木制造，桅杆用松木，可以在大风中适度的弯曲，先用整条原木加工成龙骨，以保证强度。弯曲的头尾单独加工，然后用铁钉固定到龙骨的两端。接着在龙骨上架好横梁，就完成了整条船的轮廓。沿着轮廓在船的两侧铺上蒙板。这种整条的木板层层相楔，上面一层刚好覆盖住下面一层的边缘。最上层的蒙板开凿了若干小孔，五米长的木桨从孔中伸出。最后铺上地板，架上桅杆，在桅杆顶上装上金属制的风向标。槽则安装在船体后部的右侧。船帆的两侧挂上麻绳编制的网，防止船帆在强风中撕裂。这样的船最常见，全长 20 米左右。水手们随身带着一个小箱子，装着衣物和武器。划桨的时候就坐在上面，但他们很少划桨，他们是操帆的好手。

每艘船的首尾都有一个舱室存放食物，储藏着黄油，奶酪，啤酒，淡水，肉食，苹果和干栗。此外还有各种炊具，帆具和上岸用的帐篷。他们穿着毛皮大衣，就在船上和衣而睡。船上还能生火做饭，用一个装满沙子的盒子做炉灶。在海上，他们用日月星辰做方向标。天气差的时候也用指北针，一块简单磁化过的铁片。在维京人漫长的旅途中，船是他们移动的家。桅杆可以放倒，蒙上船帆就是很好的帐篷，海盗们甚至像阿尔戈英雄一样扛着座舰前进，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因为水运更省力，可以运载更多的人和装备。

不能坐船的场合他们就骑马，沿着古罗马的驿道前进，或者他们在冬日出门，可以借助滑雪和溜冰。用鲸鱼骨制作冰刀，绑在鹿皮鞋底上就成了冰鞋。雪橇可以运载病人和老弱，或者大量的装备。不管怎样说，他们讨厌步行，因为既慢又要背负沉重的行李。为什么维京人一直在旅行，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天性使然，更得到公认的看法就是，他们在寻找着可耕作的土壤。北欧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家之主死后，长子继承家业，别的儿子成年后必须离开兄长，自己组建家庭。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北欧原本不多的耕地更加不敷使用，于是维京人四海为家，寻找着好的地方开辟农场。

3) 维京人在西欧和罗斯公国

在公元第六和第七世纪，维京人开始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作出突击，然后再安置下来。到了公元八世纪的末期，他们就从今天的俄罗斯遁河而下，展开长期的入侵，并沿途设置要塞来作防卫。在公元第九世纪时他们统治了基辅，并于 907 年以二千艘战船和八万人的部队攻击君士坦丁堡。不过他们被拜占庭的皇帝以最优惠的贸易条件成功收买。维京人奥列格与 9 世纪中叶--12 世纪 30 年代，在东欧平原上建立的以基辅为首都的早期封建国家基辅罗斯，又称古罗斯、罗斯国。当地人管新来的维京人称为“罗斯人”，意思为“精于航海的人”。这是最早

的俄罗斯国家，当时它只是一个南自基辅、北到拉多加湖，西从普斯科夫、东到木罗姆的一个东欧内陆小国。

笔者在从北欧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转圣彼得堡旅游的路上，听李志杰导游讲：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大国，前苏联解体后，80%的财政靠石油和天然气涨价支撑---当时油价高达约260美元一桶，后来美国制裁伊朗，油价跨到约60美元一桶，俄罗斯几乎支撑不住。是中国与俄罗斯签订长期合作，以约120美元一桶大量购买石油和天然气。

众所周知，俄罗斯在欧洲的地块并不比其它西欧国家的地盘多产石油和天然气。那么它的石油和天然气从哪里来？从东亚及西伯利亚的巨大板块来。其实在元朝灭亡到清朝兴起的17世纪前，从东亚及西伯利亚的巨大板块，还是属于中华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管辖。是“维京人”的侵略扩张，才改变了亚洲面貌。所以今天西方把“维京人”记述历史上的海盗抢劫、贩卖奴隶、侵略扩张等行为，看得有价值。

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开始向周边扩张领土，随着多民族帝国的形成，这种“救世”的使命感和“第三罗马”的思想，就根植俄罗斯历代统治者，成为对外扩张的理由和动员民众的口号。今日的俄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就说：“俄罗斯的确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俄罗斯应当南下，到达印度洋沿岸。这不是妄想，这是俄罗斯的命运。这是地缘政治，我们的发展需要这么办”。

A、维京人在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

公元789年，一伙维京海盗洗劫了多赛特郡，从此英格兰就受着不断的骚扰。当地人与强盗英勇的战斗过，但更多的时候，他们缴纳赎金，让灾星快快离去。但钱不是总可以解决问题的，海盗有好几股，这个大王离去，另一个头领翩翩登场。在防守薄弱的地区，维京海盗很是猖獗。当阿尔弗雷德大帝执政威赛克斯期间，他跟主要的维京部族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定居在英格兰东北部的地区。即便如此，脆弱的和平还是时时被打破，因为每一方都想得到更多的土地。

在865年大批的丹麦军队入侵英国，并一直控制大部份的英国地区达两个世纪。在1066年之前，喀奴特是整个英国里面最后的国王之一，他同时统治了丹麦和挪威。在871年，另外一支庞大的舰队从塞纳河溯流而上攻击巴黎。他们围攻这个城市达两年之久，最后才被巨额的现金报偿所买通，并被允许可以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之下，掠夺法国的西部地区。海盗的族群众多，意味着劫掠永远不会停止，哪怕是加涅特，挪威和丹麦的国王，征服了英格兰之后，他的领地还是常常被瑞典的海盗骚扰。不胜其害之下，这位强大的君主也不得不缴纳赎金。

苏格兰离北欧很近，公元795年奥克尼群岛被维京人占领，然后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海岸线为海盗所控制。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与挪威的贸易路线，并且以此为落脚点，向更西部发展。

苏格兰是挪威人的天下，相安无事。爱尔兰复杂很多，挪威人、丹麦人还有爱尔兰海盗都不是好相处的角色，于是常常爆发大规模械斗。直到公元902年，挪威人才暂时离开爱尔兰，所以说暂时，是因为他们于公元917年就卷土重来，占领了都柏林作为贸易港湾。1100年都柏林才被诺曼人接管。但是众所周知，诺曼人正是丹麦海盗在法兰西留下的后裔。

B、维京人在法国及诺曼底公国

公元911年法国的国王让诺曼底的维京首领成为公爵，以换取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停止入侵。他们还建立殖民作为继续突击的基地。在法国西北方的维京人的殖民地，即一般所知道的诺曼底，在那里居住的人就被称为诺曼人。法国国王查理先是老实交付了赎金，后来又学着英国人的做法，把最大的海盗头子罗勒封作诺曼底的大公---这位老兄是征服者威廉一世的曾曾曾祖父，他的后裔在1066年终于成为英格兰的国王，即早期北欧挪威、瑞典、丹麦和俄罗斯的“维京人”，是学习更早期的后来叫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地区的“维京人”发展的。自从诺曼底的公国成立后，就不断出现“卓越的战士”，包括在1066年征服英国的威廉一世、在1060年和1091年之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西西里的罗伯吉士卡特和他的家族，和由十字军战士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鲍特温一世。

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带着诺曼底士兵踏上英格兰，他的暴戾连海盗都望而生畏。北海固然是满目疮痍，维京人越过直布罗陀，在地中海沿岸继续肆虐。与强大的对手做生意，面对弱者就成了盗贼。这些不法之徒甚至打劫修道院，因为修道院中总有大量储藏的食物与财宝，僧侣又不动手反抗。沿着欧洲海岸线前进的维京海盗成了整个欧洲的噩梦。公元844年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在康多巴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反登陆，伊比利亚半岛从此风平浪静，只有和气的维京商人来交易葡萄酒和奴隶。

C、维京人在冰岛

挪威维京人离开家一直往西远航，寻找新的家园。公元860年他们来到冰岛，原先住在这里的僧侣在一片恐慌下纷纷出逃。公元920年他们来到格陵兰开始定居，但那里的气候一年比一年寒冷，不能种植庄稼，终于1500年全部的维京人离开了这块冰冻的岛屿。

D、维京人在美洲

维京人寻找北欧人到过美洲大陆，有证据称，1969年在丹麦的一个海盗墓中，找到了一枚石制的

箭头，后经测试证实确为美洲的产物，海盗们确实到过北美洲——人们常认为哥伦布是第一位发现新大陆的旧世界人，但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早在哥伦布登陆美洲的五百多年前发现了新大陆的存在。据说他们是在到达了格陵兰之后，再向西行，到达今天之加拿大。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有用之物资，包括木材、葡萄、毛皮等的东西。不过他们在美洲大陆待了大约十年之久，就离开了这个物产丰盛的大陆了。原因是他们在美洲大陆生活了不久，就遇上了印第安人。好勇斗狠的维京人与他们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导致他们的报复，而这个比维京人更早到达美洲大陆的民族，最终也成功把维京人赶出这片丰饶的土地。再次入侵美洲大陆的，就是五百多年之后，带着旧世界的枪炮刀剑及农耕技术而来的其他欧洲人。

3、文扬教授对“天下人”原理的阐述

“观察者”网转载文扬教授的《“70年对话5000年”之中华早期文明》，对“天下人”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演变原理的阐述，很有独到之处。例如，他说：在空间上，全新世气候到来之后，文明在地球表面不同地区先后出现。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面临不同的气候变迁、地质变迁和动植物变迁，文明的演化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如黑格尔所说的，各民族历史都有自己的“地理基础”，或杜兰特所说的“地理是历史的子宫”。

1) “天下”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科学概念

文扬教授说：不同文明虽然被理解成为与不同种族、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与不同文化的盛衰兴亡保持同步，相互之间有了对照和比较的意义。但文明与文化不同，与政治的昌明关系更大。其次，虽然一般来说文明本质上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而且一个文明可能包含多个政治单位，但对于中华文明这个“天下”型定居文明来说，文明和政治实体几乎是重合的、一体的。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中国“自命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作为最为持久、最成规模的定居农耕文明，始终离不开一个能够履行维持秩序、制定法律、确立制度、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等职能的政治实体。

在很大程度上，中华文明就是靠中华政治传统支撑的，中华政治传统所致力于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正是中华文明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两者密不可分。今天的学者们在说到他者文明或异质文明时，往往缺省地联系到西方文明，自西学东渐、西力东击之后，关于中西文明互为他者、互为镜像的文章著作就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但实际上，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上，西方文明进入视野不过是近几百年的

事，而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间内，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面对的他者文明，是欧亚大陆干旱带上的草原文明。所以，要讨论中原定居农耕社会，必须同时讨论与之相对的草原骑马民族社会。

但这里文明也还包含有“科学”区分，这是“政治”背景的学者不愿意说或含糊解读的——事情不简单是，现代人类历史开始于20万年前智人的出现，而农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大约1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人类历史95%的时间并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狩猎采集，人类过上依靠驯化动植物维持生计的农业生活，也是最近5%的历史里才发生的事。好比一个活了100岁的人，95岁之前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最近5年才相对稳定下来，不再四处迁徙了。而95岁之前的他，还经历过两次漫长的冰川期。第一次从大约他不满1岁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不不到40岁的那年。但刚刚才暖和了几年，第二次冰川期又来了，从他45岁那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他92岁半。这也就意味着，可怜的他95年四处流浪狩猎采集生活中大约90%左右的时间，还是在严酷的冰川环境中度过的。

需要记住的是，95年来各种环境通过压力和刺激所引起的所有基因突变，都在他今天100岁的身体里。相比之下，那些自由在地四处迁徙、杀气腾腾地围捕大型猎物、所到之处天当被地当床万物皆备于我的狩猎采集者，不是与此前95%生命历史里的演化逻辑更为一致吗——1215年的亚洲大陆，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帝国之外，中国北方是通古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中国南方是中原汉人退守南方后以杭州为都城建立的南宋；西北部的甘肃和鄂尔多斯是西夏国的领地；塔里木河西北居住着回鹘人；楚河一带由喀喇契丹帝国统治；整个伊朗由花刺子模的苏丹统治；塞尔柱苏丹们则瓜分了亚洲剩下的地区。

虽然此时距离1万多年前最早的定居社会出现已经很久了，距离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起源时期也已经过去几千年了，但实际上，13世纪的这几个社会，仍然各自保持在从文明初期就开始分岔的演化轨道上。南宋之时，程朱理学正盛。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大纲不正，万目即紊”。“名分正则天下定”。朱熹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二程和朱熹都没看到南宋灭亡。但即使是北宋，在当时也是个收缩的、偏安的“小天下”。南宋时更是退到了淮河，连华夏族发祥地中原都丢了，“登临莫向高台望，烟树中原正渺茫”，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大天下”早已不可相提并论了。

设身处地为其时的士大夫们想想，家国天下破碎如此，大纲名分紊乱如此，还在继续坚持“天下

之定理”、“纲常千万年”毫不动摇，真是不容易。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了两点：一、中华政治中的正统性观念，与定居文明的本质极为相符，根本不能动摇；二、中华文明中人，对于自身文明的信仰极其坚定，根本不会动摇。什么是正统？欧阳修说，“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意思是：天下是地缘概念，不是血缘概念，民是天下人的概念，不是某一族的概念。

所以，王者是华夏人还是蛮夷戎狄，并不重要，王者是正还是篡，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能够“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这固然好；可是如晋、隋，王者不得其正，但乱世里奋力而起，有功有德，最终也合天下于一，所以也是正统。70年对话5000年，今天回顾地看，中国历史上“王者不得其正”的情况很多。不正，名分不正、上位手段不正、种族不正、包括阶级不正，都算。但是在中国社会，这些不正而王的情况都能接受。因为中华政治传统中有“民贵君轻”和“天下为公”的思想，“合天下于一”才是终极目的，“一”就是“公”，就是“同”。而天下不是别的，就是万民，与天地合为一体的万民。而与一块土地建立起家园关系的定居，则意味着无论自然界所赋予的植物生长季多长多短，定居者都要通过耕种和养殖，将土地上的生长改造成能够符合自身的生活需要。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既然定居在了这里，就再也不离开了；既然转变成了农民，就再也不回头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开始了一场席卷全部家园土地的农业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从各民族普遍的图腾崇拜，很快转向了地理方面的山形祭祀、山镇祭祀、封禅行典、五岳行典，直到中华民族独有的岳镇海渚祭祀。而“天下”这个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正是从“五岳四镇”、“四海四渚”、“大小九州”等这些地理观念中自然而然浮现了出来。这也正是中国定居农耕社会“家--国--天下”三层结构的由来，没有大规模的定居和农耕，不太可能建立起从家国到天下的固定联系。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完成了从神意政治向天意政治的转变？而天的观念也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的人格神转变成了“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的抽象物？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定居农耕生产生活与家园土地这个地理环境之间形成了固定联系所导致的。

概言之，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不变，天也就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纲常千万年——这里文扬教授用“天不变，道亦不变”，解读就是为什么程朱理学即使在南宋“小天下”、“小朝廷”之下，仍讲得那么“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就有缺憾：因为它还有一层科学解读的是：“天变了还是天，

地震了还是地”，才是“道亦不变”的双赢意思——“地震”过后，地上还是需要勤劳才能致富——天变黑了，第二天还是天，爱国爱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合天下于一”才是终极目的，其“道”是不能变的，没有“颜色革命”之说。

2) “天下道”的胜利——中华蒙古族入侵欧洲失败

“天变了还是天”的“道不变”更科学精明的话对不对？事情是中原定居农耕社会几千年了，而中华的蒙古族，是公元9世纪才似有似无从那个被称为“蒙古地方”的位置出现——与“天下人”城市的不可比性，如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尧都，绝对年代主体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以上。所发现的宫城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墓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年代更早的良渚古城面积290万平方米，如果包括外城，面积竟达到800万平方米。

而当时的中华的蒙古族人，一个真正的城市也没建设过。其他如典章文物、礼器乐器、文学艺术、饮食服饰……所有代表文明程度的东西，更是不能比——他们是仿效代表欧洲“维京人”，游动社会新一代的“缩影”——此起彼伏、到处出现的“游动社会”，从未在文明历史中缺席。与定居农耕社会在演化路径上分道扬镳之后，游动社会通过诞生出骑马民族，最终又以更加强势的介入，回到了文明演化的主流中来。定居农耕社会中出现了城市，这是文明演化中的一个突变。按说这个突变，可以将游动社会远远甩在后面。但是上帝没那么仁慈。与定居社会中城市的出现相对应的，是游动社会对马的驯化——与城市代表的演化方向正好相反的一个突变。考古学家发现大量马匹的遗骸，在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带公元前4200--前3700年的德瑞夫卡遗址，这说明马匹的驯养并且用于坐骑大约在公元前5到前4千纪，时间在车轮发明之前。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公元前4到前3千纪的一个村落里所挖掘出的所有的动物遗骸中，有99%属于马的遗骸，这表明那儿的人们曾专门进行马的培育。

第一个成功驯化了马匹的部落到底是哪一个？这已经没办法考证，但回顾地看，这个部落却位列于最早打开人类历史潘多拉魔盒的人群之一。可以说游动社会的农业发展，到了马的驯化和使用这个阶段，不仅与自己过去徒步进行狩猎采集的历史拉开了距离，而且反过来形成了相对于定居农耕社会的竞争优势。在整个欧亚大草原，对马匹的驯化，让这一地区从东部到西部成为了一个覆盖面积巨大的文化整体，考古学家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区发现了具有惊人相似性的文化遗存。他们有些是定居农耕部落，有些是狩猎采集部落，有些则是赶着牧群、依照季节的变化作定期巡回流动的早期游牧

部落。

但是自从实现了对马的驯化之后，出现了一种文化统一的趋势，过去是哪一种生活方式变得不重要了，马、大草原、弓弩和金属刀剑共同造就出来一种新型人类——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好战的“骑马民族”——文扬教授的这种区分也存在科学遗憾：中华蒙古族并不是真正像欧洲同时期的“维京人”，而含有学习效仿的成分多。就像很多历史书说，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欧洲文明起源于海洋文明一样。因为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才是“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的原理。

因为在到了青铜器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被考古学家们统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民族”的新型人类，在中欧亚地区的势力急剧膨胀，四处出击。亚述人和希腊人的古代文献记录了这些四处游动的蛮族部落，并分别命名为“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塞种人”日久天长，一个离开了马的草原人等于废人，而一旦坐到了马背上，废人就变身成了超人。“骑马民族”相对于所有徒步的民族——特别是“天下人”在战争中的优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车和卡车的出现才宣告结束。历史上先后出现的那些大的征服，如喜克索斯人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匈人对欧洲的征服、欧洲人对北美洲大陆的征服，无不是建立在马上战士相对于徒步战士的战斗优势基础之上的。之所以在13世纪的蒙古族是历史上所有“骑马民族”中最伟大的征服者，正是仿效代表欧洲“维京人”游动社会新一代的“缩影”——如果联想到不仅是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动社会，同时还有森林里游猎民族的游动社会，还有游商民族的游动社会、游盗民族的海行游动社会，那么定居农耕社会本身的文明和政治传统就应该从独特性上来考察，而不是从“维京人”的人种普世性上来考察。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超级智能脑，是全人类之间一个统一的“外围脑”。70年对话5000年，为什么中国政治传统追求“大一统”，追求“天下为公”，追求“小康”和“大同”，而不特别强调“自由”、“权利”和“个体主义”，就因“外围脑”的人类文明起源，存在有相对非洲的第二个孵抱期，以致出现在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合一的时期——从而归根结底，也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性出现的使然——通过对定居农耕社会与骑马游动社会之间的文明对比，可以更深地解释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传统的独特性。能解答李进省长说的嫪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所以处在“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这个二元论的对比中，今天的中国实在不必要单纯纠缠这个难题，这仅是今天中国的旅游热中出现的必然——从文明是多彩的，文明因互鉴而发展

的，而不唯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数千年互动历史的描述方法，能展开更多的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政治传统与未来的科商解读。

说中华蒙古族入侵欧洲失败是“天下道”、“天下人”的胜利——因为中华蒙古族多少还是含有“天下人”的基因，而且他们入侵欧洲时，也使用了一些“汉人”。蒙古人效仿“维京人”的入侵者行为，使“天下人”的追求“天下为公”，追求“小康”和“大同”这类“基因”，处在矛盾和变味中，失败是必然的。蒙古族属于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合一时期的上层人物中之一带领的人群，盆塞海干涸后，只因比下层人群“汗族-汉族”这大支向北迁移走得更远。发展到1215年，中华蒙古族走出成吉思汗，他的蒙古大军才攻占了当时金朝的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此前，中华蒙古族人已经接受了金朝女真人的臣服和纳贡，但最终他们还是在劫掠了所有的财物之后，彻底毁灭了这个城市。虽然成吉思汗日后的继任者们，逐步懂得了如何统治和管理中原的定居社会和城市，而在当时，蒙古人对于这些繁华的城市却完全不知所措。同一年，蒙古大将木华黎短短一个秋天，即在金国土地上“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但最后或者屠城，或者丢弃，总之是不要。

蒙古人效仿“维京人”使自己没有城市，最多仿照城市模样将毡帐围成一个圆形。但是他们在定居民族土地上攻城拔寨的速度奇快；每次进攻一个城市，蒙古人会首先清除四周所有的乡村，一方面用这些做了俘虏的当地农民做攻城的前锋，一方面通过断绝城市的供给线困死城中居民。既然城市和周围四域的农村对于蒙古人都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需要的，那么连同建筑物和人口一起消失掉，变成平地或牧场，就是最好的结果。城市就是文明的象征，文明通过城市朝向复杂性增加和能量流、信息流聚集的方向演化——蒙古人效仿“维京人”的屠城和烧城，毫无疑问也被解释为野蛮毁灭文明，是文明的反面。

蒙古人按照其非中原式的统治模式，将投诚的汉族将领，封为万户。这个政策也被后来的窝阔台、蒙哥两任大汗所继承，并一直延续到了忽必烈成为大汗的前期。这些万户的起源，更早时候可以追述到北宋的地方民兵以及辽国南部的汉军部队。所以在接触蒙古人之前，他们就是有一定组织和军事训练的。蒙古人在前几代统治者时期，给予他们的优厚条件，也是他们选择投诚的重要原因。万户门几乎就是地区内的独立统治者，权力比很多西欧封建制度下的骑士领主还要大。除了基本不用交税之外，地区内的军政大权都是自己一把抓。军事、民事、法律都自己来，甚至有自己发行货币的权力。

而且他们死后，位置与权力都可以直接传给后

代或任何指定继承人。这些汉族将领的军队，基本上也是蒙古人征战中原地区的步兵主力。他们的加入，让蒙古军队有了攻克大城市的能力。这也让金国和南宋的坚守城池战略，逐步失效。甚至于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蒙古地区交战时候，也出兵北上，帮助忽必烈获得胜利。但历史演变的事实是，虽然蒙古军队 1125 年灭契丹族的辽朝政权，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待于秦岭淮河一线，1234 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但蒙古灭亡南宋建立的整个元朝，后被明朝推翻。17 世纪女真族在东北地区再度兴起。1616 年努尔哈齐建立“后金”政权，1635 年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次年改“后金”为“清”，1644 年入主北京，渐次统一中国，直至 1911 年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

3) 今日明白背离“天下道”的中华蒙古族胜利预示是失败

成吉思汗铁木真兴起以后，中华蒙古族崛起发动西征，灭花刺子模，扫荡广阔的欧亚草原，征服了中亚细亚地区。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位为蒙古大汗，是为元太宗。1234 年蒙古与南宋联军灭金国。

1235 年窝阔台召集蒙古诸王部落大会，决定由拔哥继承成吉思汗遗志，发动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率军从征。以拔都为诸王之长，以速不台为主帅，领衔统率各系宗王居长者出征，因此这次远征又称为“长子西征”。

1236 年秋灭不里阿耳。1237 年春拔都灭钦察汗，进兵斡罗思，攻取也烈赞（梁赞）城。1238 年初蒙古军连破科罗木纳、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十余城。二月，攻进斡罗斯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斡罗思大公战死。蒙古军兵锋南指，所向无敌，抄掠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果夫等地。并继续略取钦察（乌克兰）草原西部地。钦察余部逃入马札儿（今匈牙利）。拔都率军经略亦的勒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1239 年蒙古军灭高加索山北麓之阿速国，拔都控制了黑海北岸的海滨土地后，许多突厥系人民归顺于他，并被编入蒙古军队。拔都再次进入斡罗思，遣使至基辅罗斯首府乞瓦（基辅）城谕降。但被拒绝，使节被杀。秋，拔都亲统大军围攻乞瓦，蒙古军攻入城内，纵兵杀掠。1241 年春蒙古军分兵二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合台等率领侵入孛烈儿---即波兰。

一路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等率领侵入马札儿。蒙古军在列格尼卡战役击败孛烈儿军队，攻入克拉科夫，将其烧毁，然后乘筏渡过奥得河。神圣罗马帝国的昔烈西亚（西里西亚）大公爵亨利二世集结孛烈儿（波兰）军、日耳曼圣殿骑士（十字军）与条顿骑士团（捏迷思，日耳曼）3 万人，迎战蒙古

军，激战于里格尼茨。蒙古军避其锋芒，侧面袭击击败联军，杀死了亨利二世。继而南下攻入莫刺维亚，前往马札儿与拔都军会合。拔都率军分三路侵入马札儿。同年三月蒙古军进逼匈牙利都城佩斯（今布达佩斯，《元史》所记之马茶城）。1241 年 4 月 11 日蒙古军与匈牙利军队在赛育河右岸与蒂萨河汇流处展开战斗，别拉四世亲自督军迎战，但匈牙利军一战而溃。别拉四世单身逃脱，乌古兰大主教战死，匈牙利士兵生还者无几，积尸绵延两日路程，赛育河水染成了红色。

蒙古军取得了赛育河歼灭战胜利后，攻破佩斯城和布达城，纵火焚烧，屠戮居民。拔都命合丹穷追别拉四世的残部，别拉四世逃往奥地利。他致书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烈二世求援，均被回绝。1241 年 12 月别拉四世逃到亚德里亚海上的小岛上。合丹军在亚德里亚海东岸相继攻取多座城镇，于 1242 年 3 月取道塞尔维亚与拔都军会合。1241 年夏秋西征军各路兵马驻营于多瑙河畔，休整兵马，分兵四处劫掠。1241 年冬季多瑙河结冰后，拔都分军两部渡多瑙河向西扫荡。冬，拔都大军渡过秃纳河（多瑙河），攻陷格兰城。1242 年初遣诸王合丹率军追击马札儿王别刺四世（匈牙利王贝拉四世），中路的蒙古军抵达维也纳城郊的诺伊施塔特城。至此蒙古西征军完成了对匈牙利全境的占领，南路蒙古军向南进军意大利，进逼威尼斯共和国的达尔马提亚。

俄罗斯乌克兰成为蒙古帝国的属地---1241 年冬 12 月成吉思汗继承人、元太宗窝阔台在蒙古本土去世。1242 年 4 月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到西征前线，拔都下令全军东返，为时 7 年的蒙古军长子西征至此终结。拔都带领窝阔台汗的子侄率军徐徐东行，于 1243 年初抵达伏尔加河下游东岸，在此修建了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城。拔都东归，至此蒙古军队的西进方告结束。拔都立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为国都，统有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的辽阔地域，史称钦察汗国（因以原钦察部地为中心而得名），也称为金帐汗国。里格尼茨之战使欧洲诸国十分震惊，感受到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

从 1236-1241 年的五年征战，拔都率军征服欧亚草原的突厥钦察人，征服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利亚、基辅罗斯、加里西亚、摩尔达维亚、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王国（“孛烈儿”）、匈牙利王国、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波西米亚与捷克、摩拉维亚与斯洛伐克、拉什卡、奥地利、威尼斯共和国等国。蒙古军席卷东欧与中欧，击败神圣罗马帝国联军，使基辅、布达佩斯等三十个城镇遭受摧毁与屠杀。1242 年拔都建都于伏尔加河下游河畔的钦察的萨莱，正式立国，史称金帐汗国。

此后三百年，几乎大部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都成为隶属于蒙古帝国麾下金帐汗国的属地---当时蒙古帝国的中心就是中国上的元朝，它版图比前苏联+今日的中国还要大，也遇到前苏联类似的消化不良---以上中华蒙古族攻占欧洲的胜利，背离“天下道”，在元末朱元璋等农民起义，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没有继承中华蒙古族仿效“维京人”的作法，蒙古族攻占欧洲的部分失去了后方的物质和精神支援，自然被瓦解---今日明白，以前胜利预示的是失败而已。

4) 丝绸之路历史的回光返照

这种预示是据《元史》密昔儿---埃及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曾经被蒙古西部汗、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和其麾下的汉军将领郭侃所征服，成为蒙古帝国在西亚的西土。综合元代史料：郭侃（1217年—1277年），汉族，字仲和，华州郑县（今陕西省华县）人，乃蒙古帝国大将。出身世代军门，其祖父郭宝玉，父亲郭德海，皆为成吉思汗麾下汉人名将。公元1252年郭侃率领汉军火炮兵跟随蒙古汗王旭烈兀远征西亚。郭侃在西亚屡破阿拉伯军，攻克百二十余城。

其军队足迹远至麦加、埃及以及叙利亚。1258年郭侃军攻克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的京城---巴格达（“报答国”）。郭侃于底格里斯河畔接受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投降”。立国达509年之久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至此倾覆。郭侃武威为其征服之地的人所畏惧，对手惊呼其为“东天将军，神人也”。旭烈兀在波斯创立了伊利汗国。在13至14世纪，波斯伊利汗国作为蒙古帝国的西部汗国，统治着西亚、西南亚从尼罗河、阿姆河到印度洋，从幼发拉底河到信德（今巴基斯坦）及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和高加索的广大地域。13世纪在1204年中国的元朝时期，威尼斯人领导的第四次十字军以小击大摧毁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15世纪后奥斯曼伊斯兰帝国兴起，控制丝绸之路，欧洲维京人的金融资本，由意大利半岛向西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不列颠和法兰西转移，威尼斯金融业就逐渐衰落。

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被拿破仑灭亡，成为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后威尼斯并入意大利国家。其实从18世纪末期开始，俄国和西欧的考古学家开始对欧亚大草原进行考古挖掘，欧亚大草原西起欧洲的多瑙河流域，东至中国的大兴安岭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这片广袤的草原曾孕育出许多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回鹘人、突厥人和蒙古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此外，由于伊斯兰教的作用，原本当时波斯地区佛教已基本消失，但在旭烈兀统治时代，由于他本人信奉藏传佛教，独崇拜弥勒佛，当地出现了大量喇嘛，佛教活动在伊朗再次出现。

从1262年开始，欧洲教皇与旭烈兀数次派遣

使者来往。小亚细亚的十字军欲与蒙古结盟共同征服耶路撒冷。在旭烈兀写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他表示愿意攻下耶路撒冷作为赠送给教皇的礼物，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旭烈兀和他的继任者们最终没能与欧洲建立任何真正的联盟。希腊罗马与日耳曼人没有文明联系。宣称现代西方文明即日耳曼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但是，在古代的希腊罗马人眼中，却似乎并非如此。希腊罗马人把日耳曼人、白种人看做野蛮人---蛮族。蛮族，即野蛮人。

希腊罗马人认为，这些鸟语民族是野蛮的或者不开化的，因此他们属于野蛮人即蛮族---在他们眼中，西徐亚人（即匈人、匈奴人）、高卢人、日耳曼人、阿勒曼尼人以及西亚人、非洲人，都属于野蛮人，蛮族。地中海民族也不是纯白色人种，他们看来自北欧森林地区的日耳曼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如同野蛮人。金帐汗国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次子、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统帅拔都所建，疆域极其辽阔，比元朝的地域广大得多。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都城萨莱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

由于拔都宫殿模仿蒙古包“大帐”而使用金顶，因此在欧洲史书中这个汗国被称作“金帐汗国”。金帐汗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商业贸易中心。金帐汗国统治长期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在隶属于金术赤兀鲁思帐汗国体制下的罗斯人（及斯拉夫人）的各公国，出现了一位新的“大王”，即伊凡四世。伊凡以莫斯科大公国为核心，逐渐发展成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俄罗斯。而与之同步发生的，是金帐汗国中央权力日渐下降，开始分裂为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大帐汗国等区域性的蒙古汗国。原来政治核心为蒙古人和突厥人为主的金帐汗的大帐汗国，被为附庸国的北欧白种人和中欧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从大帐汗国中独立出来，最终灭亡了蒙古--突厥人的大帐汗国。但这种灭亡反过来的侵略、占领的胜利，背离“天下道”，不管过多少世纪，不管什么旗号，预示也是失败。

4、何新教授谈希腊文明伪造与《盘古王表》求真

研究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遇到西方无信史等质疑---北京学者何新教授不但接连在2013年出版《希腊伪史考》和2015年出版《希腊伪史续考》等书外，近一年多何新教授还在“新浪网”“何新老家伙的博客”等互联网站，发表有《古希腊是个啥？》、《聊聊希罗多德伪史中的胡说八道》、《笑谈西方历史的谎言之父希罗多德》、《何新：古希腊殖民地也是欺世神话》、《亚历山大港和图书馆不可能存在》、《何新：虚构出来的荷马及其史诗》、《西方无信史》、《何新：正本清源

---键陀罗艺术与希腊》、《为什么《圣经》中没有提到过希腊人》、《西方古代历史的系统大规模伪造》、《何新对希腊文明问题的质疑》、《何新：关于荷马史诗问题》、《何新：谈谈荷马史诗》、《何新对希腊文明问题的质疑》、《一问一答，关于希腊以及苏格拉底》、《何新：古代的希腊半岛没有形成过国》等数十篇文章。这是一件好事，它不但为人类五大古文明起源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把维京人学者存在“伪造”，和“天下人”学者存在的“去真”，也推向统一，获得了《盘古王表》求真的态势。

人类自然起源本来是一元的。人类文明分区和形成国家呈现多元，也是一种自然，但未来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同世界全球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追求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并不代表主张自己所控制的范围也绝对搞多边主义，在“智商”和“情商”等平衡、求衡中，16世纪出现“科商”的再平衡、求衡的比较、选择和去伪求真---人类的一元化，允许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去实践，证明其真。

1) 古希腊历史的伪造---何新谈维京人伪造历史

A、何新教授指证古希腊文明各项伪造简说

a、何新质疑亚历山大帝国和亚历山大大王

何新教授以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法]F·B·于格、E·于格的《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等书为据说：那个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被尊为伟大传奇的亚历山大，以及横跨欧亚从地中海直到印度洋的亚历山大帝国等，一些煞有介事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不断地被完形塑造的一个虚拟人物和欺人之谈而已。历史上根本从未存在过一个横跨欧亚两洲，从希腊半岛一直征服到印度恒河流域的神话亚历山大帝国---那只是一个出自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想象的伪历史的神话故事而已---目前流行的这一切说法统统是近代西方史学制造的欺世谎言。

亚历山大征服故事和所谓“亚历山大帝国”，完全是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欧洲人根据一些神话传说虚构的伪史。如公元前 3--4 世纪（中国春秋时代后期）的亚历山大帝国、关于亚历山大---马其顿王国，事实上找不到任何一部可信的原始史料。关于亚历山大的历史资料，据说最初是来自曾随他远征的一些目击者的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一位记述者，是据说曾作为亚历山大远征军随军史官的卡利斯西内斯。这位人物据说还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亲戚，他曾经记录下有关亚历山大远征军的资料。注意，当时没有纸张，不知道此人随军是如何记录一切的。但是这个人的记录，却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于是后来有作家利用另外一些目击者的叙述，这后一群体（“二手资料”作者）的史料，则成为了研究亚历

山大历史的基础。在诸如此类完全不可靠的传说的基础上，西方主流史学竟然构筑起整个公元 4 世纪以后的亚洲“希腊化”历史故事：包括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的亚洲征服史，包括腓力时代发明并向希腊地区推广雅典式样的希腊语言及文字，而后亚历山大大把这种语言文字推广到小亚细亚和南亚的全部伪史。

亚历山大被西方史家捧为战无不胜的天才，征服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的传奇英雄。但是真实身份可能来自波斯或者阿拉伯的民间传说，他的诸多传奇，仅仅是出于臆造的一系列伪史骗局---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 年--前 323 年），据说是巴尔干半岛马其顿王国的国王，出生于首都佩拉城，幼年时由著名的哲学圣人亚里士多德为其导师，从学到 16 岁。18 岁亚历山大随父出征希腊，20 岁继承马其顿王位。亚历山大的远征使得古希腊文明向小亚细亚和亚洲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由此开启了把欧洲文明带到亚洲和中国的“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帝国乃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其疆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亚历山大一生征战，以少胜多，曾经用 3 万步兵击败波斯的百万大军，一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因此被认为是历史上唯一的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

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在亚洲建起数 10 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将西方文化一直向东传播，导致亚洲文明希腊化时代的到来。亚历山大的原型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喀琉斯，最终亚历山大也成为了一个神话中的人物。

亚历山大最早是流传于亚洲的波斯和阿拉伯人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最早传说，可能出自于波斯的口头民间文学“列王记”。有人曾经收集到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传说的各种不同民间版本接近百种之多，而欧洲的亚历山大传说，是在波斯--阿拉伯的亚历山大传说故事之后出现的。关于亚历山大的神奇传说，起初欧洲人并不相信。17 世纪之后欧洲人开始系统编造“古希腊”伪史，19 世纪德国学者提出所谓亚洲的“希腊化时代”概念之后，欧洲人才逐步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各种神话传说改编成欧洲征服亚洲的“真实历史”。

通过阿拉伯流传到欧洲，亚历山大被伪造为欧洲人的世界征服者，很晚才从阿拉伯地区流传到基督教欧洲。有书说：“亚历山大远征史是一部由最优秀作家们写成的历史，但也是一部在港口和沙漠骆驼队客栈讲述的故事集.....从 11 世纪起，有关亚历山大东征史的通俗语言译本日益增多，那些信徒撰写的著作也都彼此之间互相交错和互相借鉴，但它们全部都取得了一种巨大成功”。

b、何新质疑所谓的“古希腊哲学”

何新教授说：被称为古希腊哲学鼻祖的那些著名哲人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希腊人，而族源却接近是苏美尔、埃及、闪族以及巴比伦人等亚裔或古波斯人种。所谓的“古希腊哲学”作为整体根本不存在——一是违背人类发展系统逻辑：若古希腊是存在的，整个西方社会发展史将是一个逆向发展史：从科技、哲学、制度高度发展的“古希腊”，到与野兽搏斗、全民淫乱的“古罗马”，再到全民皆兵到全世界打劫的“十字军”——若“古希腊”、“古罗马”“是真实的，西方的社会发展史无疑是一个逆向发展过程。这样的过程不符合人类社会、智商发展的基本逻辑。二是违背信息载体逻辑：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语形成只有约 100-200 年左右；作为信息编码必须有一个信息编码与事物结构、过程、参数一一对应过程，有信息层级总结、归纳，概念形成、进阶抽象、抽象信息编码形成对应等系列过程。科技理论中的信息多数为进阶总结性、进阶抽象性信息编码。希腊语的形成时间过短，难以建立实现这样的信息编码体系。而初级语言只能描述简单信息。何新谈，我青年时期读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谈到希腊民主的起源，以为是理想化的政治文明之楷模。

早年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说：希腊令欧洲人有回归家园之感，深受感染。黑格尔讲希腊哲学，不仅生动而且深刻，曾经成为引导我理解哲学为何物的启蒙读物。早年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伯利克里的“阵亡战士纪念演说”，深感震撼。所以我早年极其崇拜希腊文明，惊叹雅典城邦作为一蕞尔小邦，其思辨及文化，何以如此深刻、卓越、灿烂。但是中年以后系统研究世界史，乃逐渐发现，西方所述之希腊、罗马以及印度历史，令人愈读愈感到糊涂，不仅文献来源含糊不明，而且所谓考古文物多有后人伪造之痕迹。关于希腊问题，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古文明。历史中从来不存在一个以雅典为中心（都城）的希腊国。希腊哲学起源和繁盛于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所谓“希腊”的历史，主要是小亚细亚地区的传说和历史。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德多德（一位传疑人物），也是小亚细亚地区人。

c、何新质疑古希腊神话、质疑荷马史诗

何新教授说：“希腊”地区之名，本来来自爱琴海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半岛。而那里的悠久古代文明，近代文艺复兴以后被西方文人移花接木给了雅典为中心的格里斯半岛，于是这里被冒名顶替而称为古希腊，改造和转嫁了许多原产于小亚细亚地区的神话、哲学以及古文明。近代西方人伪造了雅典卫城、包括某些可疑的考古发现和文物。例如，克里特岛的牛头王——米诺斯神话考古。于是，这个

伪造的雅典希腊，就被谎称为欧罗巴（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和曙光区域，而写入了近代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历史。荷马史诗是伪托之作，却被作为虚构信史的主要基石。在诸如此类的虚构想象基础上构拟的所谓古希腊历史——全部都只能叫做伪史。

有充分根据可以断言，西方所谓的“古典学”——其实就是一种虚构的现象学和准文学。西方史学家在 18 世纪后才开始创造的一系列古希腊神话，其根据主要是口头传说，如荷马史诗、圣经故事及没有编年的各国轶事；早期被大家接受的概念，被称为“古希腊神话”，里面充满很多神、半神半人，宙斯、雅典娜、阿波罗都是其中的神化人物，特洛伊木马也是其中的神化故事。从故事情节内容上看，还可以发现很多模仿亚洲国家神化传说、亚洲文化的部分，如星相星座。荷马史诗所述传说与希腊及雅典基本无关。不断深究之乃更发现，所谓古希腊历史与古罗马历史、古印度历史，其实全部是欧洲人于文艺复兴后有组织而系统大规模人工粉饰和制造的伪历史。

也许荷马史诗等有文学价值，但不是真正存在过的历史。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雅典文明的东进——所谓的“希腊化”进程。荷马史诗以及书中宙斯体系的所谓希腊神话，其原型实际来自现在土耳其地区的小亚细亚半岛，本与雅典希腊无关。所谓荷马史诗本身也是来历不明。但现代西方学术界普遍承认，该史诗所述传说与希腊的雅典无关，来源是今日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古代传说。希腊哲学起源和繁盛于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

d、何新质疑亚历山大图书馆、古希腊雕像、建筑

何新教授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希腊史的“重建信息源”，亚历山大图书馆不可考证，连一块建筑废墟的石头碎片也没发现过。

人们对“古希腊”的怀疑，是从 18 世纪此概念提出之日就开始了，18 世纪西方社会就出现大规模质疑“古希腊史”的活动。今天西方国家用以展示证明“古希腊”存在的各种文物，如雕刻、石像、建筑废墟等，都有明显的过于崭新、仿古、不符合文物掩埋土壤化学改变的结构特征；部分用以证明古希腊存在的古董，其发掘地是在土耳其其中、东部，属于古波斯文明的地区，牵强附会不足以证明古希腊史；“古希腊史”中许多历史人物、事件不符合简单的事理逻辑及数理逻辑。所谓真实的“古希腊雕像”发掘地是在希腊吗——是参与“古希腊伪史”打造的，有法国的文学家雨果，还有一群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所有十字军国家的各个学界精英。

庞贝城也是意大利在数百年中，打造出来的，至今还在搞仿古建筑，对外说它们在“发掘遗址”……这些雕像的仿古很简单，把鼻子、耳朵、

生殖器敲掉，往上面泼药水就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了。西方化学家也是参与古希腊伪造的一大群人。法国南部地区有很多伪造的古罗马建筑，一看就是泼药水造出来的：大理石质的建筑与雨水接触后，石头表面会产生很多孔洞，雨水接触越多与接触少的区域，孔洞结构、分布是不一样的，可在这些仿古建筑表面，用泼药水模拟水侵蚀的石头，孔洞结构、分布都跟是否与雨水接触都没关系了，天花板上的孔洞分布，与外墙上的孔洞分布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到西方去看所谓古罗马、古希腊建筑，要带着思考，细腻去看，不要只带着敬仰膜拜去看。西方基本上所有古迹都是人造的，很多古董是从别国掠夺的，埋在西方的土地里，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模拟“考古现场”，一看就知道是埋进去的别国古董。本地发掘出来的真实古迹就一堆堆乱石头，是本地古代原始部落留下的篝火。大多数希腊式样的建筑和古代雕塑作品，其原型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即今天的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并且至今仍可在那里保存着的大量古代建筑遗迹遗址中见到。西方学界早就有非主流学者曾经揭露，那些所谓的希腊雕塑作品---没有一件是来历清白，流传有序，可以验明正身的。这些雕塑作品，包括什么维纳斯，阿波罗，以及米罗的掷铁饼者---尽管人们耳熟能详，但却没有一件流传有序出自古希腊雅典。其实都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时代，突然出现据说来自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那些雕塑作品，毫无古风，崭新如昨，与文艺复兴时代雕塑大师们的作品同出一脉，毫无二致---其实都是当时意大利雕塑家的伪托托古之作。

e、何新质疑希腊风艺术影响了犍陀罗

何新教授说：并非希腊风艺术影响了亚洲的犍陀罗，而是亚洲犍陀罗艺术通过君士坦丁堡和文艺复兴，影响改变了近代的意大利和欧洲的造型艺术---起源于古巴基斯坦印度河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犍陀罗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犍陀罗是古印度河流域古国之一，本部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与流入阿富汗的喀布尔河交汇处的白沙瓦谷地。犍陀罗为印度西北边境的古地名、古国名。此地是由兴都库什山脉通向印度河平原必经之路线，自公元前5至前4世纪间，此地隶属于波斯，此后，先后有大夏、释迦、安息、贵霜等民族角逐活动其间。印度河以东的塔克西拉曾为犍陀罗的首府，被认为是犍陀罗艺术发源的摇篮。白沙瓦谷地北边的斯瓦特河谷、西边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哈达、贝格拉姆等地，也被认为属于犍陀罗艺术流派的范围。

犍陀罗艺术的主要贡献在于佛像造型艺术的创造。佛教在前5世纪末兴起于尼泊尔地区后，通

过克什米尔高原向西南亚传播，公元1世纪前后，受印度河流域自古流传的民间雕塑艺术影响，转在犍陀罗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佛像的制作和浮雕的艺术风格。现存最早的犍陀罗圆雕佛像出土于巴基斯坦马尔坦地区。事实上，犍陀罗艺术纯粹起源于西南亚，很可能是月氏族人或者古波斯人的伟大创造。后来，这种造型艺术风格，由东方向西方传播，通过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传播到意大利半岛，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雕塑作品，包括那些伪托为古希腊风的雕塑作品。关于犍陀罗艺术来自希腊亚历山大这个流程百年的欧洲伪史谎言，应该予以揭穿。

B、何新教授指证伪史后台共济会及区域认知的错误

a、何新发现金融共济会在丝绸之路上形成和政治需要

何新教授说：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地区出现共济会银行家控制下的独立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这些共济会银行家（以梅蒂奇家族为代表）从十字军（圣殿骑士团）手中购买了大批劫掠自“圣地”---中东、近东（阿拉伯）地区的文化物品和古代书籍典籍，他们雇佣的学者、艺术家模仿以至剽窃其思想和艺术风格，重新复制、编撰、包装、改编---这就是所谓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于是一个历史上莫须有的“古希腊文明”被重新发现，出现了经过杜撰的古希腊史、古希腊哲学以及古希腊民主的种种新文化神话。

现代的希腊共和国、希腊王国在世界历史上本不存在。19世纪初有希腊半岛人在乌克兰敖德萨建立秘密组织“友谊社”（从属于共济会大东方会社的分支），策动希腊独立运动。1821年3月25日希腊半岛爆发反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同时宣布建国独立。于是由英、法、俄、德根据西方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共同扶植建立起了一个新国家---希腊国。历史中从不存在一个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明或者文化区域。历史中从不存在一个古代雅典人为核心族群的希腊民族，和一个雅典为首府的大希腊殖民地。

所谓的古希腊文明，是近代西方出于主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需要，而订购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产品---西方学术在文艺复兴以后，一些学者为了政治和文化原因，杜撰编造了关于希腊或者雅典的历史，帝国，民族、民主制度、古典语言、人口数字，商业文明，以及僭主和王朝，跨海大殖民地，科技哲学文明文化的种种说法，都是出自想象力的虚构作品。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等，无不是出自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产物。

所谓“古希腊哲学”的存在，纯属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共济会银行家资助的欧洲人文学者的

一种文化虚构。共济会虚构这一概念的目的，与文艺复兴学者虚构似乎存在一个统一的古希腊城邦文明体一样——最初只是为了建树一种反抗天主教学术的传统，后来则是要为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找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根”。西方古希腊史，被认为是西方在殖民时期，西方文学界主导、组织，西方各国参与、持续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大规模历史造假事件。有两个被认为是西方大规模伪造历史的原因：西方自十字军东征开始，在别国掠夺的不仅是土地、财富、人力，也包括历史、文学、科学、技术、文化、哲学、政治体制等软性无形财富，“古希腊史”可以作为一个赃物袋，打包盗窃从别国掠夺的软性无形财富。

当时西方社会正在朝着资本主义转变，创造“古希腊历史”可为西方当时的社会变革找到法理依据。今天，西方政府仍旧在试图通过树立“古希腊文化”的威信，来提高西方国家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在全世界各国的百科网站，有大量西方资助的写手，控制并恣意篡改当地的百科信息，如百度百科，随意更改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让“古希腊神话”“古罗马故事”故事情节更符合逻辑性，更趋向于“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近30年来，在西方科技文献中，西方科学家开始大规模使用“古希腊文化”概念，各种神话人物开始成为现代科技、哲学、文化、政治制度的鼻祖，还配套了这些人物创作、发明的各种详细故事情节；虚幻的“古希腊文化”“逐渐转变为现实存在的”古希腊文化“史学概念，并通过各国科学家对西方文献的引用，在全世界大规模传播。

这些被转变的概念不仅充斥各国科技文献，还在报刊杂志、影视作品、艺术作品等各种信息传递载体、信息传递链网中大量出现，从不同角度、在各个社会层次，冲击人类的视觉，不知不觉中，把“古希腊神化”概念转变成很多人接受的“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历史”，成为了一种“真实存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方学界意图将“古希腊神话”转变为“古希腊文化”“史学概念”的行为，是西方多国政府、多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组织的一场大规模历史造假活动，因此，近期一股批判西方造假“古希腊历史”的活动在全世界各国掀起。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b、何新谈区域认知的错误与维京人划界

何新教授说：所谓的希腊，是一个在历史中没有国与族的非实体存在。伟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大河流域：亚洲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黄河，印度文明起源于恒河，苏美尔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

里斯河。北非的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西方学术界通过推测、拟想、幻想、文学虚构，制造出来关于希腊的虚假历史和虚假文明，令人叹为观止。19世纪以后新的考古实证越来越多，被诸多谎言虚构包装起来的希腊雅典故事，日益找不到可信文献和实证支点，谎言要露馅。1822年希腊宣布独立之前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这个半岛，古代既不叫希腊也不叫雅典。由于半岛古代没有实现过政治统一，因此并没有统一的名称。由于没有真实历史记录存在，西方学界中至今也是众说纷纭，说不清楚。

如何定义谁是古代希腊人？如何定义古希腊的文明与文化？根据现代的研究，亚平宁半岛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到了新石器时代，利古里亚人从非洲经过西班牙，法国来到意大利。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一些讲印欧语的部落从多瑙河和喀尔巴千山脉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其中一支拉丁人进入拉提乌姆平原，约于公元前800年移至后来罗马城所在地，居于帕拉提乌姆等山丘。与此同时或稍后，萨宾人居于邻近山丘。其后伊特拉斯坎人也来到这里。前8世纪-前6世纪，希腊人向意大利南部移民，并建立城邦。

公元前7世纪，以帕拉提乌姆为中心开始部落联合过程，由单一的拉丁人部落联合包括萨宾人和伊特拉斯坎人等3个部落组成罗马人公社。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末，罗马人公社处于伊特拉斯坎人的统治之下。此时，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公社到城市国家的过渡。前5世纪末，高卢人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进入波河平原。这些部族经过长期融合同化，形成了意大利人的祖先。古希腊城邦的出现作为文明概念出现则相对较晚，最早希腊文明“克里特文明”公元前2000年出现。较为著名的迈锡尼文明，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前1100年之间，但仅仅是爱琴海文明的一支，却并非古希腊文明。

克里斯文明出现时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早已经进入王朝时代（公元前3100年左右），中国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早已经有良渚、陶寺、哈拉巴等大型城市出现，早已进入邦国时代晚期。古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源头，起源于意大利中部台伯河入海处。古罗马在建立和统治国家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先前发展的各古代文明的成就，并在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对西方乃至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有两方面：前半期的罗马律法和后半期的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古罗马文明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古罗马通常指从公元前8世纪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据西方史学家描述，“古希腊持

续了约 650 年（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146 年）。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公元前 5、6 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何新教授论证古希腊罗马哲学、宗教、神话、建筑及语言文字之根在亚洲。

但他还认为这种地缘关系，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早期哲学和科学思想内在于自身的伟大性格。只是这些古代思想并非产于雅典却被近代欧洲人伪托于希腊雅典而已。何新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科技及工业包括后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人类史上同样是伟大的。一切伟大文明不可能孤立自生，而都是通过取长补短的沟通、传播、学习、交流、借鉴而互相融合而形成。试设想，没有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对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进步的学习、借鉴、取舍和消化，以至对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会有现代中国的伟大复兴吗？

2) 徐松岩教授支持与何新对希腊古史的不同意见

西南大学西亚研究所所长徐松岩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发表《古希腊文化重见天日，是欧洲人的发现还是发明？》一文，是不同于何新教授的观点。他说：近年来有认为古代希腊，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也没有一个被称为“希腊”的政治实体，由此断定希腊古史是“伪史”，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学者“杜撰”或“发明”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有人把“伪史论”挪移到埃及、印度、中国等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上，那这些文明古国历史的真实性，甚至其是否存在都很成问题。

A、徐松岩用族群、文化、语言论希腊半岛来龙去脉

徐松岩教授说：正本清源，以希腊为例，从概念史的角度，探讨古代“希腊”的概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希腊”的古史是否存在，如何理解其真实性等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印欧语系希腊语族的居民，大约自公元前 2500 年开始的千余年间，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分批南下，逐步占据一些地区，征服当地居民或与其和平杂居。其中希腊人大规模移居希腊半岛（“皮拉斯基亚”）是在公元前 1900 年以后。“希腊人的到来”是该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从语言上说，希腊人显然包括那些操希腊语的希腊移民和原不操希腊语后又改操希腊语的异族人。近代以来的考古学和语言学也证实，在希腊人来到希腊之前，希腊各地主要是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

从族群和地理意义上说，荷马史诗提到皮拉斯基人是居住在色雷斯、阿尔戈斯、克里特等地；希罗多德及以后的作家都将希腊及地中海地区的前希腊语民族统称为“皮拉斯基人”。希罗多德《历史》指出：拉栖代梦人属于多利斯族，雅典人属于伊奥尼亚族。这两个民族从古老的时代起就在希腊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了。雅典人在从前属于皮拉斯基族，拉栖代梦人是属于希腊族的；皮拉斯基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故土，而希腊人却是经常长途迁徙的。在丢开里昂统治的时代，希腊人居住在弗提奥提斯的地方，在希伦的儿子多鲁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移居到一个叫作希斯提埃奥提斯的地方；他们在被卡德摩斯人驱逐出希斯提埃奥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品都斯，称为马其德尼人。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里奥皮斯；而最后又从德里奥皮斯进入伯罗奔尼撒，结果他们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多利斯人。

希罗多德还断言，皮拉斯基人是非希腊语的民族，属于皮拉斯基族的雅典人，在他们成为希腊人的同时，必定是更改了自己的语言的。希腊民族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希腊人起初人数不多，势力弱小；然而，他们却逐步扩大和成长成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许许多多的非希腊语部落主动加入到他们行列当中的缘故。这就是说，在皮拉斯基人所居住的皮拉斯基亚，随着希腊人迁入、定居、融合，操希腊语的族群居住地不断扩大，皮拉斯基亚逐步缩小。

B、徐松岩用从无到有，从小变大论谈希腊动态演进

徐松岩教授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简略考察“希腊”从古到今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到，在 1822 年希腊宣布独立之前，这片土地及其居民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确实没有一个称为“希腊”的国家存在。但自“希腊”概念的出现直到 19 世纪初，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希腊半岛为核心区域的“希腊”历史和文化，始终是真实存在的。学界传统上把古代“希腊罗马”并举，使人们容易误认为古代“希腊”是一个国家。研究古希腊史的视角可以是区域史、族群史，也可以是城邦史、文化史，但绝不是什么“伪史”。在语言、地理、族群、文化意义上研究其历史，正如在同样意义上研究古代“中国”、“印度”、“一带一路”一样，都有各自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用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的动态演进过程论，最早进入“希腊”地区是阿凯亚人，他们自北向南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很可能就是迈锡尼文明的创建者，所使用的文字（线性文字 B）被证实是希腊语；稍晚进入这一地区的有伊奥尼亚人、埃奥

利斯人，最晚进入“希腊”并建立斯巴达城邦的多利斯人，南下的时间在特洛伊城陷后的80年（约前1160）。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追溯希腊民族历史起源时，记载了古希腊人的共同记忆，也转述了他们的共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确信，“希腊”的这个地方，最初并非为希腊人所居。希腊人在此定居，希腊语在此普及，是“希腊”这个地理概念出现的前提。

C、徐松岩使用古风时代论考古基本具备的历史条件

徐松岩教授说：古风时代希腊人是指移入的希腊人和“希腊化”了的非希腊人（主要是皮拉斯基人）。古风时代希腊人在地中海各地广泛建立的殖民城邦，不同区域沿用各自地名。如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就被称为“大格里西亚”；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有希腊人居住的地方，自北向南分别被称为埃奥利斯、伊奥尼亚和卡里亚，赫勒斯滂和黑海地区希腊人殖民城邦，也有其各自的地名，并未统称为希腊。考古资料早已确证，自公元前1.1万年，希腊和爱琴诸岛的居民生活和海上交往未曾中断。

皮拉斯基人留下的遗迹很多。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卫城上有一段皮拉斯基人的城墙，直到公元前431年还保存着。修氏很可能就是这段城墙的目击证人。现代研究者指出，皮拉斯基康系指雅典卫城的古城墙，但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是把它与卫城城墙明确区分开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希腊人到来之前，雅典卫城已有城墙建筑。雅典卫城曾是皮拉斯基人的居住地，他们在此建立设防要塞。古典希腊语中保存着的大量前希腊语的词汇，可为皮拉斯基人广泛居住此地的佐证。某些具有社会、政治特色的名字，如“王”、“奴隶”等；一些神祇、英雄的名字，如雅典娜、赫尔墨斯、米诺斯等；一些动植物、奢侈品、休闲用品的词汇，如橄榄、葡萄、无花果、杉树、樱桃、水仙、浴盆等，都可以看到皮拉斯基人语言的残存。修昔底德对远古希腊各地居民状况的概括性论述，反映了希腊人的成分相当复杂。

罗马帝国时代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核心区域，依然在希腊半岛及爱琴海沿岸地区。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西部的拉丁文化区和东部的希腊文化区，后者即历史上的“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廷帝国”。她虽被称为罗马帝国，但其统治区域主要是操希腊语的“希腊人”。希腊语不仅是帝国民众日常用语，也是从事文学、教育、宗教、法学、贸易活动的官方语言。在东罗马帝国存续的千余年中，古希腊文献的传抄、整理和研究未曾中断，官方或民间重要文献均以希腊语写成。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

后，大批希腊学者携带古希腊抄本逃往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诱因。西欧诸国文人墨客时隔千年，再次看到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成果时，不禁为之惊叹不已。对于近代欧洲人而言，重见天日可算是他们的“发现”，绝不是他们的“发明”。

徐松岩教授说；及至古典时期，希腊作家已很难弄清楚希腊人定居此地之前的族群成分，一般统称他们为“皮拉斯基人”——一种被称为“鸛”的水鸟，暗示海上移民——称他们的居住地为皮拉斯基亚。随着希腊人一批批南下，居住在这里的皮拉斯基人或者被驱逐、屠杀，或者被同化。这是一个文化、族群上相互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当地居民的“希腊化”，另一方面也是希腊人的“皮拉斯基化”；同时并行的历史进程，是“皮拉斯基亚”逐步缩小，而“希腊”则不断扩大。

来自西亚、北非（古希腊人所称“东方”）的移民，携带着较为先进的文化成果，自东向西进入爱琴诸岛（基克拉底斯群岛）。

移民在希腊本土，在阿提卡和东伯罗奔尼撒较为常见，在色萨利和马其顿也有，在西部和西北部就很少见了。这说明移民的分布东部较稠，西部渐稀，暗示这些居民来自于东方，自东向西在希腊各地扩散——这是否与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及考古证明存在源于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有关呢？

徐松岩教授没有说，但他提供的国外N·G·L·哈蒙德研究是：“延续长达3000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几乎完全是以来自东方的影响为特征的。这是一个和平、安宁、从事农业、航海并有艺术风雅的社会”——这也许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干涸前后巴蜀文明的证明。

3) 研究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文明及区块链延伸讨论

A、维京人涌动“学习”丝绸之路上的那些科商

古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源头，罗马文明是其发展创新，这实际可看作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存在源于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的女娲、伏羲鼎盛时期延伸的后传。盆塞海彻底干涸后，嫫祖和平地把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的远古联合国的权柄，交到黄河文明中原人手中，是一件幸事。但嫫祖故里那些偏僻的山区的贫瘠，5000年多的今天除留下众多密集的山寨城邦和大围坪地貌遗迹，劳动农民更多还是靠外地打工致富。问题在哪里？研究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何新教授其实没有看到维京人伪造历史，并没有全把约公元前1000年以前古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上最早的

居民，归入欧洲早期有抢劫行为的维京人行列，而是被抢劫的对象，还算有点“诚实”。

因为抢劫如果没有别人大量而有组织的货物生产、贸易在后面支撑，哪有可抢劫的东西？所以欧洲早期的维京人只依靠“海盗行为”，那么绝不可能形成如今的国际科学主流——维京人的“科商”也来自善于向“天下人”学习。持续数千年的海洋文明中经商遇到不可预测的大风大浪，以及你争我夺战争高情商和高智商结合的窝里斗尴尬的需要——事实上，近代资本主义最早的起源地，是中世纪意大利半岛上“桑林生臂手”的银行城邦国家：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而不是这之外的今天强盛的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意大利半岛早期的城邦，也如同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位置，恰似古丝绸之路带金融和商业的中转站，控制了丝绸之路——它的存在期由5世纪直至18世纪。公元5世纪后匈奴及北欧维京入侵，引起欧洲大动乱，一些罗马的犹太资本家跑到这里避难；8世纪以后，威尼斯形成城邦获得自治权。中世纪后期，威尼斯城邦由于控制了欧洲通向远东的贸易路线，而变得非常富裕并开始向亚得里亚海方向扩张，统治了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内的很多岛屿。

因为说起城邦，人们会想起古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由于是海岛、水域等地理分割，整个古希腊被分成数以百计的独立城邦。城邦组织公民会议、实行开放社会，其手工业、商业、航海业高度发展。嫫祖考古对盐亭数十处密集度高的古山寨城邦遗址的调查，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后认为情况何尝不是这样，而且时间比古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早，即约在5000年至7000年前之间，这片古西陵氏的城邦一直是一个巨大的丝绸及家禽家畜贸易和国家文明观念传播的中心。

这项研究的第二波兴趣，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盐亭县结合发展蚕桑兴起的“嫫祖研究”热，到1992年10月4日成立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筹备委员会，1993年公开出版《嫫祖研究》一书，并得到退休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书记和时任中共绵阳市副书记廖世孔书记等的支持。但据盐亭县志办主任也是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均中主任对笔者讲：杨超书记虽然支持嫫祖文化研究，但他多次向杨超书记汇报请示工作时，杨超书记每次都强调嫫祖文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原文明是历史进程的主线，西陵氏嫫祖是向中原的黄帝献丝……赵均中主任说：“‘文化研究’说明是时事需要，不是历史求真”；所以他也不赞同《盘古王表》和盆塞海的讨论。

其实这还与四川省政协常委胥端甫先生(1906-1992)说的信息有关——1982年胥端甫先生在

中国驻美使馆精心安排下从美国返回祖国成都定居，受到小平同志和胡耀邦总书记的接见。胥端甫先生1988年在盐亭县政协听到笔者在研究嫫祖历史，后来他找到笔者告诉说：他是盐亭金孔区人，和任望南是亲戚，并由任望南帮助曾任国民党甘肃定西榆中田粮处督导处长等职。1948年到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50年代他与到台湾老兵中的一位基层士兵、干木工活的四川三台人发起“台湾易经研究会”的成立。他回四川后，在杨超书记的支持下，在省政协也成立了“易经研究会”。研究上古史，他想到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钟毓龙(1880-1970)，1933年支持盐亭何拔儒依据当年叠溪大地震及堰塞湖，联系推证盐亭大围坪地貌和天垣发现的石龟碑《盘古王表》，把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之争。

钟毓龙在1933年叠溪大地震后，巨大的人员伤亡激起他以新的视角写作《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在书中，他提出史学的上古梁州，“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赞成四川上古梁州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和上古黄河曾流入过四川。钟毓龙认为懂得有远古巴蜀盆塞海、堰塞湖及先后大溃坝，也就懂得由此分别造成后来的长江下、中游的良渚河姆渡文化和江汉湘楚文化——约公元前8000-3150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那么还引起长江的断流。

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4170-2070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

钱山漾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者慎微之先生也是非考古专业的考古专家，1896年出生在离钱山漾湖边不远的已衰败的曾富裕家庭。1940年在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成归国后当浙江大学开设人类学专业课时，他曾一次次把珍贵的石器标本捐赠给教学收藏室。而早在钟毓龙创作《上古神话演义》的1934年夏，湖州适值大旱，钱山漾湖中的水位落至1857年以来的最低，干涸见底占全湖总面积的2/3。而慎微之当年就是趁着暑期在湖底收集到大量古石器，随后在1936年5月写出《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

化之起源》，发表在《吴越文化论丛》上，让沉睡了数千年的钱山漾遗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慎微之说：“若大规模发掘定能获得大量石器以及化石，可使吾人了解原始南方人之生活习惯及生产方法等”。何拔儒从钟毓龙处得到过慎微之的论文，他对年富力强的慎微之也所有了解，并且感谢慎微之对他的支持说：“不但对于整个人类学有空前贡献，即对于以前文化来自西北说，亦不攻自破矣”。

中国历史学界、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去真”问题吗？一是去真作“信史”，否定“资阳人”考古，否定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存在源于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的女媧、伏羲鼎盛时期，是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与《盘古王表》有联系，而与时间顺序逆转完全不是一回事。二是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

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天下大观”版发表了一篇《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的文章，报道从盐亭梓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有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如从盐亭境内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螺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螺村山出发，如目角寨、新寨山、大牛山、寨子山、仁和寨、保和寨、大碑寨、母猪寨、子母寨、四面山、罐子寨、猫儿寨、麒麟寨、凤凰寨、锣锅寨、毛达寨、金铎寨、点灯山、古龙山、炎台山、大佛寨、长生寨、摩天岭、烽龙寨、四方山、佛贡寨、金垭寨、蚕丝山、水丝山、马鞍山、太皇山、石马山、阳鹤山、白象山、丝源山、王岗咀、打鼓山、铜钟山、笼子寨、玉龙山、高梁观、仁广寨、江家寨、大寨山、伏龙山、刘家寨、白虎寨、青龙寨、登高寨、南瓜寨、水秦寨、二龙寨、太阳寨、七庙寨、空相寨、天生寨、狮子寨、金凤寨、金龙寨、观台山等60多处古山寨。

它们一般相距3至4里，海拔约600米，上下相差约80米。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山寨半坡的大围坪一般在海拔约450米处，弯月形包围山寨，或背靠山寨。现在95%以上的农户已从不当道的大围坪搬家到沟坝或靠近沟底的不规则的台地居住；并且古山寨城邦原有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早在明清时代及以前修建、留存的一些小寺庙，被兼容变为当地人家子弟的书院也不少。而这里远古文明的心灵，没有被撼动过。有网友说：“探索产生了有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猜想，以此也能解答世界大同走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形态，而不是走国家、民族以各自的利益纷争的世界分裂的多元伦理道路”。这是拉

开了研究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文明及延伸区块链模型讨论的序幕。

这篇文章发表后，1998年6月11日至13日'98四川--海峡两岸螺祖文化研讨会第一次在盐亭县城召开。笔者作为《绵阳日报》社派出记者，特地带上10多份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到会，分送给来自海峡两岸的主要专家和领导，重点是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会长杨超书记。笔者还向杨超书记摆谈了《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发表中的故事：文章很早就收稿，但报社要求发表时要配发古山寨城邦遗址相应的照片。笔者作为编辑，想到盐亭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宗舜部长是支持螺祖研究的，就向他求援。马宗舜部长亲自带队请上盐亭知名的摄影师、盐亭县电影院的顾国钧先生等人士，开小车在全县区乡走访了解，还到自己熟知的山寨，一共跑了两天，自认为拍摄最好的如一些山崖边长得茂盛的大巴茅草等照片，但无一张可用。笔者才知道，山寨城邦遗迹考古，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

幸好笔者十多年来业余读了这方面的不少书刊，如草原遥感考古，遗址本身同周围未经改变的自然环境就存在种种差异，如古代护城河、壕沟等遗迹内含水分、有机物和腐植物比较多，上面植物的长势就比周围的植物要好。相反，若地下有古代的墙基或夯土，上面的植物根系不够扎深，也缺少水分和营养，就会比周围的植物显得萎缩。笔者老家在盐亭天垣乡农村，那时老家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每个月笔者都要趁星期六、星期日回老家一次看望母亲。于是决定趁回老家考察传说和盘古有关的天垣乡与黄溪乡交界处的“大风洞”山垭。读高中那些年，吃饭笔者要背粮到盐亭城，虽要过河翻山但也愿走经过“大风洞”这条近路。当年整个天垣乡和黄溪乡的山头都是光秃秃的，“大风洞”冯家坪这边有座“目角寨”山，解放前还有豹子伤人，此时也是光秃秃的，笔者每次过河翻山走赵家沟过冯家坪就经过“目角寨”山旁，所以有些熟悉。但1998年4月初笔者爬上目角寨山垭时，这里满山都长上了柏树林，当年天旱，冯家坪的不少人到目角寨大风洞一处有流水的山崖下，用桶接泉水吃，这给笔者考查壮了胆。

但令笔者失望---跑遍目角寨山顶山头，除还能看到一些壕沟的痕迹外，5000年前的山寨城邦遗址遗迹难定。因为目角寨大风洞一处垮崖虽有石砌城墙遗迹，但够不上5000年。笔者闷闷不乐正准备下山，对面山头有位放牛的老大娘警惕地叫住笔者问是谁？笔者说出自己的住家和母亲的名字，她居然认识笔者的母亲。冯家坪说来奇怪，除少数人家姓冯外，大多数人家都与笔者同姓，而且还传说是同宗。因为冯家坪人赶天垣场要经过笔者家，所以认识母亲。而且据母亲说，那些年因笔者喜欢独自一

人到一些山寨考察，外面有传说儿子在“寻宝”，她很担心。既然放牛的老大娘很热情，笔者就向她打听附近古山寨的情况。真是喜出望外，老大娘说她放牛的山头叫“新寨山”，叫过去看看。笔者虽是本地人，而且也多次走过“新寨山”下，居然不知道它也是一座古山寨。“新寨山”离“目角寨”山不到半里路，山势更高，虽是个独山头，但成刀背形---在冯家坪的背面是悬崖，一直到河谷。笔者爬上新寨山顶，回头再往下看“目角寨”，却被惊呆了---像草原遥感考古，目角寨山头遍山的柏树林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近似圆环形的圈带，扣在目角寨的山头---如地下有古代的墙基或夯土，上面的植物根系不够扎深，也缺少水分和营养，就会比周围的植物显得萎缩---这个圆环形圈带的柏树长势就比周围的柏树矮些。

笔者跑遍“新寨山”山顶山头，好不容易才在面向天坛场的一处悬崖边发现，有一些残留的石砌城墙遗迹，比目角寨垮崖处石砌城墙遗迹古老，石质坚硬。星期日早上离开老家时，正遇上玉龙乡初中学校校长王善金回老家看望母亲和祖母，他是笔者的堂侄子。笔者说明情况，请他帮助拍摄此处照片，才达到目的。1998年4月28日《绵阳日报》登出时，正是用的王善金校长拍摄的配合照片。但事情并没有完，据报社同事说：《绵阳日报》综合新闻部主任李昭富老师对“盐亭新寨山城邦遗址”照片有异议，认为5000年前的石头全都会烂掉了。李昭富主任是1961年笔者在玉龙区初中读书时的化学老师，笔者很尊敬他。但笔者回答说：“古埃及金字塔有5000年前的石头，没有全烂掉，难道只有我们中国5000年前的石头就都会烂掉？”

笔者在海峡两岸螺祖文化研讨会上分送1998年4月28日的《绵阳日报》还是有收获---与会代表来自台湾永达专科学校的杜英贤教授找到笔者交谈，他说他研究过世界养蚕史，发现海岛地区养蚕有利于隔绝蚕病的传染，因为蚕瘟病的蔓延对养蚕业的威胁是颠覆性的。他读了《绵阳日报》报上的《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文章，看到远古巴蜀有盆塞海和山寨城邦文明，想到在当时没有专门的蚕种制种场和蚕药厂的情况下，这对螺祖大规模发展养蚕有利。据他了解，中国的养蚕传播到日本和台湾这类海岛地区后，蚕瘟病发生得少，他听说曾经大陆发生蚕瘟病断了种，还从台湾蚕种制种场引过蚕种。

受杜英贤教授“蚕瘟病”断代的启发，使笔者想到如果再以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划段，之前从非洲海路和陆路走出的现代人，向东直走到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东海边，无法前进后折回才在青藏高原西南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建起第二孵抱期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由于溃坝沿着长江，

它的主体向东达到了良渚地区。向西延伸分流，主要路线是沿古印度陆路，海路进入波斯湾海峡，上游进入两河流域陆地，再延伸进入古埃及和找海路到古克里特岛与西西里岛等地区为止。它以丝绸文明和界碑字库文化为标志，先后发展带动起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克里特岛与西西里岛文明。

但没有专门蚕种制种场和蚕药厂的远古，蚕瘟病蔓延颠覆性打击养蚕业，这些延伸的几个远古文明，仍然需要与母体的远古联合国保持联系。但远古巴蜀盆塞海干涸后，螺祖把丝绸文明和界碑字库文化带到黄河流域的地区，她深知蚕病传染的危害，所以一生都到四方与黄帝巡游教民养蚕缫丝，成为中华文明的各处亮点。但原先主体向东到达的良渚地区和巴蜀盆地本土，以及延伸带动发展起的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克里特岛与西西里岛文明，却因断掉第二孵抱期的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的哺育而先后衰落。

1998年6月13日上午杨超书记在海峡两岸螺祖文化研讨会上作《螺祖文化再上新台阶》的总结性讲话。打动笔者的是，他中途放下稿子讲了一段“山寨城邦和古文化有联系”，不能搞“半螺祖文化”。他说他曾“强调螺祖文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原文明是历史进程的主线，西陵氏螺祖是向中原的黄帝献丝”，但这次来看了《绵阳日报》刊登的《盐亭螺祖考古大发现》等材料，加之改革开放后新的考古，专家们也在说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那么长江文明源头远古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海洋文明，原先规定“螺祖是向中原的黄帝献丝”不一定正确。反之也要含蓄，不要太露。如果“螺祖故里申遗”，桑化石、文物陶器、石器、玉器、唐碑这些东西很重要，但要分别鉴别断代。螺祖文化是口碑文化，是传说时代，那时无统一的文字，民间故事、民俗文化，为什么几千年被保留传下来？为什么现在规定文物修复“要修旧如旧”？都是为求真。盐亭保留至少60多处密集的古山寨遗迹和大围坪地貌，不可能人工伪造，而且也与盐亭几千年的贫瘠和现代也无大规模的工业、矿山等开发，生态没有被大规模破坏有关。方向发展是委托类似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作《巴蜀盐亭古山寨城邦遗迹保护总体规划》，在更高层级、更大范围内，作统一协调遗迹保护与社会发展事宜的向国家申请“特区”模式的大遗迹保护管理。

但1999年1月内部出版《首届海峡两岸螺祖文化》一书时，发表的杨超书记《螺祖文化再上新台阶》讲话，文后标注“何子远同志根据录音整理”，实际杨超书记的这段讲话被主编赵均中主任删掉了。

B、《盘古王表》读

徐松岩教授说：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古希腊文明持续了约 650 年（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146 年），是西方文明最重要和直接的渊源。西方有记载的文学、艺术都是从古代希腊开始的。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其位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群岛和岛屿、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西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

这里说的“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146 年”的时间戳，类似在区块链上古希腊文明可供参考对比查阅不可篡改的记录数据。而作为数据共享平台的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存的天垣《盘古王表》，也不是孤证。

如浙江学人钟毓龙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公布的尧年王表也与此多有相似。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 8000-6390 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 6390-6210 年：1、盘古；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6、摄提纪，7、合雒纪，8、连通纪，9、叙命纪。（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 6210-5770 年：1、巨灵氏，2、句疆氏，3、谯明氏，4、涿光氏，5、钩陈氏，6、黄神氏，7、巨神氏，8、犁灵氏，9、大隗氏，10、鬼隗氏，11、掩兹氏，12、秦逢氏，13、冉相氏，14、盖盈氏，15、大敦氏，16、云阳氏，17、巫常氏，18、秦壹氏，19、空桑氏，20、神民氏，21、倚帝氏，22、次民氏。（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 5770-4070 年：1、辰放氏（共 4 代），2、蜀山氏（共 6 代），3、虺傀氏（共 6 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 4 代），6、有巢氏（共 2 代），7、燧人氏（共 4 代），8、庸成氏（共 8 代）。（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 5070-4070 年：1、浑沌氏（共 7 代），2、葛天氏（共 4 代），3、女娲氏，4、伏羲氏，5、赫胥氏，6、东户氏（共 17 代），7、皇覃氏（共 7 代），8、启统氏（共 3 代），9、吉夷氏（共 4 代）。（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 4070-3150 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 20 代），3、中皇氏（共 4 代），4、大庭炎帝氏（共 5 代），5、粟陆氏（共 5 代），6、昆仑氏（共 11 代），7、西陵氏（共 5 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嫫祖）。（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 3150-2230 年：1、轩辕氏（共 3 代），2、祝融氏（共 2 代），3、昊英氏（共 9 代），4、古皇有巢氏（共 7 代），5、朱襄氏（共 3 代），6、阴康氏（共 3 代），7、无怀氏（共 6 代），8、神农氏（共 8 代）。（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 2230-2070 年：1、黄帝有熊氏（共

3 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九）夏朝时期，公元前 2070-1600 年：1、禹，2、启，3、太康，4、仲康，5、相，6、少康，7、予，8、槐，9、芒，10、泄，11、不降，12、扃；13、廛，14、孔甲，15、皋，16、发，17、癸。

而世界上公认的五大文明古国，发源地时间从大到小排列分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之间）、古埃及（公元前 3200 年-公元前 500 年之间）、古印度（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1700 年之间）、中国（公元前 5000-3000 年之间）、古希腊（公元前 800 年-公元 146 年）。当然这个公认不仅时间先后有争议，且还有含义古代不同文明的发源地是分别分裂创造的。这与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认为：古文明区块链可证是统一的不合。

推理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一个孵抱期”，是因存在约 200 万前的第四次大冰川期，而开始迁徙到非洲大陆赤道热带地区的，来自青藏高原的“古蜀人”等古原始人，和非洲那里的古原始人一起生活、杂交，进化为现代人类。在第四次大冰川期开始结束的约 20 万前，从非洲向东走出进入亚洲，由陆路离开非洲最后的地区只能是古埃及。反之，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后，其“盘古文明大爆炸”暴涨类似霍金“黑洞辐射”——向非洲“第一个孵抱期”陆路返回的最适合生活地，最近也是在古埃及。所以国际上对古埃及王朝历史的分期，与古中华文明能对应，大致是：①前王朝时期对应五方区系时期。②早王朝时期对应法天法地时期。③古王朝时期对应叩向自身时期。④第一中间期对应重铸烟火时期。⑤中王国时期对应立足山海时期。⑥第二中间期对应城邦之美时期。⑦新王国时期对应跃起中原时期。⑧第三中间期对应大同王土时期。⑨后埃及时期对应夏朝时期。

而对照盘古王表看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146 年，已晚不在其内，只能大致对应我国的西周末期到西汉初期。我们不赞同徐松岩教授说：“倘若有人把‘伪史论’挪移到埃及、印度、中国等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上，那这些文明古国历史的真实性，甚至其是否存在都很成问题”。另外我们也不赞同何新教授说：“杜撰编造关于希腊或者雅典的民主制度、商业文明，以及僭主和王朝，跨海大殖民地，科技哲学文明文化等种种说法，都是出自想象力的虚构作品；是近代西方出于主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需要，而订购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产品”。原因，即使是近代西方在编造古希腊文明和其后古罗马文明的“民主制度、商业文明，以及僭主和王朝，跨海大殖民地、科技哲学文明文

化等”，也不是开人类文明之先河，而是类似“暴涨宇宙”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最后回光返照。因为神话、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料，以及智商、情商，并不能让求真的古文明确立---这里需要“科商”：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不管是政治需要还是文化需要，都能检验成立。

笔者从童年时代起，就听到家乡老人讲盘古王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笔者家所在的“王家山坪”，远古叫“芳草沟”---像红原草原一年四季盛开着各种香花，这里垭口叫“老窝垭”，它一面对着不远处的天垣场山坪的“盘垭”口，一面对着较远处的冯家山坪后“大风洞”山寨的垭口。这里特殊的地形地貌引出盘古王的诞生---相传 8000 多年前的盐亭玉龙镇梓江河坝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被称为祠堂坝。祠堂坝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发明轮盘做陶盆、陶罐的青年师傅，与西仔山的一位能干美丽的渔家姑娘相恋。但他们的爱情遭人挑拨：说祠堂坝只能建 99 座窑，超 100 座定要出乱子，因为姑娘怀孕的儿子将作人王。由此受陶窑主的迫害，这对情人一天星夜，沿西仔山下的榉溪河出逃，黎明走到天垣五面山一侧的垭口。此时一阵阵扑鼻芬芳花草气从另一侧的芳草沟老窝垭口吹来，姑娘肚痛难熬，就躺倒在一块像碾盘的大石上生下后来赫赫有名的浑沌氏盘古王。盘垭口后五面山（也称五庙山）的观象台老司主得知后，帮助抚养盘古在五面山度过了幼年和童年。盘古在老司主的指教下眼界大开，知识大增，胆慧大发，而萌生了创建天下双赢是一家的和谐社会思想。如东南西北中青赤白黑黄五帝的设置，正是受五面山的启迪而议定的方略。

盘古开创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献身精神，相传为纪念盘古，到 4000 多年前的大禹将躺过盘母的碾盘石，命名为盘母石；此处垭口旁边的大山被命名为袖头山，并在袖头山下树立了龟碑。20 世纪初榉溪河畔出了一位学贯中西的何拔儒，他留学东洋期间破译了袖头山龟碑上的文字为《盘古王表》，并组织纪念盘古修建起天垣场。

笔者在大学毕业后又调回盐亭工作前，并不相信这些神话、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料。因为 1951 年笔者开始在天垣场读小学，亲自看到组织的翻身农民捣毁五面山古建筑---这是学校老师带队学生去五面山下大围坪观看。而且天垣场小学一间教室里，有一人多高装满收缴来的各种古书和少量的古画，任由小学生爬在书山打闹，后来也不知这些古书、古画的去向，有说被烧毁了---直到“文革”都说是“革命行动”，对巩固政权有利。

C、建立古文明“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区块链模型”研究

徐松岩教授和何新教授的观点，基本代表了中

国学术界主流内部存在类似的两派；而认真研读这两派的论点论据，其实是统一的---他们都因不提有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的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证明存在源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0 年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由此“去伪”与“去真”把人类五大古文明何来何去，搞成了类似“李进难题”---“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

因主张实地考察的科学家---如地质学家搞冰川冰白考古的韩同林教授赞同第四次大冰川期地球，除赤道地区外曾是一个大冰球，所以非洲大陆赤道地区成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地---被称为“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一个孵抱期”---如果对应“大爆炸宇宙学”，类似宇宙开端的“奇点”大爆炸。又如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所长邓涛教授，他带领的团队通过青藏科考发现冰河世纪中，许多动物的祖先就起源于青藏高原，此后扩散到世界各地---这类似“大爆炸宇宙学”研究后接着“暴涨宇宙学”研究：这是把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及考古证明存在源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0 年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对应类似“暴涨宇宙学”，又称为“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可再联系霍金黑洞辐射理论。

即人类从高等动物起源的统一性，联系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的西藏雪山高原，因带耐寒基因的古人下到巴蜀盆地生活，通过吃熟食（烧烤，熟、苏声、蜀义）再进化，在约 200 万前的世界第四次大冰川期开始后，迁徙到非洲大陆赤道热带地区，与那里的古人类一起生活、杂交，进化为现代人类。在第四次大冰川期开始结束的约 20 万前，从非洲走出，分陆路和海路在约 10 万--2 万前在亚洲东部海岸折回，终于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如果把这个人“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类比“黑洞”，那么类似霍金黑洞辐射现象：例如，约 20 万前从非洲走出的还分散在巴蜀远古盆塞海文明外的现代人，也会不断地被吸引进人这个“黑洞”，加入到文扬教授说的“天下人”队伍的“远古联合国”；但逃逸离开的也许就是北京国际旅行社领队李志杰导游一路说的早期“维京人”的祖先。

事情并没有完，“黑洞”---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并不像霍金黑洞辐射理论说的宇宙黑洞在吸进正能量后，会因正、负量子中和，慢慢收缩变小。因为“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还有一个类似的“暴涨宇宙”期---从西南少数民族传说盘古王南迁和夸父追日等神话故事，暗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

度、古中国中原、古希腊等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就是“暴涨”扩散到古印度、中东、埃及和古地中海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地领头的人文始祖造就的。最好的说明是这五大文明发源地，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狭长地带内：古黄河中原是东面一端，西面另一端是古西西里岛、克里特岛、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且以青藏高原成大致对称。也许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盘古王传说”和《盘古王表》传说，就是亚历山大国王和帝国传说的母本。

D、古文明也要讲究“区块链”才能“去伪”和“求真”

解决徐松岩教授和何新教授的观点争论，需要引进一个类似“区块链”的新概念——“区块链”是2008年末化名“中本聪”的人，在论坛发表的《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文章中首次提出的，特性是去中心、开发性、信息不可修改和自治性等——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记录列表，区块链上的数据被分组在不同的块中，所有的块都分布在点对点网络中，这些块会彼此链接并用加密技术来进行保护。建立古文明研究“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区块链模型”，是

把它作的延伸应用：把类似“暴涨宇宙”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存，比作区块链上的数据共享平台。

后续研究者，可通过基于类似“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区块链模型”的人类五大古文明在区块链上的研究数据，对比查阅和引用。因为人类起源及文明源流的统一性行为，均会被区块链网络自动记录下来并载入区块链中——这也类似“天眼、天网工程”中的探头，近年来城市的公交扒窃发案率下降，原因之一是增加了公交车内的监控探头。又如基因破案的广泛应用，因为基因也类似区块链，罪犯的基因在其亲人和族群中会保留有部分相同的密码，公安警察破案利用罪犯残留的基因，可以在大量的人群中缩小调查范围到罪犯的亲人和族群。类此，量子也类似区块链，如量子纠缠和量子信息隐形传输。

再查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是指在新月沃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发展出来的文明，主要由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文明组成。中心在现巴格达一带，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有学者称古苏美尔现代人类来自青藏高原的“古蜀人”；但这里暂不分析，而看克里特岛文明和西西里岛文明。

笔者没有到此地旅游过，但据中科院邓涛教授到过其一的亲自考查说：“西西里岛不仅是文明的交汇处，也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它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接受希腊人的殖民，在公元9世纪遭到阿拉

伯人的入侵，自11世纪之后则由诺曼人统治。由于千百年来种族的融合，斯提凡诺教授介绍说，现在的西西里人说一种特别的意大利语方言；因为太特别，也几乎可以说是另一种语言，其他意大利人很难听懂，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就是完全听不懂。只有那些古老的建筑，希腊的、罗马的，拜占庭、阿拉伯，诺曼朝、波旁朝，一直矗立在原地，默默地叙述着历史深处的故事”。对此查阅古希腊文明（克里特岛与迈锡尼文明），即爱琴海是古希腊文明的摇篮。约在公元前2000—公元前1700年间，希腊的克里特岛产生了君主制国家，王宫的建筑群和象形文字的出现是其标志。约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文明销声匿迹，中心移至希腊半岛，出现迈锡尼文明。

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群岛和岛屿、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东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公元前1000年西西里已有人居住。该岛处于地中海中心，其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历史的交会点、征服和建立霸权的工具以及来岛上冒险的武士和商人所属十几个民族的大熔炉。前8-前6世纪，希腊人来西西里岛上的城镇定居。前3世纪，成为罗马的第一个省。古希腊紧邻地中海和爱琴海，所以古希腊文明又称海洋文明。克里特岛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合称爱琴文明，历时800年——即古希腊文明先后经历了爱琴文明时代（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黑暗时代（公元前12到公元前8纪）和城邦时代（公元前8纪到公元前4纪）。而罗马文明是古希腊文明基础上的发展——古罗马文明（后期分为两个罗马帝国，再后来被德国吞并，古罗马文明消失）先后经历了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前509）、共和时代（公元前509~前27）和帝国时代（公元前27~公元476）。即古罗马是一个国家，最初古罗马的地理范围仅限于台伯河畔的罗马城，后来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半岛，最终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4) 汉语的源头在约7200年前中国北方论不完备

如果说徐松岩教授和何新教授争论的观点是统一的——前者含“去真”、后者要“去伪”，都不提有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的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那么在语言学上汉语的源头在哪里的的问题，目前国内外专家跟进这类不提有人类起源及文明的第二个孵抱期论的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的人更多，更喜欢“去真”。

A、汉语源头约7200年前的中国北方论完备吗？

2019年7月21日《参考消息》网报道，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约翰-马蒂斯·李斯特教授等认为，汉藏语系的源头可追溯到7200年前的中国北方——如果说汉语最早的规范统

一追求在中国北方，还符合语言学起源研究的基本原理的话，那么德国人更不了解，即使汉语在国家政权的高压下，文字语言规范统一了几千年的中国，方言在汉语使用的同一个省内，在不同县的人说的“土话”中同一个字的读音，区别都还很大；外国人没有亲自深入内地长期大范围跟踪了解，如何研究？况且像上海“土话”，广东“土话”，听不懂的其他人不在其数。所以即使在中国的权威专家之间，也有分歧。

例如，有报道川大著名国学大师蒙文通教授为“隗”姓打赌，参与的也是川大著名学者徐中舒教授和冯汉骥教授。蒙文通教授说：“隗”姓读 wěi，徐中舒教授和冯汉骥教授认为的读音又各不相同，三人各有所据，相持不下，还赌了一桌成都中华老字号餐饮老店荣乐园的酒席——起因是 1953 年一位进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隗瀛涛，全班 37 个人，他读大学 4 年，几乎每次考试他都能考第一名，但同学中，有对他的“隗”姓念“鬼”的，也有念“槐”的。所以“隗”字的读音，学校提到中国的权威专家之间来讨论，也解决不了。后来蒙文通教授建议：“姓从主人，喊隗瀛涛本人来问以定输赢”。

隗瀛涛一天突然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看到三位老教授端坐桌前。蒙文通教授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隗瀛涛不解其意，惶惑而恭敬地回答：“我叫隗(wěi)瀛涛”。蒙文通教授一听，望着徐中舒教授和冯汉骥教授抚掌大笑：“我赢也”。这里的事情，幸好汉语拼音的注音后来国务院已公开颁布有统一的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国统一的权威的汉语拼音注音，今天要传达蒙文通教授和徐中舒教授与冯汉骥教授之间的争论，也难办。

事实一是：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 2014 年出版的上下册《华夏上古神系》一书，主张中华古文明来源于西方。他书中就用到古文字、语言的拼音注音分析，但他用的拼音注音方案不说来自哪里？是否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只管自话自说用自己的标准去解读证明，使人不知所措。二是 1980 年移学美国的朱学渊教授，1965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78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他写的《“女真/九姓”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祖先》、《夜郎国在哪里？》等文章，认为汉人起源于北方人。如他说：“关于中国人类、语言，按现代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表象来辨证一个古人的血缘和语言，华夏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同类”。朱学渊教授也是对他用的拼音注音方案不说来自哪里？是否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只管自话自说用自己的标准去解读证明。三是 2019 年 4 月 25 日复旦大学的张梦翰教授及团队发表在国外《自然》杂志的《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一文，认为原始汉藏语分化成现

代语言的最早年代在距今约 5900 年前的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时期，地点可能在中国北方。这与西南起源假说相比，也不完备。

汉语、藏语、羌语、缅语等 400 多种东亚语言被认为拥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合称为汉藏语系——这正是在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的核心地带。该语系是世界第二大语系，母语使用人数仅次于印欧语系。张梦翰教授等对 109 种汉藏语系语言的近千个词汇词根-语义组合进行谱系建模、重构汉藏语系诸语言间的亲缘关系分析，对用的文字拼音注音方案不说来自哪里？是否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也是只管自话自说用自己的标准去解读证明，闭口不谈“说话的语言并不等于书本记录的文字”等因素。可见一直以来“造假”和“去真”的各类语言学家之间，对汉藏语系内部各语支亲缘关系、分化时间以及起源地点的争议，得不到过源语实验的统一验证解答。所以都是“北方起源说”，张梦翰教授的约 5900 年前，比李斯特教授的约 7200 年前要晚 1000 多年，李斯特教授期待与上海同行们交流说：“双方研究的数据和方法都是透明的，这样我们能进行一场富有成果的讨论”。

但这种透明，张梦翰教授等讲的是符合语言随农业扩散的观点，说扩散的时间点与考古证据相符——此前的考古证据，揭示出独特建筑形式和陶器类型向南扩散的特征。而马普研究所的李斯特教授等讲的是，采用约 180 个基本词汇，这些词汇在所有进行比较的语言中都有相应的称谓。比如，眼睛，石头、我、你、早晨等等。然后将这些词汇输入电脑进行比较。除了制定词源谱系之外，还特别关注了农耕家庭的相关词汇。复原原始词汇后他们发现，汉藏语系原始语言中已经有了粟、羊和猪等词汇。考古发现，公元前 5000 年中国北方已经开始种植粟，但还没有水稻种植。即没有稻、大麦或牛等词汇，这同考古学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这里有两个悖论，一是他们的观点是先入为主——先就建立汉藏语系产生于中国北方，才作搜集对大约五十种古代和现代汉藏语言进行的分析比对、制定词源谱系，复原语言源头的基础词汇比较——如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大量同源词，即可认为这两种语言属于相关语言。反之，同源词越少，说明两种语言的源头相差较大，两种语言分开并独立发展的历史也越悠久。

但马普研究所的专家也承认：人们对汉藏语系语音和语法演变历程的研究不像印欧语系那样彻底，因此语言学家只局限于有充分记录和描述的语言。可见他们违背了“说话的语言并不等于书本知识文字”的基本常识。第二个悖论是，与考古发现的实际不符——公元前 5000 年中国北方没有水稻种植，不说“稻”话，不用“稻”字，不等于中国南

方不种水稻，不说“稻”话——2017年6月长江下游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建开挖地基时，现代器械破开土层，翻挖出5000年前堆积的已经炭化了稻米。如果不是真的，国家不会让400万的前期投资打水漂，因为这才是硬证据。而且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稻谷遗存，距今约9000多年，将中国的稻作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这事实有利汉藏语系起源于西南说。

因为说“稻”话的还有，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大量距今约7000年的炭化稻谷和原始耕作工具，比当时认为最早的印度的稻作历史早3000年。1993年至2005年湖南玉蟾岩4次挖掘，发现距今约14000-18000年的古栽培稻和原始陶片。1995年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距今约8000年的古水稻。1996年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世界最早的古稻田，距今约6500年。2004年浙江余姚的田螺山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约6500年的古代稻谷。2007年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大量炭化谷糠和完好的灌溉系统。2012年至2017年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发现大量炭化稻谷及古水利工程。2014年湖南澧县宋家岗遗址，考古发掘出土距今约9000年的炭化稻米。

B、远古蜀人与野外烧烤的源语统一实验

与汉藏语系北方起源说相对，持西南起源说的学者认为，汉藏原始语言的历史更为悠久，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已开始分化为不同的语言，该语系来自当今中国的西南部四川。这就要求重视类似上古的语言文字的“源语”、“母语”的研究，统一“源语”、“母语”可重复实验证明的标准。这类似文字的拼音注音方案要说来自哪里？有统一的权威的拼音注音标准是啥？而不是只管自话自说用其自己的标准去逻辑证明。例如，何新教授出版的《诸神的起源》一书中，以女娲中的“娲”和嫫祖中的“嫫”，“女”旁换成“虫”旁，都是一类物种如“蜗牛”或叫“螺蛳”，以此论说女娲和嫫祖是同一个人。

“去伪”或“去真”的各类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等，不管如何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不到盐亭远古遗址乡下扎根住上几年，钻研那里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遗存等这类进行的实地考察，那么这类学者，从书本到书本，分析加分析，随便怎样写都会有理。1999年5月1日《绵阳日报》发表《“蜀人”与烧烤》一文，科普现代语言学的前沿研究——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所说的一种源语。

马普研究所的李斯特教授等讲约180个基本词汇，比如他们说的“眼睛，石头、我、你、早晨等”，是“源语”吗？即使是，也难算可用作重复实验证明的标准。因为所谓的源语是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

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遗传史和语言史大致对应得出人类群体分裂，并形成孤立的群体时，两者都发生着相似的分化变异。在这一研究大潮中，学者们注意到中国的“蜀”字。传统认为“蜀”为地域称，图腾称，等等，这些解释都对，但都能被现代的母语说或源语所统一。源语的统一实验，类似野外用柴火或用烧得滚烫的鹅卵石，烧烤鱼虾、笋子虫、虫蛾、蚱蜢、粹蛇、蚯蚓等一类统称“虫”等小动物或生鲜肉，会闻到一种食物的香味，听到一种“苏苏”的烧烤响声。

把这幅“蜀”文解字图联系验证上古的语言文字的“源语”、“母语”的实验推论，就类似原始的蜀人扎堆吃这种烧烤的时候，因非常好吃，而且香味扑鼻，随着烧烤发出的“苏苏”响声，有人最先学着喊叫出“苏苏”声，接着大片人群也附和喊叫出“苏苏”声。这就是蜀人最早的源语或母语。后来这类现象成为了一种习惯，外来的原始人群见之，也就把四川这里的原始人叫“苏”人，或“熟”人。再后来变到源语或母语，变成了有语言和文字，“苏”人或“熟”人的叫法，被规范为了“蜀”人。即“蜀”人实为第一批吃熟食的“熟人”，成熟的人，文明程度很高的人；这是其他原始部落对他们的看法和习惯，当然也含有他们本身一些语言和习俗的特征。

例如，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学者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按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的《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

C、盐亭字库塔与界碑指向文字起源

文字的统一使用与说话不同，而与政权的更替，执政者的选择、规范、强制、推行分不开。如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新中国解放后推行普通话的汉字拼音注音标准方案。有学者说：“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牍文字（这枚木牍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牍’载体。

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 105 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 1000 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

那么人类五大文明古国最早使用的文字，是否就与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无关呢？不是的。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称为远古“太极”期，理性、逻辑思维被分为“藏象论”和“藏数论”。象形文字属于藏象论，字母文字属于藏数论。这里先说远古联合国的字母文字卦爻，这是《易经》最早的基本符号文字，由横线的阳爻“—”和横线中空白的阴爻“--”两种爻象组成。但把阳爻“—”减去阴爻“--”等于一个“点”（—--=•），类似可显示在电脑上一样。如果保留“•”点子显示的卦爻，按每卦三爻重叠排列，可构成 26 种卦爻基本符号，恰好对应 26 个汉语拼音文字类似的 26 个英语字母，而具有集注音、释义、编码、缩写等于一体的功能，可承担起传递上古语言和信息的任务。这就是所谓远古联合国广泛使用的太极语卦爻文字。

这种字母文字是远古联合国集大成的远古文化科学之一，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最伟大的经典杰作创作。它始于约公元前 6390-公元前 3151 年的远古联合国的“以富扶贫、以下推尖”政治的良性循环时期。后历经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伊尹、周文王、周公，孔子等薪火相继 4500 年，上下传承 6500 年不灭，最终约在从 2500 年前以后到秦汉，才结集完成。这奇怪吗？不奇怪。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这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在这第二个孵抱期里，游团、部落、酋邦组织形态都有，但只要它们的头人，在远古移民和远古贸易等相互交往中，和谐共处，不以战争和暴力处理内外事物，就都是远古联合国大同世界的成员。而且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也是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因为有发达的科技，才能“以富扶贫”；而“以下推尖”的选苗助长的教育模式，也为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以科技比赛来当选的办法打下基础。

那么那时的科技文化水平有多高呢？众所周

知，人文始祖嫫祖是以发明丝绸当选远古联合国的政权人物，因为远古发明的丝绸，就类似今天的生物工程高科技。人文始祖伏羲，在教人结网捕鱼，遇到湖塘水面上的旋涡；教人制土陶生火做饭，看到锅中沸水的翻滚，已领悟和觉察到了圈态的线旋。为了表达和传授这一数学概念，他动了不少脑筋。例如，他把摆卦爻用的草节茎棍，带来的蓍茅草叶，圈起来扭转比划，正是在这里发现类似莫比乌斯圈的太极图、八卦图等有趣智慧时，还推进发现的卦爻 26 个供拼音的集注音、释义、编码、缩写等功能于一体的太极语卦爻文字。这也类似美国摩尔斯发明电报机的点、横线电码文字。1832 年摩尔斯把 26 个字母的信息传递方法加以简化，这样电报机的结构才会简单一些。

用什么符号代替 26 个英文字母呢？摩尔斯画了许多符号：点、横线、曲线、正方形、三角形。最后，他决定用点、横线和空白承担起发报机的信息传递任务，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出代表符号，这就是皆由不同的点、横线和空白组成的为每一个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设计出代表符号的电信史上最早的编码----“摩尔斯电码”。也终于在 1837 年他制造出了一台电报机。按下电键，便有电流通过。按的时间短促表示点信号，按的时间长些表示横线信号。这样由电磁铁控制的笔也就在纸上记录下点或横线。此后，摩尔斯的电报机经过许多改进，被迅速推广应用。神奇的是，约在 5000 年前巴蜀盆塞海干涸前，远古联合国时期也打造过这类由点“•”及横线阳爻“—”和横线中空白阴爻“--”等三种爻象组合的太极语卦爻文字。但随着盆塞海的干涸，和四分五裂大迁徙的人类社会进入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它就失落了。但另四大文明古国的字母文字，则继承、创新保留了太极语卦爻文字的注音、释义、编码、缩写这部分功能。

那么四大文明古国最早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甲骨文；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包括祭祀体、世俗体、科普特体；以及古印度的印章文字等，有统一的起源吗？有。它们都与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时期，各游团、部落、酋邦组织，以及众多密集山寨城邦，划分势力范围最早兴设立的“界碑”有关----这也许是从动物世界流传保留下来的划界习惯。界碑分木头和石头两类质料，和有字迹、刻画和无字迹、刻画两类标识。为保留长久，界碑一般是界石和有字迹、刻画类型。界石是一种边界标记物，是用于辨别一个地区与另外地区之间的边界位置和走向，保留至今。

例如，国家、省、州、市，甚至是农场和社区的边界。在两地区之间的边界走向发生方向性改变时，界碑尤为有用，可以作为指示边界走向的标志。

界碑在直的边界上也可作为仅表示边界所在位置的标记物,作地界标志的石碑。盐亭发现 4000 多年前的古界碑,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何九盈等人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披露王襄搜集的盐亭县距今约 5000 年前的一块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 50 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并公布了其中的 25 个字符。随着界碑文字的出现,因界碑的神圣和庄严,使文字及其载体的意义也变得神圣和庄严,这就是字库文化的产生和兴起。

笔者在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不准写有字的纸或印有字的纸当手纸,废书、废报、废纸也不行;小孩子用了要挨打。穷人家也有一样,家里都有废字纸篓,垭口、村口都有烧废字纸地方的山岩洞,稍大乡镇和村庄还建有字库塔,大小不分。这种保护文字的风俗,也许与《中国汉字文化大观》说的约 5000 年前以来的界碑文化有关。字库塔是盐亭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现象。一座座字库塔,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弥漫在盐亭大地上的书香气息,感受到盐亭人民自古以来对文字的敬惜,对文人的敬仰,对知识的崇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留存字库塔 251 座,在嫫祖故里盐亭,至今还保留着 31 座,其中,“惜墨如金坊”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字库牌坊。

盐亭堪称中国字库塔“第一县”。字库塔,叫“字库”或“惜字宫”,它是古人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建筑。据史料记载,字库塔始建于宋代,到元明清时已经相当普及了。目前在四川,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字库塔在绵阳市盐亭县,仅图文记载的字库塔就达 29 座。在盐亭麻秧乡檬子村,还有一座全国唯一的关于字的牌坊——“惜墨如金”牌坊。盐亭县的字库塔分布之广、数量之多、造型之丰富,在国内首屈一指,有国内“字库塔第一县”之美誉。

5、“天下人”与维京人分水岭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

何新教授的“新浪网”上博客 2019 年 3 月 26 日发表《高级黑:一切文明起源于中国?》的文章说:最近有论坛上出现一批耸人听闻的奇谈——诸如英语来自古汉语,英国人的祖先来自中国湘西;鼓吹一切西方文明都起源于中国的各种胡说八道,无不破绽百出,基本毫无根据,多数用似是而非之论冒充为学术定论。以老夫的眼光看,无非是有人要阻遏近年兴起的对西方伪史的各种合理的怀疑,以耸人听闻的极端主义胡说八道,来解构人们对希腊、罗马、印度伪史的种种合理怀疑,从而把这种合理怀疑淹没进一片貌似文化的胡说八道之喧嚣中。从而,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发生困惑、疑惑。不过老夫早就老糊涂。老夫有时甚至相信,何止全部文明,也许全人类都起源于中国 DNA——别说老夫是胡说八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何新教授之前,在“新浪网”上博客还转载发表过《驳斥鼓吹人类起源非洲的洋奴》的文章说:

目前非洲起源说不可推翻,但非洲单源说绝对不占上风,亚非都分别出土各阶段年代相近的化石,于是单源论者就找借口他们都不是现代亚洲人的祖宗,他们在非洲人过来之前就已经灭绝,要不被非洲人杀光,这是找不到理由的自圆其说。先来分析灭绝说,单源论者能给出古亚洲人具体灭绝时间的证据吗?他们理由是冰期把古亚洲人都冻死了,他们不知道冰河期波及范围就来妖言惑众。事实上冰河期中国南方并未受到太严重影响,东南亚和南亚仍然一堆跟非洲赤道一样温暖的热带雨林,东南亚也出土了那时代的化石,证明冰河期亚洲人类并未灭绝。

接下来分析屠杀说,先不说原始部落山长水远能一个不漏屠光当地人几率如大海捞针,究竟非洲人有什么比亚洲人优秀的地方?为什么只有他屠杀别人没有别人屠杀他?而且作为外来者对环境适应性不如当地人,部落争斗都是为了生存,不到饥寒交迫地步谁会跟别人拼命,原始人类种族辨识度低,种族内部自相残杀不亚于种族间,谁能保证看着跟自己相似的物种不会误认为同胞互相融合,中国也出土了各阶段化石体征也符合。

于是单源论者就改玩基因,把它们歪曲成只是长得相似的堂兄弟,太久远的化石无法提取 DNA,他们这招其实是自抽,非洲远古人类化石也无法提取 DNA,意味着否认古亚洲人是现代人祖宗,等于也否认古非洲人是现代人祖宗。他们又拿非洲人基因多样性和最古老的基因。在非洲还有离非洲越远,因素越少说事——假设有这个可能性,非洲其中一支迁徙欧亚,把当地人杂交掉,语言影响当地人,杂交的后代又同化更远的地方如此类推,所以离非洲越远基因越单一和因素越少,至于谁的基因更古老根本无法判断不值一驳。

单源论者把非洲单源论,跟宇宙大爆炸相提并论,请不要侮辱宇宙大爆炸。早期欧亚非古人类化石,化验 DNA 三样其中之一证据,非洲单源论和多源杂交论可能性也就五五开,谈不上哪个占上风。至于生殖隔离,他们把多地起源狭义化,理解成只有各地猴子独立进化成人才算多地起源,多地起源不一定要完全断绝来往,在每一阶段进化过程中,只要各种群一直保持基因交流就不会生殖隔离。有人说:在文史研究问题上,要谨记钱学森先生的告诫:“有几分科学证据,说几分话”——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助于深入研究问题。但这也不容易,文史研究是政治与科学交汇;科学还有理论的近代与前沿,验证还有先进仪器的使用和一般的分析。

例如,李进省长提出的“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要解决,面对国内国外的各自为阵,说明不是一批专

家单纯用史料和文物能决定下来的。本文借用“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来科学解读，是几十年间笔者与各派专家交流的最新感受——到“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俄罗斯”等旅游，看到各路导游宣讲，把早期“维京人”的工匠、水手、探险家、商人和海盗、掠夺、杀戮行为等结合的历史，以致把所谓“宫保鸡丁”说成今天的旅游资源：“宫”是看皇宫；“保”指看城堡；“鸡”指看“基督教堂”；“丁”指看“议会厅”——使后维京很有成就感。

实际却是这样，世界第三极立足于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青藏高原东西两面分开形成今天的不同，中国科学院汪品先院士说：青藏高原两边是“东亚文化赶欧洲文化”的实际情况；他呼吁建立“中国学派”。

1) 维京人与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

汪品先院士说，科学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青藏高原两边的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正是当今世界多种文化中的两大主流——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占据着自然科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东亚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一旦也能成为科学创新的基地，也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学派。

A、中国学派的当代困境

汪品先院士说：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基础研究突飞猛进，从追赶尾随开始发展至今，已经到了重新考虑战略布局，实现“转型”，“问鼎”学术引领层，也就是出现“中国学派”的时候。但由于自然科学的国际性质，学派需要国际承认，靠国内宣传或者册封都是无效的——真理只有一条，但通向真理的道路却不止一条。通过师承共事或者学术争论，学术界会形成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团队或者团队群，这就成了学派，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法作出科学贡献。拿我自己从事的海洋地质专业来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北大西洋，就被认为是海洋的标准。海洋如何产生是海洋地质头号的大问题，北大西洋海盆的张裂过程，于是大家都相信这就是真理。

但汪品先院士说，最近几年在南海三四千米的深海底，大洋钻探计划用六个多月打了 12 个站位的深井，取上来 300 多米海盆张裂时的岩浆岩其研究结果，却挑战了传统的认识——中国的古文化里确实含有不利于科学创新的成分，历史大浪淘沙的结果，现在中国在世界基础科学的舞台上处于被动地位。面对现实，当发现与前人所说不同时就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削足适履”，尽量去凑乎原有的模式；一种是根据新的发现，去完善、甚至去纠正前人的模式。后一类的成果当然不容易发表，因为评审人一般都不喜欢反对派。因此，还需要由管理层面出手，采

取措施鼓励新观点、甚至新学派的出现。至于科学家个人，两百年来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经常摇摆，不是崇洋媚外，就是仇洋排外。这两者的根源其实都是对“外”并不了解，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平起平坐，既不尾随紧跟，也不夜郎自大——当前国内评价系统贬值，“国际领先”的标签随意乱贴。在科学上只有建设独立发展能力，形成自己的学派，才会真正确立国际竞争力；只有将民族传统与先进科技相结合，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这使笔者想到 2019 年 6 月 16 日第七届四川省嫫祖文化研讨会，段渝会长的《巴蜀艺术与近东文明》学术报告中，用李济先生的“英雄擒兽”图式，把四川三星堆遗址中的部分古文物，与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国家的文物作对比，也发现很多类似并有创新的“英雄擒兽”图式，这虽是有学术水平的研究。但在《南渡北归》书中，讲述李济先生在抗日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所西迁成都李庄的艰难岁月，不辞辛劳整理研究殷墟遗址上被随同西迁的古文物，但由于我国中原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在编年历史上比中东西亚等方面的古文明发现的古文物遗址，时间要晚一些。这使三星堆等考古发现的成就，和这种类似的对比，在今天已却被苏三、朱大可等一批学者著述认定为“中华文明来源于西方文明和中东西亚文明”——这是否正确呢？

其次，当天会上雷波县总工会苏杰兵主席的《古蜀文明与“宇宙人文论”的历史渊源之我见》报告，谈古彝文——苏杰兵主席是彝族人，曾与吴华清先生发表《浅析彝族古彝文与三星堆金沙陶鸟文以及汉文英文的字母关系》论文，都与刘尧汉教授认为：云南金沙江南北两岸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致。但古彝族和汉族源流时间上如何统一？

B、维京人与最先的资本主义及转型之谜

欧洲学者把古希腊和意大利最早居民排斥在“维京人”之外，与以资本主义的兴趣划线有关。14 世纪从经济基础上看，意大利已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需要突破封建制的束缚，文艺复兴可以说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反抗封建势力的一大胜利。当时的人道主义也就是 14 世纪至 16 世纪当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原始资本主义积累刚开始的时期，出现的文艺复兴先进资产阶级宇宙观。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解放个人，并废除对于经济的束缚，因此在文学上便发生了主张个人自由的宣传。

在追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当时的思想便转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所以人道主义的时代也就成了古代的文学和艺术的时代。那么最先单独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是谁呢？是荷兰。这里有很多因素。1588 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了海上第一强国，于是海外贸易大大地发展起来，资产阶级

得以积累雄厚的资本，这就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而尼德兰原为西班牙的属地，在16世纪时工业已趋发达，而不堪西班牙的重税繁刑。惧恐西班牙工商业的凋敝覆辙的尼德兰的资本家们，因信仰新教（喀尔文教）又受到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迫害，甚至尼德兰的贵族和天主教僧侣都感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排斥（因西班牙想将尼德兰自治区并为行省），因此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于1565年结成秘密组织，发动人民起来向西班牙革命，腓力二世用了阿尔发公爵的恐怖政策，在尼德兰设所谓“除暴委员会”，当时称为“流血委员会”，用宗教法庭残酷地镇压尼德兰人，被处死者超过8000人。尼德兰小贵族们所领导的森林游击队（西班牙贵族称为森林乞丐）也被消灭。

1572年尼德兰北方工人和水手组成海洋乞丐，荷兰和西兰两省的总督奥兰治的威廉，组织了雇佣兵和西班牙人作战。后北方诸省组成联邦径直称为“荷兰共和国”，又由英国舰队的帮助，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腓力二世终被迫于1609年承认荷兰共和国。荷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到此便因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而后他们便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并且在海上大力发展贸易，东至亚洲，西至美洲。

经济上富裕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掌握了三级会议大权，所以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说明了下层人民及工人阶级是共和革命的主力军，必然会最后占据整个共和社会和联系青藏高原东亚“学习”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积淀的“天下道”。当然，荷兰革命后的强盛，给英国也给欧洲提供了建立传授“学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榜样。同时也完成了欧洲“维京人”改头换面，书写曾创新远古历史的前奏。

例如，当代俄罗斯学者苏尔科夫教授说：“俄罗斯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俄罗斯历史上的国家模式内核形式——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要立于欧亚大陆中心地位，不要做中心的边缘这样的思想，就是俄罗斯的生存发展模式”——“俄国历史上在15-17世纪，伊凡三世所建立的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8-19世纪，彼得大帝建立的俄罗斯帝国的形式；在20世纪，列宁建立的苏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家模式虽表现不一，但内在本质的国家历史结构要素是一致的”。

苏尔科夫教授著书立说，毫不讳言在俄罗斯的意识中，东方总是落后的，西方是先进的。俄罗斯在历史上国家结构的基础，本质就不是深暗国家，其“外生性”——即日益强大的、领土不断扩张的多民族一体性，“使俄罗斯从来都认为军事的重要性高于经济，高于从事贸易的商人。这也符合俄罗斯国家历史上钟摆式的发展规律：俄罗斯的历史总会

有一个爬坡、强盛、崩溃、衰败，再起来再爬坡的过程。在俄罗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是财政预算人员，是公务员，也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农民，散布在俄罗斯国内，做调查也调查不出来，通过社会学问卷也调查不出来，但是当俄罗斯国家历史出现衰败转折的时候，这批人可以把国家拉回正确的轨道——俄罗斯实行保守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最终实行都是符合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发展道路”。

其实，苏尔科夫教授作为欧洲“维京人”的后裔学者，他把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无产阶级革命发源，混淆联系在一起了；不懂得马克思和列宁，全面地研究了当时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揭示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是必然的，反对在他们以前所存在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挑明阶级斗争如果使用暴力，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目的是类似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列宁承认虚数。

2) 马克思、列宁论共产主义

把“维京人”的暴力、恐怖特征，和资本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并等同统一，这类文章公然指向马克思、列宁，胡说“曾在前苏联、东欧共产国家和中国长期供奉的马克思、列宁，在19和20世纪一系列颠覆各国政府的革命运动，包括巴黎公社暴乱和俄国的十月暴动；已经准备好的文件资料公布于众，就是《共产党宣言》”。

16世纪俄“维京人”搞扩张时，美英法德日意等后期列强，还远远没有唱主角。在18世纪日后的路上，曾给予俄“维京人”迎头痛击的清帝国，也终于在鸦片战争之后迅速衰落。唯有俄“维京人”帝国，在战火与变局中，艰难地维持了下来。这下一轮的扩张，被俄“维京人”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赋予新的名称“黄俄罗斯计划”，便是从海参崴到乔戈里峰那条长长的直线。《尼布楚条约》之后的清朝地图，那条红色的直线，就是“黄俄罗斯计划”。

针对“维京人”沙皇俄国的“发家史”和民族性剖析，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内幕》中指出：“它把主子的野心与奴才的狡诈撮合在一起，使其对外行为表现为惯于欺诈和扩张的特征”。马克思还在《鸦片贸易史》中讲：“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注：1858年天津条约）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可见马克思不但关注欧美新闻，也同时在关注“彼得堡的电讯”。所以，“维京人”列强侵略的所有这些负面，应该说不但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区别，而且也是无任何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克

思、恩格斯曾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22篇关于中国事件的评论。这组不朽的檄文，无情地揭露鸦片贸易的卑劣，严厉地谴责“维京人”西方殖民者的海盗行径，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

而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英国等以维护鸦片贸易为目的，以中国禁烟是对英国的“侵略”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于鸦片贸易，为什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不向中国输出工业品，而向中国贩卖印度的鸦片？

表面上看，在中英正常贸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英国工业品在中国没有市场，而中国的丝、茶，却是欧洲市场的抢手货。当时的中英贸易，主要就是英国用白银买中国的丝、茶。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等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拉开了充满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疆域”历史的一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继以拓展对华贸易为目的，以中国在“亚罗号”事件中违背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不是生活在共产党掌权的类似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不能像我国现在的学者那么尽情表达。马克思不但要为写作来求生存，而且也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任何有良心的人的推敲，做到知行合一、共建共享。这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里，马克思一再表达他的这种理论建树原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发表的许多精辟评述，今天来学习，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对看世界，看未来，看历史，都是中国的前进值得永久的怀念。

因为今天来看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起因源于鸦片贸易，所以也可以说是和维京人打的最早的“贸易战”。但那时的“贸易战”还不是要改变中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瓜分中国的领地——即我们要说的“中国疆域”困境，为马克思和列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反过来马列主义也能照亮“天下道——大同世界——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要把“中国疆域”记在心上？因为结合现实和中国远古文化历史、传说，他们在大量阅读的各种资料和书籍中，对他们绘制未来新联合国蓝图早已有昭示。

例如，远古联合国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结束前后的中国，都遇到要解决大量灾民、难民、饥民、移民等难题——办法是向未开垦又可开垦的地方搬迁。由此也许马克思、列宁想到的是：“西伯利亚”好绘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国蓝图——拿起地球仪一看，亚洲的西伯利亚和中国，与美洲

的加拿大和美国，类似人的左右两肺叶。在白令海峡建海底隧道接通，亚欧和美洲可连成一片。而西伯利亚和中国以前原是一体，加拿大和美国在建国前也是一体。“两叶肺”配合活动起来，蓝图就活了。所以后来列宁能读懂马克思包容增长的全球化思想从哪里来？也就是从被沙皇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期产生的。

西伯利亚汗国的领地，西至乌拉尔山，东至鄂毕河，向北直达北冰洋，其统治中心正位于额尔齐斯河一带，受其影响和归宿之地，正是《世界领域志》所述人类文明第二个孵抱期巴蜀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盆塞海干涸，迁徙到西伯利亚荒芜之地聚居的，除蒙古民族外，还有突厥诸部落与诸如奥斯恰克人或是汉特人的远古联合国民族。直到186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阻止了俄“维京人”帝国的南下，而被康熙皇帝放弃的外兴安岭以北的土地，则被俄东正文化帝国继续蚕食。18世纪堪察加半岛与阿拉斯加相继并入俄“维京人”帝国，整个亚洲从此历史面目全非。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之时，亲身感悟到马克思从中国鸦片战争研究远古联合国文化和全球通史的睿智。于是列宁埋在心里的，这也才是他亲身感悟到的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伟大和全球通史。列宁早就设计了未来联合国的远景：他要把俄“维京人”侵占的比中国本土还大的西伯利亚拿出来，交给新联合国共管。这可以安置全球因战争、恐怖、天灾、革命等，产生的数以千万计的难民、灾民、饥民、移民。而富国、强国、责任国等，按能力和国家利益的平衡，分配出资帮助这类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家园的重建，天下才能把花在战备、战争上的钱，用来保本土平安和民生，联合国才像联合国，而不是“分好国”。

十月革命炮响后，列宁提出建立欧亚联合国的设想：依法治国，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进出由人民自决。列宁的设计非常英明，不愧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一百年已过去，还有大人说这是列宁，埋在俄罗斯大厦下的“定时核弹”，可见英明；又说列宁杀沙皇全家不对。但《列宁在十月》里已说明，杀沙皇全家不是他亲自干的，而类似两人打架，该出哪手拳？不该出哪手拳？是无法避免的。所以不管说列宁有多少不对，但不完整准确理解马列，只通赢通吃难保不解体。

由此来看有中国学者说：1689年9月7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对疆界划分与归属称谓使用的“中国”与“中国人”称呼，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第一次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但这仅是一个事实，并不代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承认中国疆域就如此开始。例如，刘慈欣先生在获2015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书中，在开头第8

章“寂静的春天”中，刘慈欣用“科幻小说笔法”，借用书中写的人物程丽华的话，记录一段历史事实说：“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但这不是真正列宁和马克思要立的“心中的共产主义”，而类似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说：“破心中‘贼’难，破山中‘贼’易”---反其意表现在身外，这是要立的“山中共产主义”。

因为列宁 1917 年 6 月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首次表明要采用“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政策讲话。原因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掌管俄罗斯，面对超级庞大的国土，俄罗斯已经有些消化不良。列宁才倍感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主张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由此各国就可以按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公约，进行正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办事的思想---这类“天下道”，列宁由此，最后完成和登上列宁主义的高峰。

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传播，是双向的。西方有人到中国经商、传教等活动，会传播西方的一些文化；相反也会有中国人，到西方国家考察、打工等事情，传播中华文化---“天下道”---爱国爱家，“天下为公”、“合天下于一”。在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俄“维京人”帝国仍肆无忌惮占领别国疆域。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真正信仰的列宁，才是第一个反对侵占中国疆域领土的俄国人。

且不说 1922 年在原俄“维京人”帝国领土境内，形成的数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民族政治实体，在国家面临解体的现实危险下，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管控各国分歧，把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当时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受命主持起草了被人称之为“斯大林自治计划”的方案。斯大林是主张沿袭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实行的单一行政区划的，他把这一方案提交给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已独立的共和国，和俄共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结果是，格鲁吉亚、乌克兰等领导人反对。

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于 1922 年 9 月 22 日，将他主持起草的民族自治化方案和各方面的意见呈报给列宁。列宁是主张不要俄“维京人”帝国文化式扩张的，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不是通赢通吃，就否定了斯大林的方案。列宁指责斯大林，是大俄“维京人”帝国主义，认为他缺少耐心，提出重建合作共赢管控分歧的欧亚共和联合国。但俄共中央全会讨论，也不赞同列宁的提议，而改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74 年后的 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依法解体，这是马列主义

的胜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但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俄国历史学家瓦西里耶夫教授颠倒黑白还宣称：签订《尼布楚条约》“是在丧魂落魄的恐惧感和暴力的影响下签订的……一切都给力中国，不曾给俄国一点好处”。到上个世纪 60 年代，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更是对这个条约进行了重新评价。比如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现任俄罗斯汉学家协会会长、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顾问、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荣誉会员米亚斯尼科夫教授认为：“清帝国的北部边界，是阿穆尔河以南几百公里的柳条边”，他还把雅克萨之战说成清军入侵俄国，从而强迫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米亚斯尼科夫教授写了很多类似的这种荒诞不经，颠倒黑白的著作，观点总结起来，就是俄国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边界问题，但清朝不予理会，只是采用武力的手段来解决，入侵雅克萨，强迫其签订《尼布楚条约》，因此这个条约对俄国是不平等的，是耻辱！另外他还认为，明帝国的边界就是长城。无耻至极。

16 世纪俄“维京人”开始侵略中国，到 19 世纪“维京人”西方列强也开始侵略中国。在历史上，断送中国疆域土地的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中，作为第一个大清国不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断送了比现在的中国还要大的约 1000 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割让给了俄罗斯，一直受到马列主义的创始人的关注和思考。因为马列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光是搞阶级斗争，建立政权，通赢通吃，而是要为全人类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繁荣稳定，把握好新世界大方向，推动世界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所以马克思和列宁都从“西伯利亚”分析入手，绘制实现这种新世界的曙光蓝图，这也是为知识分子在找正义家园的归宿。因为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历史责任不同：后者最终是以文化教育后人。没有正义，就把握不好新世界的大方向，推动世界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把实践中的失误归结于马克思和列宁搞阶级斗争，是“乌奸文化”无正义可言。

网上有人说：在美国破产发生挣扎的时候，有可能出现核大国相互动用核武，造成地球生物的毁灭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样的可能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设想怎么来避免。现在的美国最大的债主是中国和日本，这两国都拥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债券。那么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俄罗斯归还海参崴和库页岛给中国，那么中国可以将现有的百分之 90 的美元国债转为俄罗斯持有；反正也是拿不回来的财富，不如实际点换回可以为我们创造利益的土地。日本也一样，可以转让手中百分之 90% 的美元国债为俄罗斯持有，以换取俄罗斯和平归还北方四岛。这样俄罗斯就拥有超过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债券。

也就是说俄罗斯拥有随时摧毁美国经济的经济力量。一直处于美国压力下的俄罗斯就可以胁迫美国放弃核武器。前提是，俄罗斯向全世界宣布，不在美国本土使用核武器。虽然美国官员不会相信这样的承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以避免美国破产和经济崩溃。

美国航母和核武器的销毁，从外部消除了俄罗斯的最大危险，这样就有可能使得俄罗斯同意放弃现有的既得利益，只要中国和日本答应在回收的土地上不驻军，只事实管辖发展经济，俄罗斯是有可能放弃他们并不重要的土地。美国的军事消失，对俄罗斯是一个大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虽然现在在美国人难以接受，但这样的前景总比出现伊拉克或者叙利亚那样的境况要好得多。美国的精英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回过头再看特朗普政府，怎么样的行为都不是很重要了，所以不用在乎特朗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让子弹飞一段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可以放飞思想，想象怎么使得世界和平持续发展。当然，假如强加的战争来临我们也不怕，敌人来了有猎枪。

3) 俄罗斯史记述维京人海盗抢劫、贩卖奴隶

2019年5月18日--5月31日在“北欧四国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尼亚+俄罗斯”旅游，听导游解说：在蒙古游牧民族占领欧洲两百多年里，和俄罗斯人通婚较普遍。所以西方有“维京人”的后裔说：“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人以及斯拉夫人也不是一个血统纯粹的族群”---这其中既包括黑发褐色的高加索人种，也包括红发或者金发白种的北欧白色人种。斯拉夫人这个统一名称其实是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兴起以后才有的称呼。这之前阿拉伯人，日耳曼人和拉丁人从来不管斯拉夫人叫斯拉夫人，而是有各自不同的称呼。只有东方罗马帝国人有斯拉夫人这个称呼。而俄罗斯人（罗斯人）与斯拉夫人的关系，所知较早的文献可能为14世纪中叶的《大波兰编年史》。书中讲到三个斯拉夫民族（捷克、波兰、罗斯）的祖先捷赫、莱赫、罗斯三兄弟的故事。这三兄弟的父亲叫潘，是潘诺尼亚的统治者。

三兄弟各自建立了国家，即：捷克、波兰和罗斯；但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和瓦·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斯拉夫人最早居住在多瑙河流域，与罗斯人并非同一来源。罗斯人是来自北欧日耳曼人的分支。斯拉夫人把来自西北的日耳曼人称为“瓦兰结亚人”或“罗斯人”，最初是对北欧的瑞典人（维京人）的称谓，这个词起源于古诺尔曼语，意为“划独木舟的人”，引申的意思是来自北方的商人。而中国史书关于俄罗斯的最早记录---《元史·兵二·宿卫》记载元代军部设置有：“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这里的“斡罗思”为元代俄罗斯的

音译，这是俄罗斯一名始见于中国史书的最早记录。但是这表明，在元代的时期，俄罗斯人还没有形成国家。

当时的俄罗斯人隶属效忠于元帝国的北方军区，是元帝国的属部落或者部曲。俄罗斯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传疑的基辅公国时期，蒙古帝国殖民地时期，莫斯科公国立国时期。俄罗斯民族的混合构成---俄罗斯位于广袤无际的欧亚草原和俄罗斯平原地区，古代曾经在此居住的人口和民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从公元6世纪初起，东欧的斯拉夫人也加入了民族大迁徙的行列，向罗马帝国进攻。战争和迁徙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东罗马人终于遏阻了斯拉夫人的南侵。

大批斯拉夫人留居多瑙河以南和巴尔干半岛，他们以后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和塞尔维亚公国，形成南系斯拉夫人。居住在维斯瓦河流域的斯拉夫人以后建立了古波兰国，波兰人和住在易北河上游的捷克人形成了西系斯拉夫人。至于斯拉夫人的东系，史料不见记载。据推测，他们从多瑙河迁居到了第聂伯河流域。中世纪以后，从事原始农耕的斯拉夫人成为乌克兰草原和俄罗斯平原地区主要和比较稳定的居民。大约在9世纪中叶，一批从事商业和掠夺的北欧“维京人”（诺曼人）出现在俄罗斯欧洲平原地区的土地上。他们早在公元第六和第七世纪，开始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经商和劫掠。

强悍的北欧维京人从事着强盗和商人的双重工作。他们被称为海盗帮，经常抢劫财物，掳掠斯拉夫人口为奴，运到君士坦丁堡出售。他们自称为罗斯人---这个语词的意思是“桨手，驾船的人”。到公元八世纪的末期，维京人沿着伏尔加河南下，控制了航运和交通线，沿途设置要塞来作为防卫。在公元第九世纪，维京人控制了今日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成为贵族领主，他们把斯拉夫人变成奴隶和农奴，从而控制了斯拉夫人。9至10世纪时期，在俄罗斯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瓦良格人的公国。如：诺夫哥罗德的留立克公国，白湖的西纽斯公国，伊兹波尔斯基的特鲁沃尔公国，基辅的阿斯科里德公国等。

到11世纪初，瓦良格武装商人还控制了黑海沿岸，以至于黑海当时被阿拉伯人称作罗斯海。此外，在中古时代的南俄罗斯草原地区，居住着一个突厥血系的强悍游牧民族钦察人。这个人群对俄罗斯中古时期的历史影响也甚大---维京人、斯拉夫人和钦察人，乃为构成俄罗斯民族的三大基本族群。来自北方的维京人商人和海盗，斯拉夫人称这些来自北方的维京人为瓦良格人，“瓦良格人”这个词的意思是商人。西方史学认为，维京人即诺曼人，属于日耳曼民族北支，原来居住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后来为了开辟东方商路来到东欧平原，活跃在欧亚商路上。

来自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和香料，是欧洲人的生活必需品。汉代以后，从长安到地中海，通向意大利、法兰西、不列颠群岛，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但是5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蛮族横行西欧，生产萎缩、商贸萧条，地中海渐渐成为一片死海。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兴起，控制了地中海海运，以及中亚、西亚、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不断袭扰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沿岸，封闭了经西地中海到东方的商路（丝绸之路）。这就迫使西北欧的人们寻找和开辟一条新的商路以通往君士坦丁堡和东方，于是来自瑞典的维京人打通了从北欧经过俄罗斯、乌克兰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南俄商路。

瓦希商路的开辟和衰落——瓦良格人为了与君士坦丁堡及阿拉伯人进行贸易，进入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瓦良格人的商队是武装商队，由军事首领统率千百个侍从兵，依靠劫掠来的各种货物，主要是毛皮和奴隶等运到诸如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进行出售。从瓦良格到小亚细亚半岛（也叫希腊）的瓦希商路，成为瓦良格人的重要贸易路线。瓦良格人的贸易主要取两条南北向的河道：一条沿第聂伯河南下航行至黑海，并沿其西海岸最终到达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货物卖掉，换成白银、丝绸和香料，再沿路返回。另一条航线是沿伏尔加河到达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市场，那儿的阿拉伯商人希望取得瓦良格人的毛皮和奴隶。瓦良格人南下进入里海，在里海纵向航行，然后换乘骆驼，经过长达650公里的陆路进入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巴格达。

通常瓦良格人出卖商品收回的是白银，有时也会换回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瓦良格人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白银的供给者。而瓦良格人能够交换的除了皮毛、蜂蜜等外，最大宗的商品就是斯拉夫奴隶。瓦良格人打劫各斯拉夫村庄，强迫他们纳贡以至进行抢劫，将掠来的俘虏卖为奴隶。十字军东征重新打通了地中海的商道后，东西方的贸易不再需要穿越广袤而危险的东欧平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共和国蓬勃发展。尤其是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罗斯人丧失了南方的市场。一度兴旺的瓦希商路归于沉寂。

基辅罗斯的建立——在瓦希商路繁荣时期，瓦良格人在商路的沿途要地修筑了要塞。这些要塞逐渐发展为城镇。最大的商业城镇有两个，一个是北方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另一个是南方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前者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而后者成为南北运输的枢纽。诺夫哥罗德据说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建城于859年。俄罗斯史家认为，在瓦良格——罗斯人入主之前，东斯拉夫人已形成了三个准国家形态的部落联盟：诺夫哥罗德附近的斯拉维亚，基辅附近的库雅巴和梁赞附近的阿尔塔尼亚。但这些斯拉夫人的部落内部矛盾严重，相互争雄，

内战不休。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为了避免无休止的冲突，北方斯拉维亚部落于公元862年选派代表邀请瓦良格人的首领留里克作王公，进驻诺夫哥罗德的以维持社会秩序。

留里克偕同两个兄弟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率领武装亲兵来到诺夫哥罗德，自称大公，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其王统一直绵延至16世纪（1598年）。留里克统治的地区被称为“罗斯”。以后整个东斯拉夫人地区都被称为罗斯人。由此，中国元明时也称俄罗斯为“罗斯”或“罗刹国”。满清政府时，蒙语转译成汉语时，就成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另一支瓦良格人商队的首领阿斯科德和迪尔占据基辅，建立了早期的基辅城，与诺夫哥罗德罗斯分庭抗礼。留里克死后，其子伊戈尔即位，由留里克的堂弟奥列格摄政。

奥列格在公元882年沿瓦希商路南下占领基辅，并迁都于此。奥列格励精图治，四方征讨征服了周围的斯拉夫部落，合并形成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家。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皇帝联姻，东罗马皇帝将其妹妹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条件是要求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弗拉基米尔接受洗礼，并以武力强迫他的属民全部信仰东正教。此后，东正教成为罗斯人和东斯拉夫人的全民信仰。在统一宗教文化的熔铸下，来自北欧的瓦良格人统治者和广大东斯拉夫人融合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俄罗斯民族。

但以上所有关于罗斯古代历史的这些说法，都并无确切的历史年代史料依据，而主要是根据一些传说和推测而已。

对于欧亚草原上突厥种属的钦察人——近代俄罗斯土地广袤，横跨欧亚两大洲。其欧洲部分的人口主要为东系斯拉夫人和维京人。其亚洲草原部分的人口则主要是钦察人和蒙古人。钦察人可能属于突厥人的支脉，现在突厥语西北语支名为钦察语支，有些突厥部落是他们的后人。有人认为钦察人祖先与塞种的康居和月氏、乌孙有关。钦察人是古代欧亚游牧民族。俄国人叫波洛维赤人，罗马人称其为科马洛伊人，阿拉伯人则称之为库蛮，匈牙利人称其为昆人（匈奴分支）。大约在11世纪中期，钦察人从中亚额尔齐斯河流域向欧洲迁徙。俄国编年史在1054年第一次提到他们出现在黑海以北草原，建立了钦察汗的游牧国家，领地西起第聂伯河（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东北为伏尔加河中游地区直抵不里阿耳，东南到乌拉尔河。

特别是文扬教授在提及的全国性的一系列古人类遗址考古中，他把“资阳人”考古被遗忘了，好像新中国曾经的“资阳人”考古是一场“骗局”——这种情况，在目前大多数学者和历史专家中，似乎很普遍，为啥？古人类遗址在20世纪后半叶发现，

大多数是荒山野岭、沙漠丛林、人迹稀少的地方。这不奇怪----这些地方遗存容易保护，相反地理、生存等条件好的地方，被人类已经开放而不易保存；更不说类似“文革”扫除一切“封资修”东西的“红色风暴”。然而古人类的活动，就偏爱荒山野岭、沙漠丛林、人迹稀少的这种地理、生存等条件不好的地方吗？古人类就笨吗？

这是学术研究中“唯物”过重的一点误区，这类似党史研究中，只重视印刷品材料，而对“口传地方史”不予考虑一样----例如 2017 年 6 月间，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在绵阳市新世界宾馆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午饭后一些参会代表在宾馆大厅休息交谈。坐在笔者旁边一位来自成都的姓王的老学长，他告诉退休前是在四川省社科院作党史研究的，职称是研究员，这使笔者大感高兴。

就问：“王老师，我出生的四川盐亭县龙潭榨溪河畔地区，1936 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1934 年 10 月龙潭地区发生的‘西山坪’共产党游击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事件，延伸到 1935 年 3 月申秋成和何登甲等 300 多共产党员的游击队战士，被砍头英勇就义，刑场是公开示众的，所以在当地的传闻很多。直到 1980 年代中期，盐亭县文化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四川盐亭县卷》一书中，其中的民间故事还收集到王映维等写的龙潭地下党游击队领导人申秋成（申家成）和何登甲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斗争的故事。但书出版后又用笔注明这类故事“作废”，问文化馆赵方铭馆长，他说是县上领导通知申秋成和何登甲等 300 多英勇牺牲的盐亭县地下党游击队员是‘叛徒’。像这种相差很大的口传，王老师，你搞党史研究不？”

王老师说：“我们不研究。我只研究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上发表的资料，以及允许公开看的档案材料。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笔者明白王老师说“够了”，类似“基因组学”的测序负担。而笔者说的“口传地方史”考证有类似“暴露组学”----“除基因外，还要考虑表观遗传、蛋白组、代谢组与日常暴露，甚至还要考虑诸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地位、肠道微生物组等的作用”。

1) “资阳人”之乱

政治与科学纠缠，“层子模型”包打天下不行，那么“北京猿人”包打天下行不行？因为任何一个科技强国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00 年德国一批顶尖物理学家中出现的普朗克，才几经曲折站到了“量子”高地时代。后在发展出的量子隧道扫描显微镜，还有激光、核磁共振、核元素分析等常见的应用，对人类考古也十分有用，已成人类上古史大统一考古用的主流方法。小平同志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

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其实，“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就铸造有这种“中国梦”。

我国远古文明立足于山海时期，是在约公元前 5070-4170 年。但我国至今出版的 20 多种“中国通史”，和汗牛充栋的历史、考古通史类似论文，对上古时期的事情可能还没有摸着门，还不如钟毓龙（1880-1970）从古籍考证四川上古叫“梁州”。因为他说，上古“梁州”，指海水淹没山丘，只剩下山梁之背图像的转义，而赞成四川上古有类似的盆塞海。钟毓龙还认为，上古黄河因发生过类似的堰塞湖，才造成的大禹治水那时的大水灾。钟毓龙解放后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1936 年出版的《上古神话演义》一书，就是他以 1933 年四川叠溪大地震大灾难为背景，写作的 100 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提出上古梁州在四川，梁州即以盆塞海和大围坪地貌得名。

另外还有《“资阳人”发掘过程和品牌价值》一文说：1929 年发掘距今 70-20 万年“北京人”、距今 1.8 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至今也不知是在外国古董店老板的底柜里，还是在列强们的博物馆里，而刚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 35000 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可以放心地安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永远也不用担心被人夺了去。“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是由新中国的专家独立完成的，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化石，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这无疑是一大缺陷和遗憾。这除开和我国高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的个人知识造诣、时代历史的局限有关外，贾兰坡、裴文中、冯汉骥、张圣樊、吴汝康、王玉哲等都是我国的顶尖的人类考古学家，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资阳人”和“北京人”、成都和重庆等类似竞争的讳莫如深的不团结。

中药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说：金银花与山银花的药用价值，谁优谁劣？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综合判断，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仅根据某一化学成分的多寡，对“两花”的药用价值进行推测，未必准确。迄今尚未见到可靠的药理、毒理及临床比较研究证实金银花安全性、有效性及药用价值优于山银花。《南方周末》报道，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称国家药典委更名金银花涉嫌腐败：把南方金银花被 2005 版《中国药典》更名为“山银花”，金银花作为国家食药监总局前局长、现国家药典委常务副主任委员邵明立老家山东“忍冬花”的专用名，导致南方花农巨额损失，给山东金银花的开发商带来巨大利益。李连达院士说，山银花药价暴跌的真正原因，是不正当商

业竞争的结果。

人类学考古容易牵涉有利益的学术拨款，掌权高层也易走偏。程映虹先生 1959 年生，苏州人，1988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2001 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2014 年 7 月 30 日程映虹在《种族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评论中国古文明正统基石的“北京猿人打天下说”时，他说：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网上有一幅画画有两个人，一个形象是北京猿人披着兽皮，坐在地上点火；另一个形象是汉代壁画里那种，头上戴冠，穿长袍的人，手上拿着一个犁在耕地。画的下面文字说明是“驱除智人，恢复猿人”：戴冠、穿长袍的文明人是外面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而北京猿人是本土的。

程映虹说：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 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 170 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四川省文史馆员何拔儒（1863-1955）从四川远古盆塞海的“水”上做文章，提出“人类文明起源于大地震假说”，是早把《山海经》看成是《涸海古卷》，并以四川盐亭县榉溪河两岸，距今 8000 年左右犹存的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山寨聚落遗址，以及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的地貌为具体考古平台，加之在榉溪河畔的天垣盘垭村的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等，作的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基础，提出我国西部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的、四川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论的“盘古--嫫祖远古联合国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史的人。

因为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必然会形成同时期大面积的沉积物，这要用到计量地质学。上古四川堰塞湖变盆塞海，据何拔儒的分析，不是在约一万年前的四川盆地周缘山脉大量的堰塞湖，几乎全部溃坝的推测，而是推测由黄河及长江造成的堰塞湖--海，且堰塞湖--海不是长时期稳定的地质。由此远古人类从非洲走出，开始开拓有关远古中国盆塞海文明，这是一种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在约 20 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古智人，抓住陆路和海路的信息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 8000

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这就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是此后，发生的盆塞海干涸，今天全球其他的各远古大文明，从四川中国盆塞海文明走出分离，但也都打有她的显著山海文明的区域烙印。这就是人类政权现象和政权人物现象的人类文明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及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

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其后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遗迹海啸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 8000 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程映虹先生似乎无知“近十万年前从非洲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可以追溯到“盘古--嫫祖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程映虹说，有人把裴文中、贾兰坡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造成“把北京猿人引为中华文明有几十万年的历史”的这种上层的情况很复杂，而且也许不全是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的错。张森水研究员说：“上周口店工作，裴先生虽是为生计所迫，但一旦加入，他的工作和学习即达到废寝忘食、顾事业不顾家的程度。比如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周口店接到电报，回北京到医院探望师母和孩子，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郊，属房山区，距市区约 50 公里，自 1927 年开始系统发掘，在前后几十年的发掘过程中，先后发现了代表 40 多个猿人个体化石材料，十余万件石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张森水说“一个人的成功都有主客观因素，从客观上看，裴先生开始参加周口店工作，步林、杨钟健在古生物学上的帮助使他很快入门，随后德日进、李济和步日耶等人，又在古生物特别是史前学上给予了重要指导。1931 年到 1935 年是周口店工作最辉煌时期，这一时期裴先生还有卞美年和贾兰坡两位好助手，这些都是成就裴先生的客观条件和机遇”。

此外，对于中国古文明，在追捧北京猿人历史中，是否因为时代的局限而让外国人骗了我们？也难说。近代中华古文明科学研究方法的开创与文物的发掘，如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仰韶文化的开拓，由于有国外专家、学者和资金的介入，才取得进展。但外国学者的参与，单一的或传统的意识形态一边倒，恰恰对中华古文明研究有害。有一个例子是，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我国建国初人才缺乏，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但直到我国

改革开放，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进入大陆考察古文明的研究。这批学者中有人指出，半坡人塑像属白种古人，我国学者还不以为然。到上世纪 90 年代，有美籍华人学者回国，他们再次指证，半坡人塑像才得以改变。中国有些权威学者爱面子，他们维持的不太真实的中华古文明历史研究的框架，在国内外已造成有影响和冲突。

解放后，说是裴文中 1929 年发现北京周口店猿人头盖骨化石后，才轰动的国内外。1929 年前后，发掘出北京猿人有外国人吗？毋庸讳言，最初北京猿人考古，是由外国人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指导。争“北京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一位少数民族学历史的博士研究生，写了一本 40 万余字的古史专著，论说北京人头盖骨属于是古苗族人。他的思路可简单归结为：《史记》等古籍记载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于涿鹿；而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蚩尤是苗人的部落首领，说明那时中国远古苗族人早已从中国东南部沿海发展扩散到河北及北京一带，受到从中国西部向东部发展的炎、黄部落的侵略。既然苗族人早就定居在北京一带，所以苗族人是北京人的祖先。

裴文中(1904-1982)，1927 年 25 岁，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29 年发掘出北京猿人，说裴文中等人先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但在周口店陷入困境。是裴文中、贾兰坡他们作了几方面的改进尝试，才有进展的。时间顺序是，1928 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1889—1971)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1897-1979)做后勤管理。杨钟健是领导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的。从 1929 年起，杨钟健与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是一直合作的。1955 年杨钟健被评为院士，翁文灏没有被评为院士。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长时间在中国进行古人类学、地质学考察，是在中国生活了 20 余载的法国人，在中国参与了对史前文明的研究，参与了周口店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被认为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其实早在 1921 年，由中国北洋政府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和一处含动物化石的裂隙堆积后，1921 年安特生与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及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等人，在周口店当地群众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又找到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点，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第 1 地点”。他们在 1921 和 1923 年，先后发掘出两颗人牙，并定为人属的人。

由于这一发现，1927 年才在周口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是由瑞典古脊椎动物学家 B. 步林和中国地质学家李捷主持；当年又发现 1 颗人的

左下恒臼齿。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对先后发现的 3 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北京中国猿人”。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1870~1946)则给了它一个俗名：“北京人”。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改称为“北京直立人”。在《贾兰坡谈北京猿人》中，如果说 1929 年因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被裴文中发现后，才让“周口店”名扬中外，轰动世界。那么 1936 年 11 月 15 日至 26 日，贾兰坡在 11 天之内发现三颗“北京人”头盖骨，再次被说成震惊世界学术界。

贾兰坡(1908-2001)，河北省玉田县人，因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被称为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却攀登上了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成为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贾兰坡 1929 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因家境困难没能力上大学，只好在家边自学边寻找合适的工作。1931 年 23 岁的他由于偶然的机，考入中国地质调查所当练习生，当年被派往周口店跟随裴文中搞发掘。1935 年，裴文中到法国留学，贾兰坡挑起了主持周口店发掘的工作。

如果说 1929 年发掘距今 70-20 万年“北京人”、距今 1.8 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被丢失，那么刚解放就发现的距今 35000 年的“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原件，放在哪里的呢？直接用原件做过碳 14 法、铀系法等现代科技，测过它的年代没有？如果没做，为什么？

反之，复原的被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否像西安半坡遗址纪念馆，请前苏联专家帮助塑造半坡人像属白种古人，也许是无意，但移植到“北京猿人”头盖骨复原塑像，是否也搞成了白种古人呢？因为 60 多年来关于“资阳人”的报道、论著疑点很多，这与“北京人”研究相连。2001 年成都画院艺术交流中心副主任黄振富先生，在《文史杂志》第 6 期发表《贾兰坡和资阳人》；类同的文章《四川日报》上也发表过。他说“资阳人起起落落”，张圣英教授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后，并没有在手上停留，而是很快直接交到了北京他认识的著名考古学家和古人类专家贾兰坡手中。

原因是当时就存在有重庆大学张圣英教授，与四川大学冯汉骥教授等关于“资阳人”头骨化石的管辖权之争。因为主政川西行署的李井泉书记和他主管的成都专家，认为资阳距成都近，应由他们管辖处理，对在远在重庆的西南局插手有意见；从而对张圣英发现“资阳人”有意贬低，造成了后来的混乱。另外也有张圣英为了防备，他当时作的汇报

和交的书面材料，以及别人的问话，前后多有不一致的地方。

其实这是苏联人，用恩格斯做挡箭牌，掩盖做学问的懒惰思想。因为恩格斯书中明明说的是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作调查，发现的一种原始家庭结构的个案：即一列或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她们拥有的共同的丈夫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种婚姻关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助于人类发育和繁衍，就连一些动物社会也存在；并且动物社会也不仅是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也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一妻一夫制等等。因此可以看出恩格斯仅仅是从赞扬摩尔根的深入实际的科考方法来说的，但却被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编造为原始社会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在王玉哲数十年心力之作的《中华远古史》一书中，沿袭了前苏联的这种教条，当然不单是王玉哲个人的原因，但对中华远古史研究造成长期不讲王表、年表极大破坏性的影响。

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所谓的国家，其实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王玉哲先生困惑的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因为这种版图很小，连王玉哲自己也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这被称为“王玉哲悖论”。

因为王玉哲的这种看法，用的是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为是中华远古实际的疆域。他说的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但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王玉哲（1913-2005），河北深县人，1943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是我国先秦史的一位代表人物。而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代表的先秦史，并不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可。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一书认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但奇怪的是美国人写的《全球通史》，在“一、美索不达米亚”一节，开篇却讲：“最早的美索不

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就直说：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

而按西方的学术观点，所谓的源语指，或是在第一匹马被驯服，第一只狗不畏缩地被带到营火旁以前很久，就再也听不到了的最古老的那些原始母语，这是把世界上所有语言追溯到遥远过去说的源语。远古的四川人之所以叫蜀人，正是从人类的源语或母语学可以推证的：蜀人得名与烧烤有关——即蜀人是最早吃熟食的人。再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天垣传说：盘古王在盐亭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中国南方多盘古王的传说。而盐亭沿梓江河从章邦苏家山，到麻秧的苏家坝、苏家沟，再到玉龙的苏家湾，苏姓原住民很多。如果把朱学渊先生的经由以历史语言、语音、姓氏、地名等文化和文明的考据研究方法，引用来看从“熟”人、“蜀”人到“苏”人，有人想到两河流域出现的苏美尔人可联系“蜀”人，那么朱学渊先生也许也是能认可的。

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书中，已经明确北京猿人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中国原始社会史表”中的“资阳人”，是“新人”中最晚期过渡到“现代人”的中国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类，这正好说明近十多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在约三万年前已经到达四川盆地。远古人类文明，不在于人种从哪里来，而在于人类文化文明从哪里开始。因为著名进化遗传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带领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通过DNA分析得出结论：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金力他们从中国各地找了近1万例男性随机样本做实验，通过研究发现检测的这近1万名中国男性的样品，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遗传痕迹”。这是从DNA分析角度，支持“资阳人”带非洲起源又回归盆塞海创造文明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曾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终身教职，1999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教授（终身教职，2001年）。现为德国马普学会外籍会员、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理事、上海市遗传学会理事长、上海市人类学会理事长，以及《基因组研究》等7家国际

学术杂志的编委。长期研究人类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人类性状的进化机制，在遗传多样性分析领域提出了多个理论和方法；在基因组水平深入解析了东亚人群的遗传多样性的特征；阐明了东亚人群多个性状的适应性变异的分子遗传学基础。金力教授团队的 DNA 分析说明，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一书，淡化“资阳人”发现的世界意义，以原始氏族公社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阶段为纲，以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原始人类为源流的中国先秦史框架，也许是一个失败的探索。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力挽狂澜。这也许是李井泉书记没有想到的：“资阳人”是 20 世纪之谜。

从“资阳人”之谜能否揭开北京猿人之谜？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从被何拔儒破译，其中盘古到大禹 6 组年代数据，最难的也许是开头“法天法地时期”第一个人物“盘古”年代数据的界定；但这也也许是最容易破解的一个数据。原因是当时天垣此地就有“盘古”时代实存的材料，如天垣五面山及周围就有很多古山寨建筑。这里的古山寨建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主要房屋的屋梁柱上，都留有建筑时间和人物的姓名。这一习惯延伸到远古，在天垣樺溪河流入梓江交汇的玉龙镇的“祠堂坝”，就是传说盘古的父母劳动生活的地方。

即流入四川的下段西陵河的盐亭县玉龙镇梓江河坝，U 字型的河弯因搭救起许多从上游放逐下来的战俘、犯人、叛逆者和西来游客，反而成就了这里“西仔山”对面陶器工场的规模宏大，而被称为“祠堂坝”。广为流传的玉龙“祠堂坝”有 99 座古“祠堂”，超过 100 座就会出盘古圣人大大变革。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在“祠堂坝”荒岭开垦荒地，群众在挖开的芦苇、石子地下，还可见大量的土陶古陶器碎片。“远古联合国”的繁荣景象，如原始社会大工业等的传说，也许很多人不理解。其实，对存在原始社会大工业劳动的真实描写，就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有考古学家在新几内亚西部山区的朗达村，看到类似五、六千年前远古的石斧大工业制造场的情况：几百近乎裸体的新几内亚山民集中在一起，工场分采石、粗加工和精加工、磨制和安斧柄等一道道工序，把人分成若干工场区。远古落后情况下的石斧制造，已不亚于今日的铁制斧子的制造。如果在 20 世纪初，何拔儒当时还能拾到较完整的祠堂坝土陶古陶器，上面留有制作时间和人物姓名的蝌蚪文字，那么何拔儒等破译、界定盘古所在的年代数据，并不难。

关心、研究“资阳人”的有志之士，有大量关于“资阳人”的文章见诸报刊和书籍，但离揭开迷局还有多远？小平同志开创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的方向，能够复兴吗？习主席提出考察青藏高原世界第三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建立新

型科技大国”——其意义在多深的程度被众多专家、群众，能理解、领会和自觉去实现？

全国解放后，李井泉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治委员兼川西行署主任，直接受西南局第一书记小平同志的指挥。有人说李是邓的人，如 1952 年小平同志调离西南后李井泉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是小平推荐的。此后李井泉到中央开会，总要带上一些四川的土特产，去看望小平同志。到文革 1969 年小平同志被下放到江西，两家仍有来往。其实，李井泉被提升为四川省委书记等职务，是必然的趋势。两家关系来往，也是人之常情。这些不能说明，在涉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理顺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上，小平同志也不分轻重、不讲原则；在“资阳人”上正可比高。远。

“资阳人”化石涉及人类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的伟大复兴，是大非打非问题。解放后小平同志主政西南局，李井泉主政川西，修筑成渝铁路李井泉与小平同志争“资阳人”化石掌控权，小平同志没有给李井泉让步，这恰恰说明，小平同志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的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事实正是这样，如果“北京猿人”化石丢失是在解放前，掌控权并不全在我党专家手中，那么“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完全是我国掌控的解放后，就不应该出问题。但到今天连“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化石，“资阳人”是男是女，“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 3 万年前还是 7 千年前，等等，专家和媒体都还是众说纷纭，这又怪谁？今后还会发生吗？人们并不能肯定。

2) 与宜昌嫫祖之争

宜昌嫫祖研究发起的第一人曾继全先生，当年是宜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后调任作宜昌市建委副主任。原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均中先生，至今还在给笔者说到曾继全的故事——’94 宜昌会议，曾继全局长曾向盐亭客人介绍自己研究嫫祖的酸甜苦辣——他自学成才，思维敏捷，观念新奇，出于对祖国、家乡的热爱，为冷落了几千年的轩辕黄帝之元妃嫫祖高唱赞歌，听到哪里有嫫祖遗迹，就要去搜寻资料；夜里挑灯，查了若干典籍；自费打印，出文集；在《湖北日报》、《宜昌日报》上发文多篇。

多年的事实是，研究嫫祖的学者很多，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图书馆到湖南、四川、河南、江苏、山东社科院、大专院校等各地学者，从民间传说、地缘文化、地方文献、祭蚕民俗、文物古迹，丝帛文明、丝绸之路、女性文化、黄帝与嫫祖、文字与考古、古桑及化石等方面“各抒己见”——我们能体会到解开李进

副省长提出的“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的难题解决密码，不在嫫祖研究的盐亭与宜昌之争中——听宜昌市文联周立荣主席创作的“一带一路”主题歌《永远的嫫祖》的深沉、悠扬，你能说嫫祖不是宜昌出生或就是宜昌出生？全国各地多处争同一个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大家共同认祖归宗。

《永远的嫫祖》也会出她的优秀子孙《永远的任正非》——解答密码，正如2019年6月20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总裁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的采访时说：“我们形容自己是一架‘千疮百孔’的飞机，具体很多，每个洞都要补，现在有成百上千个洞，每个洞都要补起来，飞机才能继续飞。但是这架飞机的发动机和油箱还是好的，所以我们一边飞一边修补洞”。方法也如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总裁在华为总部接受央视《面对面》独家专访时说：“中美贸易的根本问题还是科技教育水平，国家一定要开放，才有未来”——“李进难题”的解决，只能靠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学者能紧跟科学的前沿。

以1994年7月12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宜昌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94中华嫫祖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宜昌市召开为例，宜昌市委、市府领导十分重视，参加开、闭幕式；市财政拨出全部会议经费；市建委投资数百万元，在明代曾建修有嫫祖庙的西山上恢复古庙——市级有关部门倾注心血，渴望通过研讨、参观、扩大交流，最后确定嫫祖生地。当年赵均中会长与衡平和王映维两位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带了200本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嫫祖研究》一书，嫫祖纪念章200枚，重要文物如古桑化石、石斧、金蚕、陶蚕等照片80余张和录相带两盒应邀参加。

曾继全局长热情欢迎，盐亭县嫫研会把书全部交给他，说明不收任何费用，只请宜昌在开大会时分送给到会的代表、领导、专家、学者。宜昌的主人们把书放到资料库房里后满口应承。但第二天大会开幕到大会结束，都没有把《嫫祖研究》一书拿出来分给大家。此期间赵均中、衡平和王映维都提醒过宜昌的主人，回答都是“等一等，要邀请你们大会发言”。就这样，他们摸不着头脑回到盐亭。

后来曾继全局长才打电话告诉已是盐亭县志办主任的赵均中先生，说《嫫祖研究》一书把他们“害惨了”——赵均中主任说，实际他和衡平、王映维等副会长，与曾继全局长想的一致，都不主张嫫祖研究搞“古年表、王表”和紧跟科学的前沿考古，因此他们和宜昌嫫祖研究发起人曾继全局长谈得很融洽，本以为一切会顺利安排。

《嫫祖研究》一书1993年7月正式出版，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嫫祖诞生在盐亭》。下编为《嫫祖与上古文明》——又分为两章：第一章为《古史迷

雾》；第二章为《嫫祖年谱初编》。曾继全局长说的“把他们害惨了”，指的是《嫫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主要参考文献为《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1992年第3、4、5、9、11期，1991年第4、7、8、10、11期”。《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本有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中译本公开正式邮局征订发行，但宜昌方面把它当成《科学美国人》的英文本，曾继全局长在1994年会后带一批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借出《科学美国人》的英文本1991年和1992年的这批杂志，进行中文翻译，然后查看中文，花了近两万元的经费，也没有看出个名堂。

《嫫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之所以简略，是因出书经费紧，为减少篇幅，编委会决定所有文章后不列“参考文献”。衡平副会长是老中学教师，他再三要求，编委会才同意他的一篇《嫫祖考》18页长文后，再列了近两页《附注》。《嫫祖研究》一书是笔者1981年4月从重庆调回盐亭就开始发起的工作，历时12年，到笔者再到《绵阳日报》社工作，组织找马敬洪市长批出书经费，找出版社，找绵阳市新华印刷厂，才把2000本书出版出来。

就是这次偶然相遇，五年后为解决夫妻分居，笔者请求调回家乡盐亭县工作。在重庆18冶时，笔者已想到家乡的嫫祖传说和蚕桑生产的发达，想改行搞科普。但县上以专业对口想安排去盐亭县农机厂，征求意见。笔者说想到县科委或县科协，组织上说县科委5个人已满，县科协一老一少两个人，但没人签字同意你去。恰巧何朝伯书记1981年刚调作盐亭县科委主任，县科委和县科协在县委大院门口一间房子里办公，暂归科委代管。在县委大院门口又一次偶遇上何朝伯书记，他知道情况后，他说他去找组织部，愿意代签字接收。

经过十年的修改补充，《基本粒子的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向现代理论物理学中的类点论挑战》的稿子，1986年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2期上，以《前夸克类圈体模型能改变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为题公开发表后，《北京科技报》、《信息报》、《信息时报》以“一道世界物理难题获解”作了报道。1987年绵阳市科委主任程宝隆同志，也是绵阳市科学学研究会的理事长，当年研究会要评选优秀论文，他组织召开评委会，有来自全市大专院校和在绵阳的国家科研单位的专家参加。会前他和他在科委工作的爱人，亲自帮助笔者填写《申报表》和复印在《华东工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交给评委推荐参加评选。但不想在评委会上介绍情况后，专家们都说看不懂，不同意评选。程宝隆主任耐心地解释说：“世界上只要一位懂行的专家能看懂，参评就应该评审；况且是在正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说明有多位专家审定

过，我们更应该再审定”。

这是给评委会出了一道难题----到会的专家都看不懂，如何审定？最后专家们同意设个“特等奖”，排在一等奖后。多年过后，一次笔者偶然遇到程宝隆主任，他说起评选经过，笔者万分感动。1987年笔者在盐亭县被选为绵阳市人大代表，第一次到绵阳市参加人代会大会开幕。程宝隆主任是作为市局级领导列席会议，他看到盐亭县代表团名单上笔者的名字，会后他主动找到笔者说：他看到《北京科技报》等报上“一道世界物理难题获解”的报道，但不认识笔者，也没机会找到笔者；这次借市人代会开会，请晚上到他家去一下，因为绵阳市科学学研究会要评选优秀论文，要填个表，他对笔者的其他情况不了解。晚上到了程主任的家，他和他爱人都非常热情，程主任说笔者的论文材料，他爱人在科委可以帮助复印。笔者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填了申报表就离开了。据说程宝隆主任是作平武县委书记调作市科委主任的，也是一位老土改干部，只是解放前他上过农校。

现在再过头来说笔者紧跟科学的前沿与嫫祖研究有什么关系？嫫祖研究，盐亭与宜昌之争，宜昌市公安局曾继全局长 1994 年带领一批专家也算认真，对笔者主编的《嫫祖研究》一书给予了审定。25 年后笔者可以把曾继全局长说的“把他们害惨了”的《嫫祖研究》下编书后说明：“主要参考文献为《科学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 1992 年第 3、4、5、9、11 期，1991 年第 4、7、8、10、11 期”的文献题目公开，并解说其意义。

《科学 (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 1991 年第 4 期是：《现代人类的出现》；第 7 期是：《古代城市的勘查》；第 8 期是：《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原始词语》；第 10 期是：《早期弓的设计与构造》；第 11 期是：《古代秘鲁的铜合金冶金技术》和《南岛诸语言的传播和起源》。1992 年第 3 期是：《基因、种族与语言》；第 4 期是：《骑马的起源》；第 5 期是：《部落战争》；第 9 期是：《分子考古学的动向----意味深长的遗骸》；第 11 期是：《最后的石斧制造者》。

笔者喜欢科学的前沿基本粒子知识，但当时国内能看到的书刊很少。1970 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重庆，能在重钢图书馆内看到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刚试刊出版的《科学美国人》的中译本《科学》，由此一直坚持看每期出版的杂志到退休。原因是《科学》除介绍有高能物理国际最新的进展外，还有类似以上可联系嫫祖研究的科学前沿的介绍。其实，笔者喜欢基本粒子和现代宇宙学，也是为了研究嫫祖、歧伯和盘古等家乡传说的人文始祖人物----产生宇宙大爆炸和基本粒子是约 137 亿年前，都搞清楚了，难道嫫祖、歧伯和盘古等人文始祖不到 1 万年

搞不清楚？实际只从古文献、注释，地方传说、祭祀祭奠遗存考证，只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要让国际上的专家明白和印证，在现代是需要高科技方面的说明材料，才能慢慢统一认识。

所以《嫫祖研究》一书开篇的《序》中说：“希望一切有关嫫祖是否为盐亭人的争论，最好抄当代高新技术的研究，如用分子考古学、遥感考古、地面勘查考古法、埋葬学等国际先进科学成就来争论”；至于文献传说、神话、民俗等仍是收集整理、再创作丰富的问题。

3) 与西平嫫祖之争

雷锋(1940--1962 年)，共产主义战士，出生长沙。1962 年 8 月 15 日在部队服务中不幸英年早逝，年仅 22 岁。

因为年代比较近和不是神话及人文始祖人物，“雷锋”和“雷锋式人物”容易搞清楚。作一点相似联系，把“嫫祖”和“嫫祖式人物”作类比解答“李进难题”，也许用年表、王表的历史进展顺序，把中华“天下人--天下道”因各种灾变、事故造成的“认祖归宗”统一。

例如，据“百度百科”整理，关于西陵氏部族的地望和嫫祖故里的认定，存在十余种观点：河南有三地：开封、荥阳、西平；湖北有四地：宜昌、远安、黄冈、浠水；四川有三地：盐亭、茂县、乐山；还有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和浙江的杭州。

由于古代文献上或多或少地有过这些地方为“西陵”或者与嫫祖传说相关的记载，所以认定这些地方为“西陵”并非空穴来风，也就无法完全排除这些地方为嫫祖故里的可信性。尤其是在四川盐亭、湖北宜昌先后举行嫫祖文化研讨会以后，嫫祖故里盐亭说与宜昌说在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百度百科”的具体操盘手的整理，不是用“抄当代高新技术的研究”，便也类似曾经的古文献注释，或多或少有倾向性----如倾向“西汉以前，西平一带称为西陵有较为充分的文字记载”。至于西陵在河南什么地方，《水经注》记载：西平县，“故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方睦于齐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尽管如今对“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也说明了西汉时期的“西平”和“西陵”大致为同一个地方。西汉的西平县属于汝南郡，1981 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发现汉简将近 40 枚，其中的“王杖诏令”简上有“汝南西陵县”等文字，西汉以后，这里又设置过西陵乡、西陵亭等与“西陵”相关的地名，进一步说明西汉将西陵改为西平是有史可证的，即：西汉前期和西汉以前，西平一带称为西陵，西陵之名可能源于远古时期的西陵氏部族。

又因与新郑（黄帝故里）地缘相近，增强了西平为嫫祖故里的可能性。原始社会交通极为不便，

到处是未曾开发的山林沼泽，决定了远古部族之间相互交往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地缘临近应该是远古部族之间进行通婚的重要条件，同时，通婚也是增强部落之间政治、军事联盟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要求西陵氏部族应该与黄帝部族具有较为接近的地缘关系。《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娶嫫祖之时，居于“轩辕之丘”，说明西陵氏部族应该距轩辕丘不会太远。明代的《广輿记》、《明一统志》、《天下名胜志》以及清代的《大清一统志》等文献均称轩辕丘在河南新郑，所以学术界普遍认同黄帝故里在新郑。以现今的里程计算，西平与新郑相距120公里，活动在新郑的有熊部族与生活在西平的西陵氏部族地缘相近，具备交往通婚的便利条件。相对而言，四川盐亭与新郑相距数千里，湖北宜昌一带与新郑虽然较四川为近，但也有千里之遥。新郑与这两地之间路途遥远、山水阻隔，地理等自然因素决定了黄帝部族与当时活动在巴山蜀水间的各部族的相互交往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如果西陵氏部族生活在盐亭或宜昌等地，会使黄帝娶嫫祖为元妃存在诸多不可能的因素。而且民俗、传说和考古材料，提高了嫫祖故里在西平的可信性。

这就是当代我国“学术界普遍认同黄帝故里在新郑”，嫫祖故里在西平的学术水平？任正非总裁说：“我们形容自己是一架‘千疮百孔’的飞机，具体很多，每个洞都要补”——说到点子上——不说盐亭县粮食局的老干部、92岁高龄的石云龙先生用了20多年时间著书立说，发表多篇评论1981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发现汉简将近40枚，其中的“王杖诏令”简上有“汝南西陵县”等文字，联系河南西平有误。就是一位1954年出生盐亭县富驿镇雄关太平村、只读过三年半书的小学文化的农民杨绍森先生，2003年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在该地新华书店偶然买到一本关于黄帝与嫫祖传说的书，书中写到嫫祖诞生地古西陵在今河南省西平县，他感到有些困惑。后来回到家乡写出长篇章回小说《千古丰碑》，2008年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后，有评论《认识“远古联合国”盼和谐一统的赞歌》，给予与西平之争的解读。

原来杨绍森先生家乡四川盐亭近一百年来有一批学人一直在研究嫫祖，阐述中国早期文明真正的辉煌。与河南西平、开封、荥阳说，湖北远安、黄冈、浠水说，山西夏县说，山东费县说，浙江杭州说、四川叠溪说等声称嫫祖诞生地不同的是，60万盐亭人妇孺皆知一个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金二伯射黄帝》的远古传说。但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所共知的人文始祖，能射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远古政治传说，使近代一百多年来盐亭的学人难以理解。

但它却揭示了中国早期文明为什么是辉煌的，它的光辉在于什么地方？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起点于约公元前6390--6210年的法天法地时期；二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地处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孕育了后来的东西文明；三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地处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说明它曾诞生过一个海洋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类似和谐一统的“远古联合国”。

把杨绍森和西南石油大学常健民教授作比较，从这两种不同环境的人出发可以看出他们是各展其能：常健民的盆塞湖和海啸遗迹地质考察，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杨绍森的长篇章回小说，是抓展历史的精神——《千古丰碑》是认识“远古联合国”盼和谐一统的赞歌。

2000年四川省出版的《文史杂志》第2期发表的《“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一文，列出了盘古至禹的该年表。历史学家王立教授说：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来之前，《盘古王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其次，“盘古王表”中的金二伯、盘古、嫫祖等三位人物传说曾活动过的三座名山：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其中衣落山地区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更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还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而且会观天象。金二伯反对嫫祖与黄帝轩辕完婚，反对嫫祖扩大“远古联合国”，把政权交给轩辕氏、把“远古联合国”总部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因实践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所以传说后来金二伯自觉找到嫫祖和黄帝，跪在他们面前“负荆请罪”。

令人震惊的是，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初定为“金二伯铜像”。原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颜晓亚摄影师，认为很有价值。后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已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

2008年3月28至30日西南石油大学的常健民教授，到盐亭踏勘了解盆塞海和海啸遗迹的地点、地貌、地物、传说、早期工作、地方关注等情况，想以地质学和他的地球翻转观念去解读远古遗留的地质剖面现象。由于这次踏勘性了解偏于地质学，笔者作为常教授的向导，请求盐亭方面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赵均中先生协助。赵均中于是叫来杨绍森先生和我们一同考察。杨绍森把他著的《千古丰碑》一书，分别送给了常健民教授和给他开车来的邓师傅以及笔者。

常健民教授1944年11月生于南充市，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系专业学习。先后在内蒙、川北和西昌等地从事野外地质技术工作。

1980年调入西南石油学院地质系任教，到2004年退休。2004年初常健民教授完成了自然科学新发现的《地球翻转》书稿和“地球翻转的首次鉴别及其科学效应”的论文。常健民教授在盐亭踏勘了盘古圣地的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嫫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嫫村山，回龙山、公子山等山寨城邦文明遗址和观看了多处收藏的文物后认为，从玉龙镇、高灯镇、金鸡镇等地区密集的古山寨遗址景观看，盐亭存在远古文明事实的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烟鼎山脚下申家沟台地上露出的民间俗称为“石条球”的约七米高竖立的“石柱”，有可能是这个远古文明留下的建筑物遗存，值得发掘。

杨绍森先生失学于“十年动乱”，他父亲因有“历史问题”而冲击到他们，但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在农村勤俭持家、勤劳致富、团结乡里，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吸收为中共党员。和其他农民不同的难能可贵之处是，他离开学校后，书从未离过手，使他逐渐积累了知识，为后来创作《千古丰碑》打下了基础。他在河南新郑市打工，嫫祖诞生西平县的困惑触发他想到古史的“千疮百孔”：自约公元前911年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创纪传体史书范例的《史记》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没有搞清楚黄帝是一个人还是不同代的几个人？任凭谈四千年前有黄帝，五千年前有黄帝，六千年前有黄帝，乃至近年还有学人说三千年前有黄帝，七千年前有黄帝——中国史学家做学问不怕“脸红”，已成为中国“特色”。

例如，新浪网“老派的博客”2009年发表据铜川民革成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炎黄文化研究专家李延军写的《黄帝生平年表初编》，说“公元前6019年阴历二月初二，黄帝轩辕氏出生于寿丘（今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桥山东南桥沟塔之长寿山）”。即黄帝轩辕氏出生在至今8000多年前。杨绍森不服这口气，他在河南灵宝、新郑等地暗暗搜集资料后，又毅然回到家乡，在劳动之余深入到高灯、金鸡等地考察蚕丝山、水丝山、轩辕坡、丝织坪、锦机台、三锅桩、先猫洞等嫫祖传说留下的遗迹，还主动向一些嫫祖文化爱好者请教，多次征求意见，三易其稿，终于让14万字的《千古丰碑》面世。

在送走了常健民教授之后，笔者用了约一周时间读完了杨绍森先生的《千古丰碑》。杨绍森积极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添砖加瓦，奉献的这本《千古丰碑》，与十多年来以盐亭嫫祖传说为题材创作的近十部长篇小说和戏剧、影视作品不同的是，突出了“盘古玉表”中远古文明从“城邦之美时期”到“跃起中原时期”过渡的内部斗争。杨绍森不是专业作家，在今天，民间搞纯文学创作或纯科学研究都是自费的，不能养家糊口；杨绍森的主要任务还

是搞生产劳动，而且他的作品主要面对的还是劳动群众，所以《千古丰碑》写得很质朴，很多用语也同今天的历史小说、戏剧、影视作品相似，而且是人间、天庭人神相应，很有可读性和感人之处。

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部或西南，是中国黄河、长江两条大河上游的交汇处，也是东、西人类文明的交汇处，还是远古云南元谋人、陕西兰田人、广西柳州人、重庆巫山人等的交汇处。如果一万至五千年前四川盆地因地球局部地质大灾变，曾经形成过盆塞湖到盆塞海，古梁州有过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而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是它具有先进的原始生产力、先进的原始文化、先进的原始方向的话，那么以盘古文明为代表的四川盆塞海或盆塞湖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类社会，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联邦、联盟、国家、氏族等社会组织的？又是如何称呼现代人理解的国王、皇帝、酋长、头人等领袖人物的？这也许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也难弄准确的，所以杨绍森《千古丰碑》书中，把类似的社会组织称“部族”，头人称“族领”，黄帝自称“朕”等，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有书云：“将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用现代人理解的称呼去衍绎远古的人和事，也是为让现代人更好更准确地去的理解远古的人和事。笔者和常健民教授也讨论过“远古联合国”的用语——说盘古文明类似“远古联合国”，而不类似现代人理解的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是因为它们更像部落或氏族联盟、联邦、国家类型的混合体，这恰与今天的“联合国”相似。

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战争，但它的大趋势是以“和谈”解决问题为主，是以“化干戈为玉帛”解决问题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千古丰碑》虽然使用的是部落或氏族联盟的用语，但较好地理解了“远古联合国”式的盘古文明。这突现在《千古丰碑》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要追求和谐一统的联盟构思上，坚持表现部落或氏族追求“化干戈为玉帛”的波澜起伏的情节构思上。其中更不回避金二伯与联盟的矛盾，黄帝与炎帝间坚持大统与自强的矛盾，黄帝与蚩尤间不同文明的矛盾。其实今天“联合国”内部的国家之间也有争论，“联合国”的实践，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旅游文化”的实践，都对争端解决提供了启迪。

北京学者苏三称中华文明起源于中东，“三星堆”属于古犹太文明；中东是人类“文明的子宫”，中华文明则是它的“宫外孕”的文章。说实话，笔者不赞成苏三的观点。因为笔者多年研究发现，中国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难于建立八千至五千年前中华多代“远古联合国”历史实地研究的平台，

原因是没有如目前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的那种远古文明遗迹。虽然那里的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早已被破坏，但那里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如在绵阳涪江和梓江下游区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古山寨群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古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床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

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如果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即使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绵阳市盐亭等县区，也有平台能安置。因此把苏三的观点反过来，把1.2万年至5千年前的四川盆塞海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现象，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孵抱期”，而中东文明则仅是它的“应用期”，不是也行吗？

4) 与周光华教授文明起源地之争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华夏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天下莫非王土”、“大同王土”之说，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200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淄博市社科联研究员周光华教授的《远古的华夏族》一书，谨慎而探索性地翻开了这一进程的第一页。

《远古的华夏族》凸显《山海经》的多面意义——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人很多，把周光华教授《远古的华夏族》里的《山海经》研究，和胡太玉教授在2002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破译〈山海经〉》比较，客观地说，《破译〈山海经〉》的学术规范性不如《远古的华夏族》的学术规范性强——理论追寻年表和王表，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远古史的一种要求，周光华是努力在做着。相比之下，《破译〈山海经〉》缺环太大。这是一件难事。不说四川省盐亭县何拔儒老先生破译的天垣《盘古王表》和他的中华文明是盆塞海文明在先、农耕文明

在后的观点，就拿周光华教授说的“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即所谓远古长江文化是源生文化，并且是后来接受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文化，在目前也难于取得共识。

无容讳言，《远古的华夏族》是以整体剖析《山海经》为基础，尊重《夏商周探源工程》的合理衔接，尊重《史记三家注》提供的历史年代线索，结合古籍和学界、考古界的研究成果，但还需实地考察全面综合研究华夏族。即周光华教授对学界争论的敏感问题、应该提出商榷的问题，没有做大的争辩，是尽量避免“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之争。从全书来看，由于作者是工作、生活在山东，更多了山东的情况，所以也过多地描绘了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和源生。

胡太玉教授的《破译〈山海经〉》与《远古的华夏族》有很多相同之处，但胡太玉不是立足于周光华的山东，也不是立足于周光华的远古大黄河文明渐浸长江文化。相反，胡太玉是立足于成都平原，立足于长江文明的源生文化，不但对国内黄河文明作了渐浸，而且对美洲、西亚、非洲和欧洲，早在6000年前已作了开拓，证明了天府之国可能就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成都与东方伊甸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胡太玉教授为了说明《山海经》是一部上古世界联合国史志，写得更像报告文学。我们不知道胡教授是不是在四川工作，当然我们不是说在四川工作的人，就一定偏重四川或“稻作文化”。

因为还可举两个反例。一是祖籍在山西，在成都出生，在广元市任职的白剑先生，2002年出版的《文明的母地》一书，就偏向于周光华教授工作的山东，说三星堆发掘的远古青铜器，原本是山东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由于掌管泰山大庙的夏朝功臣有缙氏部落，不满夏桀的暴政，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才是三星堆著名青铜器的来历。白剑先生的理性是，他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说，而类比提出戈壁滩人类起源说，于是远古的华夏族是从戈壁滩走出，由西向东经过甘肃、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发展，再向长江开拓的。

而在北京出生、工作的王红旗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信息传输角度研究《山海经》，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完成了对《五藏山经》地理方位的全面系统考证，2003年他出版了《经典图读山海经》，是立足于北京而偏爱四川。他认为神农、炎帝族源于北京桑干河谷，而不是陕西；他认为帝尧时，东海已淹没了太行山。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发表文章说，蚕丛发明了望远镜。

理由是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

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 13.5cm，凸出眼眶 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箍似的箍，宽 2.8cm，眼球中空。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认为其文化和族属渊源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可解释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

白剑先生是一个年青的学者，他了解广元市周围羌族地区的情况。这一带靠近岷山和秦岭，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他可以尽情地发挥“蜀人来源于氏羌人”的观点。其次，他也容易到附近绵阳市，考察盐亭县的嫫祖文明遗存。当他在短时间内的旅游中，看到的古文明遗存因已被解放时破坏，而不尽人意想象的标准后，就开始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尽情地发挥对盐亭县学人研究的批驳。但他不知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这一幕却发生在 1950 年的土改运动，及以后多年中的一些革命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当地当代老人们不愿说的事情，但当地农村七、八十岁以上还活着的人，都亲眼目睹过---白剑先生和当地这些人比起来，不但不了解，而且从年龄上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暴风骤雨”。

旁证还有，1958 年大跃进，绵阳市有数万人涌入广元市大山中挖矿大炼钢铁，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座，造大小风箱数千台，那是千真万确的。这事已过不到 60 年，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六十岁以上的人士，大多亲身经历目睹过，人还在可以作证。如果白剑先生作为广元市宣传部长、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况且在盐亭，大围坪、寨子山等地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嫫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

正反信息博弈法，凸显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以后类似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是中国远古的主干文明一样，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是世界远古的主干文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孵抱期。相反，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和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正反信息博弈，却凸显了以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文明为特征的远古国家共同体或古世界联合国，类似现代欧盟或联合国模式的存在。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 8000 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嫫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市场经济和物品交换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存在多时了。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教授早就说过，《山海经》

是远古巴、蜀、楚人最初完成的著作。但蒙先生论证何为“山海”，何用“山海”？没有说清楚。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真是画龙点睛。但蒙文通和何拔儒都是四川省盐亭县人，有“稻作文化”人之嫌。《远古的华夏族》虽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但主要维护的还是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所以也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在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中，周光教授却在无意中揭开了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如果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是以巴蜀盆地或巴蜀为中心，这个盆塞海能淹没或能沟通淹没的省份，当然只能是巴蜀盆地及临近巴蜀周边的其它省、市、县了。

它们是四川、重庆、陕西、青海、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市。如果把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史地志称《海内经》，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的城邦文明史地志称《海内东、南、西、北经》，临近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城邦文明外边的东、南、西、北的陆地文明史地志称《海外东、南、西、北经》，再远离这个盆塞海周边的陆地文明的东、南、西、北的农牧文明史地志称《大荒东、南、西、北经》，那么不管周光教授对《山海经》里诸多“国”的推说或考证是否正确，他在该书 266 页至 267 页提供的《海内经》、《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大荒东、南、西、北经》等各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详细省份，都可作参考。如果这个介说能够接受，那么他说的《海内经》的邦族地域位置，涉及到青海、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南、江苏等 7 个省、市。其中只有江苏一个省是远离四川省的，不符合“海内经”的设定。

至于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没有涉及到，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远古的发达文明，这个设定的省份只能是少，不可是多的。其次，我们还可以反求之，看四川省是不是混在周光教授推说或考证的其他各类山经中？结果四川省只在他的《海内南经》推说或考证中一处出现。把四川和重庆放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主体是在四川省北面绵阳地区。以此作参照，四川省南部及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市，当然是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了。其中还没有涉及到的甘肃一省，是在《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两处提及的。可见周光教授的推说和考证，是很符合《山海经》的原著，且准确概率也很高。

其他的问题，还可能存在着《山海经》在成为纸版书之前，因为古人是写在竹简线编的书上的，

后来出土或发现时，竹简因线编已经腐烂而散乱，是后人根据竹简散乱的具体情况和文句的联接，重新整理出来的。所以即便是周光华推说和考证现存的《山海经》上的邦族地域位置正确，也难免《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和《大荒东、南、西、北经》中，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省份有混淆之处。但四川省又是不能太混淆的，因为中国远古盆塞海的主体是四川盆地，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就只能四川省一个，这个概率是很小的。

反之，散乱和联接生错的概率也很小。周光华教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他的造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在中国的存在。从“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就能揭示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较同期其他地方，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表现，这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源。这里，中华民族的开山先王，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搏斗中，已感悟和树立起“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原始意识形态。即使后来一些部落和王朝的“落后侵略了先进”而取代了前王朝，这种“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开创性的意识，仍然保存了下来。

这说明真正产生过具有先进意义的意识形态文明，是不会消亡的，是能够传播的。这才是“中国主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且以此“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中国主义”，推进世界大同。周光华的《远古的华夏族》，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先进治国”论的思想，来研究远古华夏族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揭开了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社会现象。

例如，《远古的华夏族》中 166 页至 190 页，作者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作者由衷地写道：“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日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这样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就觉得这是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一种程序编码。

这类更残酷的“内战”，是从蚩尤战黄帝划分时代的，它是人类社会“科技”出现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它深刻地说明了政权现象与科技现象的关系。但民主与独裁并不是对立的，例如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

力量的国家，它们即便有了民主的政权，也是不强大的。所以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是 21 世纪里强调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先进意义和正确性。

今天的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2005 年我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周光华教授认为，这就是对近代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发生的必然的“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的一种“法律界定”。周光华教授在他主办的《知识论坛》网上发表《从中国国民党江丙坤率团访大陆看中国的统一前程》的文章中说：“由此，中国境内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就把任何外国势力图谋插手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拒之门外；这就把台独分裂势力，把台湾的‘民进党’、‘台联党’这些分裂中国，这些搞台湾独立活动的叛国祸国党团，推向接受法律和人民制裁，国家行使权力给予惩处法办的地步，由此维护中国统一的尊严。”这就是《远古的华夏族》出版后，周光华教授登上的又一新高度。

战争与科技武装后的政权及政权人物，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蚩尤，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教授作了一类“声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 页上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光华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

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的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犯人，被放逐到四川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人类文明大爆炸。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 6390 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

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

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因为“汗”有“汗牛充栋”、“汗流满面”、“汗马功劳”，含有广大、多数、劳苦、下层之意。这也解释了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三星堆文明，有一部分来源于中原，但中原文明也来源于远古联合国文化的难题。

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氏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氏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也许我国今天的各个少数民族，还是远古联合国掌管各山寨城邦和远途去作贸易人物的后裔——类似今天说的“官二代”、“富二代”。

动物社会知道要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不知道要有人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以代替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其结果是如苏三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由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黄帝的“共同体”政权，是从

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共有5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嫫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家，争夺到了“王位”的。这是约公元前4170--3150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

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正是在“古联合国”内部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处在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嫫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嫫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嫫祖发明养蚕治丝，类似高新科技，也联系类似黄金、货币经济、文化，而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舟船、养殖、编制、刀具等技术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

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又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物品交换，于是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物品，所以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的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和地位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的炎黄部落，虽然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是比这更好的办法，还是移居到西陵部落贸易团体的前哨地点附近才好。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物品的交换交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

特别是嫫祖故里盐亭县传说，黄帝因为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嫫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嫫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由嫫祖让给了黄帝。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政权人物，压制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一种法律程序

或法律公正。然而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却是嫫祖王的千古设计----因中华巴蜀盆塞海终将要干涸，远古的民主终将要被专制所代替，战争选在中原打有好处。

事实证明，直到清代，政权人物还在坚持“天下莫非王土”的“古联合国”观念。是近代科技粉碎了“古联合国”之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才部分恢复和重建了“联合国”。关于意识形态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远古的华夏族》145页上说：“后世思想家，特别是地主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为完成.....帝王治世理论，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周光华教授没有明说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也是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的，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这涉及从古至今的意识形态规律和讲政治。

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例如，任继愈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的冯友兰先生，1931年、1934年完成上、下册的《中国哲学史》，解放后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又著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前者比较，增加的多在讲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服务性，突出了人民性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又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钟毓龙先生，1936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从378部古籍中发掘公布有“尧年王表”，但因开头的政治错误，直到1985年删除开头几页才再出版。其实，改革开放后，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表年表，除年表更细更准确外，王表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相同的。从孙中山时代起，政权人物内部学者间，为争夺远古华夏王表年表的决定权，对上古传说是各有撷采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我国古文明王表年表的文献材料不乏其有，解放后对夹杂严重封建迷信或政治错误的材料，也弃置不用或被烧毁。现代有些国家，曾把自己的开国领袖，讲成是“钢铁灵将”。而被打倒的，就漫画丑化----这是在讲政治。

因此，远古的神话，曾经类似就是远古社会讲的“政治”，如《山海经》可以说是一本“古联合国”强调讲“政治”的史地志书。同样道理，司马迁的《史记》也讲“政治”。例如他说，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史记三家注》说黄帝的第四孙颛顼在位78年，死后他的叔伯兄弟帝喾接班当王70年，活了105岁。难道这样的记载，能视为符合人真实的生命生长规律？

周光华教授为研究的稳妥说：他只考察了伏

羲、太昊、女娲、神农、炎帝、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等远古华夏族氏及政权人物，以此打造远古王表年表：神农炎帝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历时530年，黄帝族系时代合计为396年。其中黄帝历时100年，颛顼历时78年，帝喾历时70年，帝挚历时9年，尧历时98年，舜历时41年，止于公元前2075年。舜的治丧期3年，所以禹夏起于公元前2071年，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年代相合。但这样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有让人不踏实的疑惑顾虑。

因为全世界没有这样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记录。所以说目前我国历史学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对照现代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类似“联合国”的秘书长，可以从成员大国中选，也可从成员小国中选；可以是白种人、黄种人，也可以是黑种人；但是都必须任过职。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中，有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情况，也许是把他们作“古联合国”政权人物的时间，与其作王储或邦国的国王或邦族、部落首领的时间，混在一起或加在一起了。

A、解答远古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部分难题----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等难题之一的人类社会的起源，如果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那么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B、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这可是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

C、1989年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提出，距今约2至3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土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由于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20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

D、约20万年前至约8000年前，是大迁徙期，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类从非洲走出，陆路向东、向东的，可抵达太平洋沿海。

E、1927年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书中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的三系学说。这实与人类大迁徙有关。

F、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

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

以上可解答人类起源于中国全境，包括白剑的戈壁滩说。

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等难题之二，是在约 8000 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原始社会开始后，源生民群落，在我国东、南、西、北、中都有分布，再谈动物类似的大迁徙，不现实。因为除草原上有大量马匹的游牧民族，其他族民不可能有经常性的大规模整体移民。能移民的或衍徙的，只能是接近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或潜在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远古的华夏族》中就提到西羌人的始祖爰剑，本是秦人的奴隶，逃跑进深山野林，碰上受割鼻刑的羌人女子结为夫妇，后向羌人传授农耕技术，改变羌人的游牧生活，而发展农耕经济，成为西羌人的政权人物。

袁珂先生也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王恒兄弟，是做长途马牛羊贩卖的政权人物，王亥在外遇害而引发商人起兵。钟毓龙先生更认为，上古政权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政权人物和首都的移动很频繁，连移动后的首都，很多地名都依照先前的称呼。可见远古的政权人物及潜在政权人物们的知识、智慧，组织作用等，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交流、搬迁、贸易、派遣或逃遁、刑罚中，发生的民族源生、衍徙、渐浸、接纳等文明影响现象，才是多处同人名或地名等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源。钟毓龙先生认为帝尧时，因地质灾变，黄河不能再从剑门流入四川盆塞海，三门峡又暂堵，还解答了王红旗“东海淹没了太行山”，以及四川盆塞海逐渐干涸的难题。

笔者与周光华教授之争，发生在 2015 年 12 月 12 日他亲手给笔者送第二本书《远古华夏族群的融合——〈禹贡〉新解》的时候。这笔者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自然国学研讨会期间。这是第一次送书 10 年后首次相见，都很高兴和亲热。10 年前的 2005 年初，笔者收到淄博市社科联寄来参加当年 9 月份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齐文化《管子》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函，同还寄有周光华研究员的新书《远古的华夏族》。笔者猜想自己的信息也许是办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的宋正海教授告诉周光华研究员的，因为“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也曾邀请笔者去作“讲座”；因自己还没有退休，“讲座”与办报无关，怕报社不同意没去。而 2005 年 4 月笔者要退休，所以看完《远古的华夏族》一书很快写出《从齐文化看远古华夏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评周光华先生的新著》一文，给周光华研究员邮寄过去。

但 2015 年相见的好气氛，很快被双方交谈打

破——针对笔者猜想说的“世界人类起源和文明第二个孵抱期，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世界第三极有关”，周光华教授立马反对说：“山东泰山地区才是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之地”。他列举了山东和泰山历史上记载古文化及古文明中的一些亮点，说明它们的全国性和世界性。而笔者心里明白：泰山古文明起源即使成立，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也是“流”和“源”原的关系：约 20 万年前冰川期开始结束，从非洲走出的现代人向东，一直走到中国东面大海边才停住前进，也许在泰山留下来过少部分的人——但他们的大部队寻找的真正归宿点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东面的巴蜀盆地及其堰塞湖--盆塞海。这是他们曾经的一部分祖先，带着保留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的耐寒基因，在约 200 万年前因第四纪冰川的严寒，迁徙到非洲前的栖息地。

其次，2005 年笔者写评论《远古的华夏族》期间，周光华教授曾打过电话告诉：他父母出生上海，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陈毅元帅在苏北领导的新四军，后又跟陈毅元帅到山东参加解放战争。刚解放又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抗美援朝结束回到山东淄博工作。他读高中遇“文革”，后参军到兰州部队，在那里作为工农兵学员他上了大学。后来因父母在淄博，就从部队调回作了一所学校的校长。他的特长是喜欢文史，又转到淄博市社科联工作。2015 年在北京见面后，所以笔者一开口向周光华教授父母问好，他才说他的背景的不要说，他是 1964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参加的工作。笔者这才明白：书刊、口说的“真实”，与“实在的真实”，对远距离没有亲身交往的人来说，这种差距是搞不清楚的——类推探讨争论人类的古史也许存在类似的现象。笔者对周光华教授的学术成就就是很敬佩的，而且他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于泰山”的话，笔者还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书刊和网络论坛上说过，也就没有过多地解释争论。

为了印证“实在的真实”，笔者将 10 年前——2005 年 4 月 10 日就收到的周光华教授的电子邮件，全文抄录如下：“您好！很高兴您真诚支持帮助，写出《远古的华夏族》专著的研究评述，这对我是很好的鞭策和启发，使我看到研究需要深入，探索需要继续，问题需要展开剖析，方可见到清晰的前途。希望您的评述见著省级以上报刊和学术中心期刊。谨此”。周光华教授还说：他很愿到笔者那里及四川考察调查研究，届时会给添麻烦，请帮助；对不厌弃孤陋相助真诚致谢。他大致的安排是：五月份他到河南大学、南阳师范学院讲座“东夷齐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早期文明”。如果没有变化，大致考虑借这次机会到笔者那里及四川考察调研。因为六月份他要插手准备中宣部批办，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齐文化《管子》国际学术研讨会”，

9 月份开会。所以再往后就得在 9 月以后才能找机会时间来四川的。

周光华教授又说：“话说到这里，您可以试探性地帮我宣传宣传，可否寻找您那里及四川感兴趣的大专院校或学术单位，聘请我并安排‘东夷齐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早期文明’或类似讲题的讲座课，这样对我到四川调研考察会更方便的，也有利于我们在远古文化历史文明研究领域可能的合作提供好的方便。恭候您佳音回传。您的评述文说‘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我冒昧动粗删改，主要把我的背景删掉，把一些政治色彩的言说调整掉，保持学术研究的面貌，个别字句做些调整和删改，希望您能满意，希望您的文章原意突出。谨此，把我修改后的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一部探索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评述文，发回给您，请雅正。恭候回信----周光华 2005.4.10”。

但 2005 年 5 月周光华教授没有到四川调研考察，而周光华教授修改后的评述文，笔者和工学院金鑫教授再作修改后，2007 年发表在绵阳市科学城工学院学报《教学与科技》第 2 期上。

5) 青藏高原第三极原理考古旁证举例

A、高等植物、动物、人同源

《光明日报》2019 年 6 月 27 日报道，吉林大学教授崔银秋研究团队与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宫磊研究团队合作，成功测定并分析了距今约 3800 年的小麦全基因组序列；该研究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农业传播提供了跨时间维度上的直接证据----六倍体普通小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普通小麦驯化始于大约 1 万年前近东的新月沃地，然后向西扩散到欧洲，向东扩散到东亚，但小麦进入中国的传播途径仍不清楚。为探寻传播路径，经过约 10 年时间的研究，两支团队克服了古植物中 DNA 含量极低、降解损伤严重，古植物 DNA 研究对实验环境要求高等困难，从距今 3800 年的单粒小麦种子中成功提取到其基因组 DNA，并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对中国新疆小河和古墓沟墓地出土的 7 粒古代小麦种子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组装。

基因组数据分析和形态学观察都证明出土的小麦为六倍体普通小麦，古代小麦与中国西南地区现存的普通小麦地方品种的密切关系----青藏高原现代地方品种与古代小麦高度相似的等位基因频率，为小麦向高原传播的西南途径提供了更加直接有力的分子依据。这项研究也提出了普通小麦从青藏高原边缘到长江流域的扩散路线，为现存小麦地方品种的栽培起源、扩散和遗传改良提供了重要信息。

从植物到动物联想 2007 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 4200 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这表明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走出西藏，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大陆北部的干冷草原地带，最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这虽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单一没有关系。但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关。从动物到古人，兰州大学张东菊教授介绍青藏高原最老的考古遗址----白石崖溶洞，位于甘加盆地北侧的白石崖山脚处，洞口高约 5 米宽 8 米。洞口处有相对较平坦的通道。在洞穴入口约 30-50 米处，此前进行发掘的两个探方，共四平方米，分为十个地层，共采集了 1400 多件石制品，500 多件动物骨骼。采集的石制品以石片、石核、工具、断块为主。动物骨骼以较破碎的四肢骨为主，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犀牛、野牛、野马/驴、鬣狗和野羊/羚羊，与更新世晚期广布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环境的“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高度相似。

这还可鉴定的犀牛和鬣狗骨骼上，均有较多敲击和切割痕迹，确定为人为活动结果，进一步证明人类活动是洞穴内动物骨骼堆积的主要因素。丰富的动物遗存为理解青藏高原旧石器人群的业生模式（古人类生产，获取食物的模式）和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提供重要信息。初步检测结果显示，该遗址上部文化层（人类活动造成的文化堆积）至少形成于距今四万年前，应该为青藏高原目前已知最老的考古遗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认为，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不同学者对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张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是世界范围备受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争议和突破机遇共存。2007 年 6 月 14 至 16 日夏河人研究成果推介会在甘肃省夏河县召开，发布了中科院陈发虎院士团队关于夏河人研究的最新进展----EPAS1 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夏河人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原住地的发现，补上了现代藏族人群携带的高原适应基因。夏河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化石出土的白石崖溶洞，是备受关注的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这里海拔 3200 米，背靠达里加山，面对甘加草原，在江拉沟河谷上方约 50 米处。EPAS1 基因可能源自夏河人----2010 年《科学》杂志发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金鑫教授关于青藏高原世居藏族人群高原适应的关键基因 EPAS1----高原环境对人体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低压性低氧，大气压

力随海拔增高而降低，氧分压也随之下降。当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到高原环境时，由于氧分压的降低，会使人产生缺氧，因而引起“高原反应”。EPAS1 基因是低氧诱导调节通路中的重要基因，在人体面对低氧环境的调节通路中起到核心作用。

藏族人群特有的“EPAS1”基因阻止了血红蛋白浓度的过度升高，降低了各种高原性疾病发生的可能性。EPAS1 基因来自于哪里？2014 年《自然》杂志发表了藏族人的 EPAS1 基因可能来源于丹尼索瓦人的研究成果——虽然在丹尼索瓦人化石中找到了 EPAS1 基因，但丹尼索瓦人发现于海拔仅有 700 米的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在 700 米海拔的地方生活，并不需要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 EPAS1 基因。直到科学家发现夏河人，并确定它出土于海拔 3200 米的夏河白石崖岩洞，补上了 EPAS1 基因来源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研究推测，EPAS1 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长时间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夏河人，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EPAS1 基因很可能最早产生于在青藏高原生活的包括夏河人在内的古人类，后又传给现在的藏族人群。对夏河丹尼索瓦人的进一步研究，可能会改写人类演化迁徙的版图。例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认为，根据对夏河人下颌骨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任何一支已知古人群或现代人群。推测夏河可能是更早的丹尼索瓦人发源地，而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可能是其后代。

另外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张岳桥研究团队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白龙江等长江上游水系作野外考察。他们选取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上游 3 个古堰塞湖进行沉积、构造及年代学研究，结果发现岷江上游，在史前 7-1 万年（主湖期可能是 3~4 -1 万年）期间，存在一些长约 30Km，河道堵塞近 10 公里大型的堰塞湖。更为有趣的是，这些堰塞湖在大约 1 万年左右全部溃坝了，其水量足以淹没整个四川盆地。这是 2010 年在《第四纪研究》杂志第 4 期上，中国地质科学院李海龙博士和张岳桥、李建华等科学家发表的论文：《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及其伴生古堰塞湖研究》的研究。

李海龙等人提出青藏高原东缘南北向河流系统的概念，定位该系统包括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鲜水河、雅砻江等总体呈现南北走向的河段。这些南北向河流系统的形成演化，具有构造和气候双重意义。因为晚更新世以来，南北向河流系统发生多次堵江事件，形成数套堰塞湖沉积。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有环境地理学家认为，远古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高山冰川，在 20000-8000 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

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20000-8000 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 8 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李海龙博士曾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他 2009 年做完川西的工作之后，对四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笔者关于远古巴蜀堰塞湖到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研究报道，更觉神往，感到绵阳市盐亭大围坪地貌、嫫祖历史，或许是一把金钥匙。但后来李海龙博士又给笔者发电子邮件说，2010 年当他开车专门到盐亭考察海啸遗迹地貌后，认为所谓的海啸遗迹竟是子虚乌有之事。问题出在哪里？根据李海龙博士的说法，他根本没有到已指明的如梓溪河畔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大围坪景观去亲自查看，而只是在盐亭县城里游转一下，和只到盐亭县城的公路沿线看过，拍摄了几张照片，就说对当地的地貌特点已进行了总体性的考察，得出盐亭处于内陆，远离海沟和俯冲带，根本不具有发生海啸的地质条件。原因还有，他只是个读博士的研究生，不是单位领导，手里没有权，不能立此专项任务，没经费、没时间；到盐亭也没向导和交通工具等问题；这些都是他难于说出口的。

如果在盐亭盘古故里天垣盘垭村袖头山、五面山以及嫫祖故里的云毓山、烟鼎山、嫫村山等地去实地考察，那么对从梓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水平线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如此一致，会有实际了解。至于远古盆塞海遗迹在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李德文教授曾说：“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这话不错，但不等于像成都理工大学刘兴诗教授参加 1993 年绵阳市科学小说研讨会期间，有人提出盐亭存在近万年前海啸遗迹地貌的问题请教他，得到的回答：“我是教地质的，不用看也是错的”。在中国懂地质学的不只刘兴诗教授一个人。“不用看就知道是错的”，请这样的教授鉴定嫫祖文明、嫫祖遗址当然没门。

且不说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嫫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四川师范大学张昌余教授 2001 年在绵阳市科普创作交流会上，讲从黄帝上溯女娲及盘古是中国古史的神话阶段，从黄帝以下才是人文阶段之说。会后他们这批学者被请到了盐亭，看了冰川冰臼遗迹，看了大围坪地貌和古山寨群城邦遗址；听了讲解：由于

远古四川存在过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从而造就了先进的龙文化经济，即古海洋远航贸易交换经济，以及凤文化经济，即山寨城邦区的产品制造加工经济，出现了一大批智慧超群，目光远大的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执掌人，类似现代人称呼的寨主、邦头、国王、贵族、大臣、祭司、市长、老板、经理、董事、首席执行官等等。这段远古文明消失后，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超人”都被用神仙、道人、鬼怪一类的称呼和神话故事包装起来，成为没有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摆设。张昌余教授听了、见了，认为从国外的《荷马史诗》到国内的《山海经》等远古神话，都能把谜解开了。张昌余教授等人离开盐亭时，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四川存在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是真实的”。

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在2011年8月“科学网”的“个人学术展示”专栏发表了一篇短文《嫫祖与内蕴海啸地貌学》，其中说：“海啸问题，我们是把海啸学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的。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关于嫫祖存不存在？是不是盐亭人？地质学家也不关心。这无所谓。但嫫祖存在和出生在盐亭，却引起求学国内外的学子们的关心。他们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结合，用来讨论巴蜀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后，四川盆地大围坪的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创建了内蕴海啸地貌学。同原有的海啸地貌学内蕴地貌求证方法一样，地貌类似记录、档案，内蕴海啸地貌学是用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量定义的，并且没有必要把海洋海啸地貌原有的海水、力源，看作是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内陆盆塞海，干涸后还要照旧有的必需因素”。

B、嫫祖历史与还原盆塞海科考

说到嫫祖历史涉及的盆塞海猜想，远古地震--堰塞湖--盆塞海--大围坪--海啸有关联吗？先看看海啸的定义，我国的旧地貌学教程说海啸是一种巨大的海浪，主要是由海底地震、火山喷发、海岸崩塌、滑坡等海底地形大规模突变所引发的具有超长波长和周期的一种重力长波，但遗漏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之说。例如，中国年青的地质学家李德文博士，是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的研究员。1986-1990年就读华东地质学院地质系本科；1990-1994年在核工业208大队从事地质调查工作；1994-2000年攻读北京大学地貌与第四纪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2000-2004年为南京大学博士后/教师；2004-2007年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07年至今为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副研究员。2008年任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基础理论及其在活动构造探测方面的应用研究。

李德文教授在互联网论坛上先说：“A、从来就

没有过海啸地貌学，更不会有什么内蕴海啸地貌学。B、四川盆地如果有过海啸留下的证据，那也只能是沉积证据而不太可能是地貌证据。C、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证据以及证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新观点的支撑，对论据的科学表达是很重要的。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去亲自查看吧？D、海啸是专指由津波-tsunami引发的自然过程，是一种与潮汐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也就是说，海啸证据这种说法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成因意义，用潮汐理论来解释海啸证据是自相矛盾的”。但后来李德文教授却改口了。他说，海啸的成因有多种，常见的是地震断层引起的，另外还有海底滑坡，海底火山塌陷和外星撞击洋面等类型。

笔者认为，李德文教授说“海啸与潮汐是完全不同的地貌营造力”，这点说到了关键，但既然说海啸与潮汐各有地貌营造力，又说海啸成因表面没有地貌营造力，这不也“自相矛盾”吗？如果四川在洪荒的历史时期存在盆塞海，那么从梓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的数百里，有没有形成类似海沟和俯冲带的地质条件呢？引起笔者对此的思考，是1970年代笔者参与大打“矿山之仗”，在綦江铁矿看到，从重庆市綦江铁矿矿部到土台乡政府要上一座大山，土台乡政府就在大山顶上的“小平原”上。笔者每年探亲回家，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从重庆经遂宁坐长途客车，綦江铁矿土台山到四川盐亭玉龙镇西仔山相距千里，以两地的山顶“平原”作标杆，从长途客车外似乎可以望见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两岸，有连成一线的大围坪台地时隐时现，类似澳大利亚海啸地貌时隐时现，这可“读懂”何拔儒先生关于盆塞海的推证。因为在梓溪河畔玉龙镇政府旁的西仔山，山顶上也类似有一个“小平原”。据原玉龙区粮站站长石云龙老先生介绍，西仔山后面的红石坝，他找到过大量的古桑化石。还有家在西仔山的网友介绍，西仔山烧砖和修公路，发现有大量的干涸沉积层。

如果要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从长江口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一样，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梓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梓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骤然形成“水墙”，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那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才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现在的问题是，盆塞海早已经不存在。但内蕴几何学的科学智慧的火花启示了海啸地貌学。如在内蕴几何学建立之前，平面一直被作为三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图形来研究。但高斯和黎曼等数学家受平面几何能通过专注于平面本身得以研究，建立具有点、线、面的一些定理和用参数来表示的表达式的引导，为曲线、曲

面一类更为宽泛的空间发展了一种内蕴几何学；这一几何学是内蕴于平面的，并且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例如把三维欧几里德空间发展到 n 维空间并当作一个流形来讨论，可用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类此，海啸地貌学中的地貌，不就类似记录、档案吗？反之这些记录、档案内蕴于地貌，盆塞海不存在了，但仍可以用它的“流形”自身可确定的量来定义。

后来李德文教授在得知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的资料提示下，也改口了。他说：这丰富了他爱的地貌学教程和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布赖特教授是研究海啸的，并在剑桥和伦敦地质学会出版过这方面的经典文献，但布赖特主要的工作，是致力于外星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李德文教授谈到为何人们保守时说：发现还有神秘的古陨石引发古代海啸的异常的地质现象是好事儿，但是如何合理解释这些现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根据在用海啸解释所发现的现象时，最好能够明确一下属于哪种成因类型。这里涉及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是类似外星陨石撞击地球引起的海啸和地震断层引起的海啸以及海底滑坡、塌陷等因素的概率组合都有。李德文教授也许会说，民间学者关于此研究如果在构造地震成因与地外成因之间游离，将无助于问题的深化和解决；而且他借布赖特已这样暗示了，所以李德文教授感到困惑，要求国内民间学者提供有关布赖特建立海啸地貌学的支持性文献。

其实李德文教授可以自己亲自到澳洲去一趟，不是更可信。至于李德文教授说：“地貌学研究无外乎两个主要的方面：历史地貌学和过程地貌学。海啸地貌学无疑是面向过程的，应属于过程地貌学。在讨论学之前，应该优先解决史的问题。在史料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史学，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问题。但李德文教授可以亲自与布赖特教授讨论，就不至于在国内难找齐国际上无论是最新的地貌学教程还是最新的地貌学百科全书等可信之东西，因为李德文教授似乎不爱找国内民间学者在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对四川盆地地貌演化历史著述的东西的。也许正像《计量历史学》一书的翻译者 1985 年说的那样，在国外，计量历史学已有一、二十年的实践，而在我国出现的速度却异常缓慢。

而且海啸地貌学在我国没有，不等于在澳大利亚没有。海啸地貌学是由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理系的布赖特教授等科学家建立。他们经计算发现海啸袭击海岸的大滑坡，可导致对邻近岛屿产生高出海面达约 375 米的巨浪。于是他们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寻找海啸的遗迹，发现有力的证据来自岩石台地：这些台地通常盖有年龄达约 10 万年以上的沙堆

层，然而高度不到 40 米的山岩都已经变得光秃，处于未经风化的原始状态，有一处地方显示曾有许多布满棱角且重量约 20 吨的岩块从岩石表面被冲刷掉。这种清晰刻蚀的形状，只有在岩石被至少每秒 10 米的急流冲刷才会产生，并让岩石改变面貌。以新南威尔士洲为例，那里许多海岬的北面是悬崖，没有零散岩石块，而南面则缓慢倾斜入海。在过去，有人把沙丘的消失归因于暴风雨或者河水的冲刷。但布赖特等科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即使是带有 7 米高巨浪的大风暴，也无法强制把岩石台地磨光。

地貌类似记录、档案。澳大利亚海啸地貌学给予的启示是，海啸学也能当作一种地貌来讨论，即可以把地貌的很多特定参数和能构成海啸的所有可能的地方的特定参数，以及干涸了的盆塞海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等结合，运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计算位于某种远古特定条件形成的内陆盆塞海原有的海水、力源，推证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的内蕴海啸地貌。笔者之所以受启发，是因笔者出生在四川盆地盐亭县天垣盘垭村袖头山大围坪，那里从榨溪河畔到梓江、涪江流域，存在数百座密集寨子山的古生态景观与寨子山下半坡的大围坪台地。

大围坪是地处半山腰，在山头与山头之间，即使有河流、山沟相隔，台地相对一致，水平线可延伸数十数百公里。当然，海啸与潮汐靠星球引力营造地貌的力是完全不同的——正如潮汐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为什么只有钱塘江潮汐现象有此规模之大和奇特——潮汐从长江口的宽阔海面上溯到越来越窄的钱塘江面的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如果还原盆塞海就像钱塘江潮汐，由一些特定的条件形成的一样，是否沿嘉陵江、涪江和梓江流域到榨溪河畔，几千年中多次发生的海啸，形成类似近海沟和俯冲带的一种巨大的海浪，当其接近榨溪河畔丘陵山地的浅水区时，波速变小，振幅陡涨，瞬时入侵沿岸山地，骤然形成的“水墙”一次次冲刷掉山腰表面的岩石和泥土，就能刻蚀出现在还可考的台地大围坪海啸地貌呢？这也可以根据榨溪河畔现在自身可确定的特定参数，用类似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大致能计算出的。

即要求出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水要多大？震级要多大？形成在多少年？海沟和俯冲带多在什么方向？地史知识讲，上扬子海时期的海盆，是大约距今 5.7 亿年前到 4.4 亿年前，到志留纪晚期才变成巴蜀湖。巴蜀湖干涸以后，就成了四川盆地。第四纪的地壳运动造成了三峡的对外通道，同时也极大疏通了巴蜀湖的残余水，这个时间大约距今 200 万年前。但这仅是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能产生的基础，距今 7 万年前到 5000 年前的第四

纪最后一次冰期的后期，多次大地震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才是形成我们说的盆塞海本身。因此，这已经不属于巴蜀湖的残余，这是要分清楚的。盆塞海面积估计有多大？因为海啸是一种波长相当大的流体（水）表面波，如果盆塞海不具备这样的尺寸的话，那么大型海啸波将来不及发育出来。有人指出海啸波里往往伴随着所谓孤立子波的产生，孤立子波的特点是，它以相对较小的衰减穿越其他表面波而却保留形态。

这样，在到达陆地地貌阻遏时将产生较大的破坏力。其实用布赖特海啸地貌学方程和流体力学非线性孤波方程，道理是一样，先经计算，再寻找印证。假设盆地面积是三角形、方形、矩形、菱形、梯形、六边形、圆形等 7 类形状，地震震源分别在边和角上，由此有多种组合；再根据现存的山崖断面的高度参数、台地面积参数代进方程，反推出盆塞海所需的面积和水量。由此四川盆地及周边省份的面积是足够的。其次是计算长江出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堵，黄河入川是山体滑坡和崩塌造成的开，再加 20000-8000 年前长江和黄河及其支流上游在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形成的一些高山湖，如此的泛滥和溃坝等组合概率，由此水量的来源也是足够的。台地大围坪形成时间计算，是假设造山运动形成的最初山形，类似金字塔的等腰三角形，台地是在等腰的两边对称分别切去了一个小直角三角形。把这两个小直角三角形转换成土石方量，除去海啸袭击冲刷搬掉的土石方量，剩下的归因于每年暴风雨或者河水冲刷等水土流失量，人类改田造地等人为搬迁量的叠加，那么这个每年的叠加量除以小直角三角形剩下的整个土石方量，可估算出大围坪地貌形成的时间。

那么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是如何形成的呢？有环境地理学家能从现在的地貌内蕴来引导，如目前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 80 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将今论古，20000-8000 年前长江和黄河上游四川、云贵、青藏、陕甘等地区的高山冰川，对在第四纪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不仅会改变当地的地质情况，也会引发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及其溃坝等灾难性后果。而且加上 8 级以上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

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岩石台地海啸遗迹，作为海啸地貌学的研究平台，不会是伍伦贡大学等科学家的臆造。然而在我国海啸地貌学却引起争论。原因也许我国虽是一个地震灾害大国，但却不是一个海啸灾害大国，无澳大利亚类似活的海啸地貌学研究平台。然而在远古我国西南的盆塞海，既是一个地震灾害多，海啸灾害也多的地方。但后来这个盆塞海干涸了，中华文明转移了中原地区。李德文教授说中国没有海啸地貌学，但不等于国外没有。况且远古盆塞海，四川不但有地貌证据，也有沉积证据。

笔者能理解让远古盆塞海文明失落的证据，是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20000-8000 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 8 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仅仅从大冰川末期的迅速融化来说，一方面，冰川的融化会形成一些高山湖，这些高山湖如果泛滥，就有可能形成巨大山洪，大量洪水将会冲毁途经的一切。

另一方面，冰川后退也会造成当地地质情况不稳定，诱发山体滑坡甚至地震。这些地质灾害都将直接威胁到当时当地的上古人类居民的生命安全，以至影响到国家的起源。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远古国家的起源也许首先从远古联合国起源开始的。远古大自然的危险严重程度，抗灾自救的联合、维和需要，远远大于部落之间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争夺以至战争。远古联合国不是联邦、邦联，也不是联盟，而类似今天的联合国，是类似维和、维稳机构。至于从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机制，类似霍伊斯勒介绍的模型：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天山地区的伊塞克冰川，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冰川，有 80 公里长。这个巨大冰川，也存在融化问题。这里会定期出现一个高山湖，而且这个湖几乎每年都会造成洪水泛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把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发展序列分为：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等四个阶段。

我们则化简为三大阶段：远古联合国时期、游团部落酋邦时期和王国国家时期。这是因为在第四纪大冰期前后两端，形成有过人类共同基因、语言和文化起源的两个孵抱期。特别在第二个孵抱期，这是个“多难兴邦”的特殊时期，大自然灾害逼迫原始社会的人们，团结救灾、团结抗灾，才自然成就形成了巴蜀盆塞海及四周内陆山寨城邦中的远古联合国。但团结救灾、抗灾需要发展生产力做后盾，而科技创新，就成为人们对生产力的第一源泉的认识。约公元前 8000-3150 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

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引起长江断流，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而在约公元前 4170-2070 年，如果相反的组合---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即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那么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组织救灾、抗灾巡行天下，如果嫫祖类似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历史上称她是“行神”、“道神”，这也正是她的一种责任和任务习惯常态。

C、珠峰映射原理区块链科考系列

总之，综上所述，教授、博导、四川省社科院党委李后强书记认为：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最早进入四川盆地活动。原始宗教可能最早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随着人类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埃及金字塔建造可能受到青藏高原金字塔山形的启示。第一，亚洲是全球陆地最高点，全世界所有 8000 米以上的山峰都在亚洲。青藏高原位于中国西南部，地理界线为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等，海拔 4000 米以上，面积约 250 万平方公里，雪山连绵，冰川广布，是地理第一阶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呈巨大金字塔形态，最高的珠峰达 8844 米。据地质考证，早在 20 亿年前，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称古地中海，与太平洋、大西洋贯通。由于印度板块北移与欧亚大陆板块相撞，受挤压抬升，成为当今的最高山脉。过去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于 6500 万年前。但最新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山的形成最少有 4.5 亿年。这推翻了早期的理

论即 6500 万年。

根据科学家测算，宇宙的年龄大约是 150 亿年，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在宇宙中已旋转了 46 亿年。生物的历史至少也有 33 亿年，而人类的历史大概为 300 万年。约 33 亿年前—25 亿年前的太古代，是生命的开端。约 6 亿年前—2.25 亿年前的古生代，是生物大爆炸的时代。奥陶纪（约 5 亿年前），出现脊椎动物。志留纪（约 4.4 亿年前），出现鱼类，植物开始上陆。约 7000 万年前至今的新生代，是哺乳动物和人类的时代。在渐新世（约 4000 万年前），灵长类中产生了猴类和古猿类。到上新世（约 1200 万年前）时，古猿逐渐向人转化。新生代的第四纪（约 300 万年前至今）是人类的时代。人类在成为完全形成的人之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猿人，也称能人，出现在 300 万年至 200 万年前之间。

二是晚期猿人，也称直立人，其生存年代约从 180 万年至 20 万年前。三是早期智人，也称古人，生活在 20 万年至 4 万年前。四是晚期智人，也称新人，出现在 4 万年前至今，晚期智人就是现代人类。科学家研究表明，人类是从一种 3 亿多年前漫游在海洋中的史前鲨鱼进化而来的。这种名为棘鱼属的原始鱼类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颌类脊椎动物的共同祖先。2013 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研究员等人证明：类人猿起源于约 5500 万年前。总之，喜马拉雅山脉早于人类诞生。

2015 年科学家在《隐秘的喜马拉雅：亚洲的奇境》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存在一种“会走路”的鳢鱼，它通体呈蓝色，个头很小，能够在陆地上存活达四天。大量事实表明，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因为喜马拉雅是地球上最早的一块陆地，其他地方当时还是海洋。直到今天，地球大部分还是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积 71%，陆地占 29%。人类来自海洋，但只能生活在陆地，并且需要淡水。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最大的淡水塔。所以，珠峰两边有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喜马拉雅山脉现在海拔很高，平均每年升高 1 厘米，但过去没有这么高，也不太缺氧，适合人类生存。喜马拉雅山上有许多海洋生物化石，说明过去的确在海洋之中。《圣经》故事中的诺亚方舟可能就是喜马拉雅。从卫星看地球，四川盆地就像是一艘停靠在青藏高原东岸的“诺亚方舟”，因此四川被称为青藏高原东大门。

西藏阿里地区 18000 年前的象雄文化也是证据。原始宗教可能最早起源于青藏高原，随着人类迁徙传播到世界各地。西藏到处是金字塔形的巨大山脉，埃及人造金字塔是否受到青藏高原山形的启示和影响，值得探讨。阿里的冈仁波齐山至今还被认为是世界多种宗教的中心。生物学家研究发现，

世界上所有生物,在喜马拉雅山脉都可以找到原型,即野生的原始标本,只是与现在人工驯化的或者自然进化的生物有较大差异。在喜马拉雅还有夏尔巴人和藏族,甚至发现了雪人的足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与昆仑山脉相贯通。昆仑山又称昆仑虚、中国第一神山。该山脉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宽130-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50多万平方公里。

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龙脉之祖”。古人类经过漫长进化,一部分人逐渐迁徙到昆仑山一带。所以,关于昆仑山的传说很多,比如古代神话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西王母”,人头豹身,由两只青鸟侍奉。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居所,四处行走,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这是造成今天许多地方争抢同一个远古名人的根本原因。后来,人类祖先的一部分顺着黄河、长江向东迁徙,到了中原和四川盆地,走向亚洲和世界。因此,有北京周口店人,有四川资阳人、重庆巫山人、云南元谋人。另外一部分到了古印度和两河地区,再走向非洲、欧洲,直至全球。1910年人们最早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后又在肯尼亚、希腊、土耳其、匈牙利、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省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经鉴定,腊玛古猿大约生存在1400万年前至800万年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即元谋人,距离现在大约170万年。

四川盆地处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约20万平方公里,海拔300至700米,地理界线为云贵高原、巫山、大巴山,内部为低山、丘陵、平原。四川盆地号称千河之盆,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400多条,不同规模的河流有5000多条,又是紫色(红色)盆地,属于世界唯一,具有内陆海洋性气候,物产丰富,最适合人类生存。四川盆地在远古时代也是海洋,巴蜀图语的著名符号“S”(或者“鱼”),就是指海洋和水波。人类从喜马拉雅迁徙到昆仑山再到四川盆地,在盆地创造了许多辉煌,如“资阳人”,还有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

“资阳人”是中国发现的第三个古人类头骨化石,也是新中国发现的首枚古人类头骨化石。伴随“资阳人”出土的,还有大批石器、骨器,特别是骨针、穿孔石珠、麋鹿角等文物。“资阳人”被鉴定为约4万年前的古人类,和现代的人类有直接关系,是古蜀人祖先。“资阳人”的发掘说明在此之前,古人早在四川盆地活动,顺着安宁河谷慢慢向南方扩散,直至东南亚、南亚。今天在安宁河谷发现的巨大石墓就是证据。《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怪书,记载了550座山,300多条河流,由战国中后

期到汉代中期的楚国人或巴蜀人所作,这说明作者很熟悉四川情况。古代丝帛只有四川产,蜀是丝帛原产地。

2013年9月国外《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报导,英国赫尔大学水文学者利用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详细地形数据,了解水流如何从山地向北方流动形成湖泊和内陆三角洲,并在一些情况下到达地中海而创建的计算机模型的最新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13万年至10万年前的间冰期,与现在相比,非洲季风能够到达更北部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季风所带来的暴雨可以滋润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山脉。该地区在最大季节性暴雨时节,每一条主要的河流都能够带走大概相当于尼罗河四分之一的水量。这些河流可以在沙漠中创造植被繁茂的“绿色走廊”和大片水域。这样一来,季风暴雨滋润了穿过撒哈拉沙漠的河流,撒哈拉沙漠曾经处于向北流动的三大水系的纵横交错之中,这为人类向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次迁徙创造了可能,即早期现代人类就可以经此迁移到北部地区和其他大陆。而鉴定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要采用计量历史学或计量地质学的技术创新。如其中,中科院遥感所及挂靠该所的“遥感考古室”,可给予帮助。

其次云南大学的天文高能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用高能实验测定湖泊沉积等材料,得出的我国近一万年气候变化曲线的峰值图,也可给予帮助。近代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还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国地质学者研究或传播关于因近万年大地震地裂等地质局部灾变,造成盆塞湖一类的特殊地貌结构等知识,是有空白的。刘东生先生补足黄土高原的认识,也说明这一点。四川海啸遗迹从哪里来?从平武到黄龙寺、九寨沟路上看到绵延数十里不见一只飞鸟、不见一棵草木的怪石嶙峋的大山,像刚发生过大地震的景象,就是一本书。云南大学高能天体物理学家喻传赞教授1992年在平武第四届全国数学、物理、力学及高新技术研讨会上,就拍案而起讲这本书,他说这不是近万年产生盆塞海灾变的证据是什么?他在会上放弃了原准备好的发言稿,专讲“喻传赞曲线”,即证明中国远古史中存在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的科学认识方法:他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近万年的气候变化曲线”的高能实验测定项目中,发现该曲线在6000多年前和4000多年前有两处出现特高的奇峰,大大超过曲线全段其他地方的峰值。

喻教授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在惊异之余,终于在远古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了答案,即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有真实成分。“喻传赞曲线”是女娲王朝、大禹王朝存在的第一批科学根据。

7、摇钱树之谜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

绸之路”，不是从零开始，它远不止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李后强教授的“天府学”，立足于珠峰映射原理——青藏高原是人类共同的舞台，世界淡水塔，是人类最早活动之地；青藏高原的分开东西两面，形成今天国际占主流的欧洲水平，和相比要落后的东亚态势。

钱学森院士曾谆谆告诫：“有几分科学证据，说几分话。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无助于深入研究问题”。李进副省长讲话提到：“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笔者用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科学解读。但北京著名学者何新教授的博客一直在讲，维京人的后裔在近代出版的欧洲古史中的“辉煌”历史，有不确实的遗憾，给人耳目一新。

问题来自，用文字、用纸张记录的古史，有的时间已过去两三千年。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司马迁的《史记》，也不是用严格的年表、王表顺序记载上古史。改革开放以来，绵阳市盐亭县境内发现与丝绸源头有关的数十处古山寨城邦遗址和遗存，成为可以开发旅游，也可以开发中华万年古史的试点工程，引得海内外大批专家到此考察，以揭开丝绸之母、外贸之母、金融之母、开放之母和人类文明大爆炸的联系，那么它以什么硬证据文物，打开笔者“科商”的呢？

1) 从嫫祖说古今科商传奇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先生 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回国述职期间应邀赴深圳考察，会见了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考察了华为研发中心和手机生产线，并在华为大学发表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的主旨演讲。他说：“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发难，明面上打‘贸易战’，暗地里在打‘科技战’，想把中国科技大发展的势头遏制下去”。这话醍醐灌顶——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亿的各地人民思考嫫祖，成百上千的各路学者研究嫫祖。笔者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好——恰恰是智商高、情商高的体现：兴趣在诗词歌舞小说绘画等艺术表达，和文献考究的人多。但为啥至今仍各自为阵，存在“李进难题”？这能与国际的科学多交流吗？而只沿着智商高、情商高的这条道路走下去，还不能够让世界认识嫫祖——从“科商”认识嫫祖缺少，嫫祖研究不可避免会被分割成智商高阵营、情商高阵营特征，和智商高+情商高结合特征等三块阵营。但这种各自登高的情况，也不是都能一定走好到底。

正如贸易战有记者说会分成一个是美国为主导，一个是中国为主导，一个是“坐山观虎斗”的大国为主导。华为的任正非总裁与此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世界一定要走向互联互通；他说：“如果美国人到中国来，需要换一个手机才能打电话，中国

到美国换一个手机才能打电话，这是人类社会的倒退，不是前进。而且信息社会将来互相依存度会越来越高，特别是软件定义云社会以后，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是很复杂的，所以与科技脱钩是政治家不太明智的一个幻想。比如，美国零部件不卖给别的国家以后，美国零部件厂家就会变小，生产成本会变高，人们在消费时就要付出高一点的成本才能进行消费。全球化的目的就是要优质配置资源，我们今天享受社会的服务和成本是比较低的，将来分裂成两个板块，其实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我估计华尔街也不会赞成”。嫫祖研究的道路，最终也会一样。

A、黄帝时代青铜像之谜

1998 年 1 月 22 日《绵阳日报》第三版“天下大观”专栏，发表《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引发领导之间、专家之间争论风波——因为就在 22 日发表的当天早上上班时，正遇上市委开常委扩大会议，《绵阳日报》同时送发到每位领导手里。但会议正式开始后大家惊奇地发现，主持会议的市委第一书记冯崇泰书记开口说话，不是讲原定的议题，而是拍了拍《绵阳日报》说：“黄帝时代怎么会有青铜器？我是文革前上清华学工科的，工程上没听说四千多年前能铸造铜器；考古上也没有看到发现四千多年前有铜器文物的出土”——他言外之意是《绵阳日报》的报道，对绵阳市影响不好。大家以为冯书记只是批评几句就算了，哪知他一议论就是十多二十分钟，到会的领导都不好开腔。列席会议的《绵阳日报》社长兼总编严泽铄同志头都不敢抬。这时市委宣传部长赵欣同志，觉得《绵阳日报》是归他分管的部门，只得出来说话：“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才放了过去。

会议一结束，严泽铄总编立马赶回报社找到笔者，详细说了冯崇泰书记开会说的事情和他的委屈。《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是笔者编发的，从办公桌里笔者拿出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胡刚等编的《世界简史》，翻开第一章就是古埃及“公元前四千年中期，埃及人已学会了冶炼金属的技术，用铜制造工具和武器”。接着又拿出一本科学杂志说：“严总你看，这是报道乌克兰的草原考古，在六千多年前的马的坟墓头骨遗骸嘴部发现铜嚼子”。马嚼子，就是连着缰绳上套在马嘴巴上的金属部分，借以控制马匹的活动。现在一般是用铁嚼子做马嚼子，铜嚼子说明人类在铁嚼子之前就开始使用了马嚼子。原来家马最先可能出现在今天乌克兰一带的草原上，其标志是在第聂伯河西岸的德累夫卡遗址发现了距今 6000 年的具有明确佩戴过马嚼子痕迹的家马骨骼。马嚼子考古现象是“前苏联学者在乌克兰草原的斯里第尼·斯托克文化发现的一些马骨，特别是在第聂伯河西岸离基辅 250 公里的德累夫卡

遗址中，还发现了两条狗、陶缸及近似马面颊片的鹿角合葬的一匹牡马。该马有7~8岁，生活在公元前4000年”。此马经美国学者安东尼和布朗的研究，发现有使用马嚼子的痕迹，从而“认为很可能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斯里第尼·斯托克铜器时代文化中，马即被人类驯服，变成人们的坐骑了”。

严泽铤总编仔细看完所指的文章，没说话带着杂志走了。以后也没有再过问此事；笔者不是说冯崇泰书记的认真有错。其实青铜器的考证有严格的报道——从考古发现的铜器，提取类似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在对标查找巴蜀和全国、全世界发现铜矿地点的铜的同位素类型和含量。对上号的，说明青铜器出自哪里？以及制造的时段。但这对我国很多专家来说，都是难题。其实笔者编发《盐亭发现黄帝时代的青铜器》是很认真的。事情缘起1995年3月18日，盐亭县金鸡镇农民岳大登、杨华茂、岳树伦等人，在金鸡镇烟台山顺天寨挖出一尊十分古朴的高约60厘米的青铜跪俑。正遇上绵阳市团委青少年活动中心颜晓亚主任在金鸡镇采风搞摄影，岳大登等农民听说颜晓亚主任是知名摄影师，又是市团委宣传干部，就拉着不准走，要他去拍照和向上级汇报。颜晓亚主任考察后认为是真实的，回绵阳后带着拍照的铜像、古桑化石、石刀片、石斧、陶蚕等照片，到报社反映看到的情况，要求给予报道。此时笔者才第一次听到盐亭发掘出古青铜像。

由于不是正式鉴定，报社决定叫第三版的“天下大观”专栏考虑——“天下大观”是带故事性的新闻。笔者是编辑之一，于是在书刊中开始收集远古梁州铜矿和冶铜的材料。看到有记载黄帝时代已“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在盐亭不远的中江、北川、彭县等地都有铜矿。到1997年底盐亭城郊五指山建“嫫祖公园”举办开工仪式，邀请报社。笔者随同王天柱副总编、办公室任启乔主任参加。在盐亭举办的“嫫祖文物展览室”，笔者第一次看到玻璃柜里展出的岳大登等挖出青铜跪俑。事前笔者已在绵阳城里“工美大王”李照明先生的商店，看过一个古“青铜跪俑”的仿制品，对比岳大登等挖出的青铜跪俑锈蚀严重，到处都有锈蚀孔；从锈孔看出铜像铸胚很薄，但铜像造型精致。相反李照明商店的古“青铜跪俑”，人物造型粗糙，铜像铸胚很厚，且无锈蚀孔。“嫫祖文物展览室”的负责同志告诉：盐亭的学者据嫫祖时代的历史和当地传说，初步把岳大登等挖出的青铜跪俑定名“金二伯铜像”——原因是盐亭数千年来流传着“金二伯射黄帝”的妇孺皆知的故事，金二伯铜像下跪形象有后来对认错的表现。

当时盐亭县嫫祖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均中主任也实话实说：专家之间也有争论，如川大林向教授等到金鸡看后，说是赝品。理由是有人到台湾也发

现有类似青铜像，目前一些文物市场也有，疑是有人买来预先埋在那里的。但四川省博物馆雕塑院名誉院长叶毓山教授，却鉴定是比三星堆更远古的青铜像。金鸡镇政府派干部去调查，岳大登要杀鸡滴血指天发誓：“自己如作假遭断子绝孙”。事情到了这步，翻年的1998年初，报社同意在“天下大观”专栏报道看有什么反映？

绵阳市委书记之间其实意见也不一致。1998年2月冯崇泰书记调成都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海清书记作绵阳市第一书记，市委对嫫祖文化加大了支持。其实，杨海清书记1985年5月调任绵阳市委副书记后，到盐亭县检查工作到县科协，当时笔者汇报建农村各乡镇科普协会受欢迎。杨海清书记说，他1963.-1967年在西南农学院读书，毕业后1973-1977年在平武县枕流公社作过党委书记，知道农民需要科普。笔者和杨海清书记的这次汇报后没有再接触，但1993年《嫫祖研究》一书出版后，盐亭县把书分送给市上领导。一天晚上，杨海清书记一人在红星街散步遇到笔者，他居然还能认出来。他对笔者说：“你们的《嫫祖研究》一书写得不错”。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想：为啥市委书记之间有这样的不同？

冯崇泰书记1942年生，安徽五河人，1961—1967年在清华大学冶金系金属学及金属材料专业学习。毕业后曾在兵器工业部5023厂当过工人、车间主任、厂长，1986年当上四川兵器工业局副局长，1987年调任中共四川省绵阳市副书记，他抓工业是很能干的。但改革开放后，面对不熟悉的巴蜀古文化研究热的前卫，他作为外省人，听惯的对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一直宣传，是中原和华东地区占主流。因此面对不熟悉的兴起的巴蜀古文化研究热的前卫，有质疑，也很自然。而杨海清书记1944年，绵阳本地人，因学农，对抓农业很熟悉。他希望结合嫫祖文化，促进绵阳农业生产，也能理解。

B、巴蜀有无上古文明与李白之谜

巴蜀有无上古文明？其实历史上四川本土内部早就有争论，而且巴蜀无上古文明，在四川内部还占上风。例如，汉代生活在成都的扬雄，也同司马迁一样言先进其文不雅驯，他称上古之纪，蜀地尚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蒙昧时期。然而在他家乡，如今就发掘出著名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以及宝墩等五座古城遗址。更奇怪的是，在他北上京都，途经绵阳，逗留住宿之地的永兴普明，如今也发掘出大型豪华的汉墓。但扬雄也像懂新闻报道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选择规则一样，他只认京都、府地的繁华，其他偏远之地或过时的先进东西，推荐报道都难言之。这种“落后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延续到近代，中华五千年前的早王朝文明，几乎被“以苏解马”的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母系氏社会或父

系氏社会、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等史观否定掉。

再是江油唐代大诗人李白，19岁时写出长诗《蜀道难》，和他的老师——盐亭唐代杰出纵横家赵蕤发生争论。赵蕤在唐开元年间为金鸡镇嫫祖山嫫轩宫重建，写《嫫祖圣地》四方碑志。文中明确提出：“黄帝元妃嫫祖，生于本邑嫫祖山”。盐亭县作家协会名誉会长赵良田局长据《嫫祖圣地》碑志，归纳“嫫祖精神”有四点：一是嫫祖首创蚕桑，法制衣裳，开中华文明起源之“美”；二是始兴嫁娶，崇尚礼仪，开中华文明礼仪之“德”；三是协和百族，帛化干戈，开中华文明和谐之“和”；四是辅弼黄帝，奠定国基，开中华文明发展之“本”。以文明、国家和青铜器的出现为标志，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盐亭人已从山顶迁移到了山脚。随着远古山寨城邦的衰败和人工制品的流失，盐亭已大部分失去和遗忘自己的古文明遗产。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更具颠覆性的巴蜀无上古文明宣传。赵蕤当然不同意。

奇怪的是平武县史志办研究员曾维益主任，出版的约70万字的《李白〈蜀道难〉新探》一书，对历代学者都把《蜀道难》的创作时间视为千古之谜的问题给出答案，李白创作成名作《蜀道难》的时间是在其20岁之前，李白16岁时即有了《蜀道难》草稿。但有部分学者认为，此观点与当地发展旅游的借题炒作有关，有点牵强附会。

曾维益主任曾送笔者《李白〈蜀道难〉新探》一书，研读后认为曾维益主任的观点，与笔者采访盐亭天垣乡赵家沟赵成芝老先生，他讲的赵氏远祖及赵蕤等传说能联系——据传赵蕤的祖先在盘古年代曾发明过“皮鞋”的大臣，这是用晾干鞣制的牛皮或其它动物的毛皮包裹脚。到唐代赵氏庄园在盐亭全境近40处，赵蕤虽出生盐亭两河区，但作为赵氏大庄主的私塾先生，赵蕤兄弟三人在盐亭的三河、天垣、金鸡等处还有别业。天垣赵家沟即为赵蕤前辈老三买的庄子，并把买的的天垣乡胥家沟的庄子赠送给帮过大忙的胥氏人家。但事后因赵家和胥家闹矛盾，一部分胥氏人家迁移到了江油，如李白的母亲胥月莲及小姨胥仲莲有类似“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也曾感动过赵氏人家。又传李白的祖先与葛洪《神仙传》记载的汉朝人李意期有关；李意期和绵阳游仙区“游仙”之名也有关，与此李家与胥家先人有过世交。

2001年10月22日《绵阳日报》第8版，发表绵阳学者刘文传、蒋志教授等的《“游仙”之来由》一文。其中说：三国刘备到涪城与刘璋聚会期间，就拜访过的李意期，实为11代的李家班主李意。涪城游仙李意期实为绵阳地区一支从墨家向道家转型的工匠班主家族。据传第一代李意期约生于公元前

158年，正是西汉文帝执政。文帝在巴蜀设立工官，大力扶持私人工商作坊发展，其产品还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李意期是绵阳一家专与西域贸易、产销结合的大工场班主。同时李意期对工场的技术传授、培训、生产、营销，学习戏家班管理，实行严格的班主制，招入工场的徒弟、匠人必须从一而终。

李意期工匠班主家族产销的西域贸易与招收工场徒弟从一而终的两者结合，正是李白父亲李客家与母亲胥月莲家先世两家结缘的由来——据传李白(701—762)父亲李客家先世，是李意期工匠班主家族商贸一房移居留在长安—陇西一支的子孙。而母亲胥月莲家先世，则是李意期工匠班主家族工场徒弟中得技术真传一支的子孙。唐朝时疆域新疆以西常遭突厥族侵犯，防守碎叶城等边疆需要大量修建营房、工程的匠人，以及商贸、物资，李白的外公胥家工匠班主家族是国家常年征召的民工队伍和领队人，并代管商贸。李白的母亲只两姊妹，无兄无弟，李白的外公年老不能从军领队，李白的母亲胥月莲就常代父出征。正是在碎叶城，胥月莲认识从军商贸的年青的李客，两人相爱结婚。胥月莲怀上李白后不能指挥工程，被妹妹胥仲莲和丈夫李客送回蜀地江油老家生育，李客又返回碎叶城经商。公元701年李白出生，但不幸的是李白的母亲产后得病不到半年而亡，接着公元702年李白的外公也得病去世。他们死前，都希望李白能送给李客照养。

于是妹妹胥仲莲遵命将一岁多的李白送到边疆碎叶城李客手中。直到李白长到8岁时，胥仲莲和姐夫李客又才把李白送回蜀地江油老家。但李客居住了一段时间又离开了江油。平武县史志办曾维益主任的《李白〈蜀道难〉新探》书中说，李白创作《蜀道难》，是在其20岁之前，16岁时即有《蜀道难》的草稿。也许正是李白8岁时随父李客从碎叶城回家于绵，经历平武等大山路程的艰辛，留下记忆的写照。而他早早离川，和19岁那年与老师赵蕤的争论也有关。

嫫祖研究，其实如履薄冰。据20世纪以来绵阳学人前仆后继的研究，在7000多年前的女娲突变纪到4000多年前的禹突变纪，四川盆地一度曾处于盆塞海、盆塞湖、堰塞湖与溃坝干涸间断交替时期，目前嫫祖故里盐亭的山川地貌鲜明地展示了当时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留下的遗迹。据传说嫫祖山顶的十里长坪山就是嫫祖时代近万人口的大城镇。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老师纵横家赵蕤，曾购置过这里的部分遗存，人称“赵蕤别业”；也称这里山顶为“长坪山”；李白拜访赵蕤为师，求学论道就在这山顶上，并且构思《蜀道难》这首千古名诗也是在这山顶上完成的。而赵蕤也是在此期间为嫫祖山嫫轩宫写的《嫫祖圣地》碑志，与曾维

益说的时间相合。赵蕤明确指出丝绸源头就在盐亭---至今嫫祖山山顶还有观天象台遗迹；今天所称三台城郊赵蕤著书居住过的“长坪山”，实为对名人赵蕤的纪念。

2) “科商”与丝绸

学生李白对上古文明的失语症，与老师赵蕤对产生过丝绸的山寨城邦文明和盆塞海洋文明的情有独钟，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绵阳市南北两地人的环境地理亲身感受所积淀的差异，也反映了中华远古文明数千来的“失语症”之争论的内因。解开这个谜，不但有古罗马等其他文明古国对丝绸情有独钟的历史昭示，也有“维京人”与“天下人”世界比拼在近代以来昭示的“科商”问题。

直到公元 8--11 世纪以前，北欧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等维京人的海盗身影，都还在“海上冒险”征战袭击、掠夺、杀戮、打劫来自西南欧洲罗马、希腊等方向的商贸船只。那么被抢劫的物资、财富从哪里生产、创造而来？为啥“维京人历史”记载要把古罗马、希腊从早期人分开？又为啥这些“维京人”后来建立的国家，在近现代成为世界的强国、富国？其实谜底很简单---“科商”是人类不朽的基因。

A、古罗马与巴蜀丝绸之谜

谜底的背景是，由于距今 7000--5000 年前古巴蜀盆地的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才造成有早期科学与民主的气氛，也才有嫫祖、女娲、伏羲、黄帝等人的丝绸发明、改良、推广与交易。也正因为有古罗马、古希腊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才造成该地域的兴盛、强大，也才造成有对中国远古盆塞海洋文明丝绸高科技的强烈需求。

李学勤教授曾来北川考察大禹遗存---2001 年 12 月 31 日他在《绵阳日报》的“科技城导刊”版，发表的《古史、盘古与炎黄》一文中说：“绵阳发现盘古、炎黄二帝等传说及王表谱系，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甚至要早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二，中华文明的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

李学勤教授说得对，嫫祖古丝绸也是一种“场”。丝绸是古代中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商品。远在 2000 多年前的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人就称中国为“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地”。公元前 3 世纪秦统一中国，罗马人改用“cin”(“秦”)来直接称呼这个丝绸大国。丝绸之路的两端就是当时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与罗马。这条大路不仅为罗马和整个西方带来了珍贵的丝绸，还带来了冶炼等高超技术以及

大黄、桂皮等药材和香料，当然还有遥远东方古国的文明信息。对中国来说，丝绸之路也成为一条面向世界和了解世界的信道。所以我国的《后汉书》，称罗马为“大秦”或“骊阡”；将罗马的“水精”即玻璃，写得特别详尽。当时罗马出现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甚至因贵族们大量购买而出现了国库资金困难。西汉时期汉武帝极力扩大疆域，开拓市场，于是派遣张骞于公元前 139 年出使西域，在安息（伊朗）被扣留，出使失败。公元前 119 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仍未达最终目的地。

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丝绸作为昂贵的国礼和重要贸易商品源源进入安息王朝(前 247-224)统治下的波斯帝国。中国丝绸的西传大约是在西汉通西域之后，使中国丝绸在欧洲得到越来越多的推广和青睐。不过，只有王后才能穿上绣着简单花纹的丝绸，而其他贵族只能穿上普通素色的丝绸。那时候中国丝绸的价格简直可以和黄金并肩。罗马人要想购买丝绸也并不容易。因为运输是个百转千回的过程，要经过罗布泊、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再经过中亚的撒马尔罕，到达波斯才能转运到达罗马。波斯因为征收过境关税，使得一些商人望而却步，而罗马人要得到丝绸就只能从波斯买高价了。罗马人想与中国直接交易，却因为波斯从中作梗始终未能如愿。

中国丝绸的威力有多大？轻软的丝绸，铁血的战争---二者之间从丝绸之路开通算起，数百年间，丝绸正是操纵着世界经济和国家利益争端的那只手--如同今日的石油。据说古罗马人曾因此输掉了一场战争---公元前 53 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与另外两位巨头恺撒和庞培争夺个人荣誉，克拉苏率领四万人率军出征进攻东方的安息帝国（波斯地区），结果克拉苏军队惨败，两万多名罗马将士阵亡(其中包括克拉苏的儿子)，另有一万余人被俘。克拉苏本人为免受当俘虏之辱自杀身亡，其首级被呈献给安息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前 57 年至前 38 年在位)。强悍的罗马军队为什么在这场著名的卡尔莱战役中遭遇惨败呢？据载可悲的是，他们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吓败的---那些忽然间出现的鲜艳刺目的军旗，后来据西方史学家考证，那些鲜艳刺目的旗子就是丝绸做的！此后，丝绸很快进入了罗马社会，成为罗马社会的高档奢侈品。罗马人爱上了中国丝绸，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尤其是上层社会，丝绸简直是他们贵族身份的象征。它光滑、轻盈、精致、华贵，跟古罗马人之前穿的毛麻相比，不知舒适多少倍，高贵多少倍。所以，人们争相购买。

这一期间的交往佐证，还是公元前 53 年古罗马克拉苏，率数万人征战古帕提亚王国（安息），在卡莱（现土耳其的哈兰）战败，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 6000 余人神秘失踪，成为古罗马悬案。但《汉

书·陈汤传》提供的线索记载，公元前 36 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 4 万人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现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生虏百四十五，降虏千余人”。战败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而这“重木城”的防卫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在卡莱战役中战败的古罗马军队。

陈汤将其带至甘肃永昌，在祁连山麓始置“骊靬县”。《后汉书》写道：“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这个县的名称来自古罗马之名，即“骊靬”的音译。骊靬人就可能就是普布利乌斯的残部。现在永昌县一个叫者来寨的小村庄，已发掘出一座古城遗址。这个小村庄生活着 270 多名外貌特征特殊的人：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睛，毛发金黄，头发自然卷曲，身材魁伟粗壮，具有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基本确定是古罗马人的后代。到了东汉时，班超曾大败西域诸国，在西域活动达 30 多年，被封西域都护。他于公元 97 年派手下大将甘英出使“大秦”。这时的罗马正是蒂托和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市的人口达 150 多万。甘英一直走到条支的西海，即现在的波斯湾。

甘英这次出使得到很多有关中亚各国的直接材料和有关罗马的间接材料。一般认为，从大秦（古罗马）方面来到中国的第一批人，是公元 100 年前后从地中海东岸推罗城前来洛阳的罗马商团。古罗马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中，提到曾有一位名叫梅斯·蒂蒂安努斯的马奇顿商人，同中国保持着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曾委托代理人组成赴华商团，于公元 100 年 11 月抵达洛阳，受到汉和帝的召见，并赐予“金印紫绶”。公元 161 年古罗马皇帝安东尼诺·马尔科·奥雷利奥（公元 121~180 年）又派出使团，带着象牙、犀角前往中国交好。这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已是东汉桓帝时期。罗马帝国后期，罗马商人秦论即曾来到中国。据我国《梁书》记载，秦论经海道从日南（即现在的越南）进入我国，当时正值三国时期，曾于孙权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在南京谒见孙权。中国政府还派刘咸护送他回国，可惜刘咸在旅途中病故。但罗马的古籍未再提到秦论归来后的行踪和谈话。

另在文化交流方面，最突出的事是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也借丝绸之路传到我国。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直到敦煌、大同的云冈、洛阳的龙门等石窟艺术宝库以及菩萨、飞天的形象和藻井、佛龕的形状等，都可看到西方古典传统的影响。现在山西发现过公元 14 年~275 年间的罗马钱币，这是两个文明古国交往的实物明证。

B、古丝绸之路丝绸技术间谍战

替代安息人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萨珊王朝（224-651），是一个比安息王朝更加强盛的朝代，史

称萨珊波斯帝国，强盛富足的社会意味着对丝绸更加旺盛的需求。然而，此时东方强大的汉王朝覆灭，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都是一些短命王朝，忙于你争我夺，根本无力控制广袤的西域地区，丝绸贸易因此受阻。为满足国内的丝绸需求和对西方的丝绸贸易，强大的萨珊王朝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南方进口丝绸原料。然而，随着进口成本的增加，波斯变本加厉地抬高对西方的成品丝绸出口价。330 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不满波斯从中盘剥，于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自己进口丝绸原料，并在现今的叙利亚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丝绸加工业。

此举惹恼了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309 年至 379 年在位）。当时沙普尔二世又眼见东罗马帝国抢走了自己的丝绸贸易垄断权，不禁怒从心起。360 年沙普尔二世不再与东罗马帝国小打小闹，而是亲率大军出征叙利亚，取得完胜，不仅解决了领土争端，将叙利亚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版图，而且还将叙利亚的丝绸织染工和有关设备尽数掳到波斯本土，铲平了当地的丝绸经济，再次将丝绸贸易垄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后来东罗马帝国又绕道东地中海、红海，从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弄来一些丝绸原料。为了免除再次被波斯铲断的后顾之忧，他们将丝绸织染加工设置在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家作坊内，严禁外面进行丝绸织染加工。但也严重阻碍了丝绸织染业的发展，因此东罗马帝国内成品丝绸的生产始终有限，不能满足社会的大量需求，还得依赖从波斯进口。作为丝绸出产地的中国也深知丝绸贸易的重要地位，因此严禁丝绸生产技术外泄。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功地严防死守住了这项技术，但 420 年史书上记载，一名汉家公主下嫁于阗王，在其夫婿的恳求下，这位公主将蚕卵藏匿于头饰，桑种混入随身携带的草药中，又将几位女缫丝工化装成自己的侍女，成功地将桑蚕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带入于阗。当时掌握着中亚和西域地区控制权的是萨珊波斯帝国，因此，波斯也很快就获得了这项技术。已经掌握了丝绸生产技术的波斯，尽管仍然从中国进口丝绸原料，但总体来说国内丝绸总量大幅度提高，丝绸出口贸易价格不降反升，丝绸价格的暴涨让东罗马帝国忍无可忍，只好兵戎相见，但屡战屡败，只好忍辱接受波斯人的重利盘剥。483 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登基（483 年至 565 年在位），他见国内丝绸价格暴涨，民众怨声载道，542 年迫于巨大的丝绸经济压力，查士丁尼大帝不得已与波斯开战，结局是 545 年签署停战协议，东罗马帝国的堂堂一代雄主，不仅赔款黄金 500 磅，还将自己医术高超的御医，借给波斯国王霍斯陆（531 年至 579 年在位）使用一年。

查士丁尼深知要解决国内的丝绸需求，最根本

的办法是获得丝绸生产技术。于是一场丝绸间谍战展开：550年或551年查士丁尼召见了几位修士，许诺他们若带回蚕桑卵种，必以重金奖赏。这几位修士为避开波斯边关口岸的盘查，不惜绕道北高加索，一路餐风宿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费尽心机，将蚕桑卵种藏匿在空心的手杖竹节中，终于在553年或554年将蚕桑卵种成功偷偷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完成了600多年没有完成的“使命”：偷窃了植桑养蚕技术，养蚕业传到欧洲。地中海宜人的气候十分适合桑树生长，桑蚕养殖业在东罗马帝国境内迅速建立起来，随后丝绸生产技术进入西方其他地区。从公元5世纪起，中国与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大规模地开展贸易，安提阿克是中国和拜占庭贸易的中心，也是中国商人到达的最西站，丝绸之路的西端通过安提阿克伸向拜占庭。

公元6世纪中叶，东罗马帝国与波斯王朝因为争夺两河流域展开了战争，这场战争后来延续了有400年之久。当时波斯国王甚至下令封锁了所有的商路，让拜占庭人离开丝绸变成乞丐。罗马人当然不甘心，他们想摆脱波斯王朝，更想自己生产丝绸。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后，一度中断了的东西方交流重又兴盛起来。那时从欧洲到东方，均需通过地中海中部。意大利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在很长时期内，威尼斯在与东方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里最先成功地在欧洲仿制了染色软质的中国瓷器。

1585年佛罗伦萨也设厂制造蓝花软质瓷。1627年比萨瓷工制成了软质青花瓷碗，先是阿拉伯蓝色，后来又模仿中国青花，并由那里传到了到荷兰和法国。控制着亚欧大陆丝绸贸易的波斯这个中间商，从中国大量进口生丝和素锦，进行织染加工，然后转手高价卖给罗马。丝绸经济支撑着当时波斯社会的繁荣昌盛，正如现今石油支撑着伊朗的经济大厦。但在15世纪后波斯虽然仍是亚欧丝绸贸易的最大中间商，却也不再享有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权了。然而一千多年之后，他们另一种重要经济物资-石油---如现今的伊朗，虽然再也不能用丝绸勒住西方的咽喉，但却能时不时地用石油掐一下西方的喉咙，以应对来自西方大国的动武的威胁。

C、“科商”来源桑林生臂手

丝绸间谍战，中国严禁丝绸生产技术外泄，西域于阗王用的是“情商”；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用的“智商”，完成的“使命”，把桑蚕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窃取到手，而传到波斯和欧洲地区。桑蚕养殖和丝绸生产技术属于科技专利，窃取专利属于非法。但古代没有“专利”的国际国内法规。非法与合法交织一直进行到现在都存在---严厉的“专利”法规，制约着落后地区的生产生活，一是有“革命”之说，类似“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二是有

前途的新技术，大多数发明者都走申请专利的道路，但少数发明者为了及时造福全人类，也有主动放弃的，例如发明提炼放射性镭元素的居里夫人，就是个典型。

嫫祖发明养蚕缫丝，说明她有“科商”；而且嫫祖也类似居里夫人，为了及时造福人类，她是不辞辛劳到大江南北普及养蚕缫丝，所以今天才出现“李进难题”---“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议”。其次，刘晓明大使在华为说的“美国在贸易上对中国明打‘贸易战’，暗在打‘科技战’”---也说明今天提出“科商”讨论，是时代必然。

按理说，“科商”表露的是一种“知识”，和“智商”、“情商”有很大的交叉，特别是可以归类到“智商”里面去。但今天为啥要把它单独分立出来？说来这是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例如，文革中的中学自然科学教材，提出过去经典有名的数理化天地生原理定律，都是工农大众创造的，他们养活了那些“臭知识分子”，却“窃取”了他们的成果，所以要把课本命名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科技兴国”；农村搞“养鸡专业户”、“养猪专业户”；城市里搞“经开区”、“科创园”等，都含有追求“科商”的意味。

从理论定义，智商通俗地可以理解为智力，表示人的聪明程度：是指数字、空间、逻辑、词汇、创造、记忆等能力，即智力商数，是衡量个人智力高低的标准；但智商是和遗传有很大的关系的。而情商是与智力和智商相对应的概念。是一种对自身行为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关系的认识能力，是体现情感性的智力水平。即指一个人社会交际能力，包括一个人的动作语言和思想；又称情绪智力。情商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努力培养有利无弊。智商与情商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智商主要用于解决逻辑关系、推理演算、创新创意等一系列相对比较程序化的问题，而情商主要用于解决情绪调节、关系认知、待人接物、角色互换等方面的问题。

智商和情商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要进行创意和创作，要进行逻辑的推演，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很多时候也做不到。而与人沟通交往，如果有了强大的分析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很多时候能更好的认清现实，进行关系的解读和处理。在现代，智商与情商看似简单的词语，虽与每个人的成功密切相关，但单纯的高智商、单纯的高情商以及高情商和高智商的结合，包括单纯的意商、经商、政商、军商、德商、灵商、文商、心商、志商、责商、律商、健商、体商、性商、逆

商、胆商、财商等高，一个国家是否就一定成功呢？例如，天大变，地大灾，才体现可比较“科商”呢？

“人生无进退，天地宽窄间”，这一进一退、一宽一窄尽显对科商的生活态度。什么是“科商”？科商指在有正当的生计条件下，对前沿科技的争论或难题的参与，不计较个人功利追寻前沿科技原理的思考、探索、学习、资料收集、研究不懈的兴趣、恒定或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科商主要是后天获得的一种特殊的区别智商与情商概念的能力。“科商”凝结的科技原理有的从古到今是不变的，变的只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语言阐释。例如，量子起伏、虚实传输与“有生于无”，阴阳虚实表象拓扑形态的不同伦——联系数学的“0”与正负对称的四则运算，和负数的开平方及求对数等数论有关。“科商”更多的是跟随国际国内科学界主流前进，它的大小更多是在国家层面表现，且是可变的。所以不强求别人、名家、上层、国际机构等对自己工作的承认、奖励为目标。科商创意有的是高难度数学公式化，需要尽量普及让更多熟悉经典数理基础的人能弄明白；有的实验、观察内容，态度要等待让国内国际更多有条件的机构、专家再实验、观察去重复证明，而不以语言、工具、法律、意识形态划线等暴力相威胁。

据古文献《淮南子·说林篇》记载，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的女媧氏时期，就已懂得“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的道理。这里桑林表明，是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货币助长了经济的无形之手；这些功能的发挥，所以女媧王对万事都能理顺。传到约公元前4170-3150年嫫祖的城邦之美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所以求真考古人类起源序列、历史文化秩序的意义重大。因为古籍《淮南子》一书记载女媧氏成就的“桑林生臂手”的变化，说的就是货币类似无形之手，对社会有拉动作用的影响。为什么女媧氏的“桑林”意指“货币”，是因当时的养蚕抽丝织出的绸布，类似今天金融界的“黄金”作用。而伏羲氏成就的“太极、阴阳”等科商思维，以及古代自然国学的“无中生有”，也类似“0”量子力学的量子起伏的“正负虚实数对称”退相干映射，以及陈省身院士讲纤维丛对称破缺的平凡圈和不平凡圈。

证明“盘古--嫫祖文明”有文字、城市、政府和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发生，就是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的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约6000年前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我国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天津的王襄老先

生也曾公布过一块从四川盐亭县得来的石碑，他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而刊出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其次，我们不能不如实报道，1949年新中国的解放，由于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四川省仅在盐亭县就有近百在特定环境中中和革命发展中不合拍的旧人物被镇压；大批收缴中的有关古书籍、古文献资料被焚烧，数十座远古山寨城邦遗存被拆毁；其中在文革结束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销毁证据的事情。而今天，70岁以上活着的人中，嫫祖故里四川省盐亭县还能找到成十上百的这些见证人到场作证。

什么是“科商”？科商的重要——前沿科技原理思考的重要从何时起，突出地体现出来的？这可以肯定地说从一进入20世纪就开始了——“黑体问题”关系给德国的照明工业争取到一个竞争优势，1871年刚刚打造成形的德国，想跟英美竞争照明工业优势，几十年间德国一批顶尖物理学家百般努力，都不能解决黑体问题。直到1900年偶然中出现的普朗克，才得以完成。这个高昂的代价，即使后来德国政治几经曲折，换来的是整个民族智慧站到了“量子”高地时代。在真实世界这个难以捉摸的量子概念，发展出的量子力学，如量子隧道扫描显微镜，是一种比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更大的显微镜，对研究基因组学十分有用。还有激光、核磁共振、核元素分析等常见的应用，对人类学考古也十分有用，已成人类上古史大统一考古用的主流方法。

中科大教授袁岚峰博士说：以前我们最习惯的思路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就是，发挥组织能力的优势。或者层次更高一些，发挥信仰的力量。这些都很好，但都不是用科技来解决问题。一个国家如果成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国，那么它再怎么都不会太差。一个国家如果成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国，例如意大利，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意大利的汽车、机械和化工产业都是十分强大的。如法拉利、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等豪华汽车，都是意大利品牌。同样的道理，还有德国。德国的汽车、电子、机械、化工、光学等等许多产业都非常发达。同样的道理，还有荷兰。即使英国崛起，荷兰退出大国争霸的舞台，二战又被德国推倒占领，荷兰仍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是因为，荷兰的食品、化工、炼油和电机等等产业十分强大。与芯片相关的，荷兰有世界上最大的光刻机巨头。最近中国芯片业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中芯国际订到了荷兰一台极紫外光刻机，价格1亿多美元。总体而言19世纪时的工业国，现在仍然过得不错，因为它们仍然是科技先进的工业国。工业国跟农业国有质的区别，因为科技能带来无限的增长可能，而农业的增长空间

十分有限。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科技的基础上，那么即使现在是富裕的，也并不可靠。如一些西亚国家，靠卖资源就富了，但自己几乎毫无技术能力，如果没有外国工程师，连自己的石油都开采不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1999年10月7日《绵阳日报》第3版，发表作者的《绵阳丝绸话沧桑》一文，话没有说完的，就是嫫祖发明养蚕缫丝，与普及到中国近百年来不懈奋斗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把“科商”提升到了高科技竞争的层次。“科商”应该树立这样的价值观：科学本身就是好的。就基本的动机而言，科学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当发现了新的原理之后，科学的用处却会远远超过单纯追求高智商、高情商以及高情商和高智商的结合，包括单纯的意商、经商、政商、军商等高的实用的做法。“科商”是人类最伟大的“无用之用”。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商”思路是，开发一个新的软件，制造一个新的机器，或者提出一个新的原理。习惯于用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今天这个“科商”时代，是中国第一次拥抱科学。中国的科学以后会在世界上占据更高的地位。这需要所有人都付出努力，都为科学事业做出贡献。

3) 从嫫祖、女媧说科商

其实，我国已创立有自己的年代学理论，这是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引出的“落后侵略先进”史观：以目前传流的盘古王表追寻中华古王国的起源，透过原始的龙凤经济文化，所谓的古代国家，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困惑西方的如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这种版图很小，也就很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中华各民族的起源虽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但可以说汉民族起源的历史，就是远古盆塞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起源史。因为这一文明的顶尖优势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汉民族和中华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以及传承、争夺和溶合的基础。

因此不能把中国东南西北中五方区系内的地域古称号，当成是古民族的称号，如把蜀人、楚人、越人等与当时的古汉族完全相区别。盐亭有一则关于嫫祖设计越千古，产生中华多民族的传说。内容是嫫祖的丈夫轩辕，类似古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与古希腊各城邦相比，虽既专制又落后，但亚历山大使希腊联军遭到惨败，又先后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进攻波斯腹地巴比伦、巴克特里亚，远征中

亚，进入印度，建立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其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南至埃及，几乎包括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先进的古文明地区，实为盘古王的写照。但嫫祖没有让轩辕用战争像亚力山大那样来征服西陵，摧毁巴蜀的古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建立的成果。

在这里，中华的古蓝色文明首先举起了原始的自由与科学的旗帜，创造出像丝绸这样巨大的原始物质财富。即使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被后来包装为神仙、道人、鬼怪的盟王、城主、寨老板的手里，但人民的生活仍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舒适得多。因此这里的古联合国的国王从盘古到夸父，一代又一代都打出“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带领本土的能工巧匠，到海内外去撒播福音，但都不理想：走得近的都跑回了故土，走得远远的又杳无音信。

传说到嫫祖称王时，她审时度势，决心设计出一种能超越数千年的制度，让人民经历一段长时期的痛苦的磨练，才能醒悟先王们留下的“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人生意义。古书记载，轩辕出生在海外，即四川盆塞海东南边的广西，他是东北方炎帝的同母异父之弟。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之间内斗，又与东南方的蚩尤争夺和西陵氏的货物交换权，连年战争不断。在一次混战中，炎帝的母亲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东南方，磨难求生中，与蚩尤族的一位老工匠结合，生下了轩辕。少年的轩辕聪明过人，有不少的奇思异想和发明。西陵氏的国王歧伯卸任后，按神喻到南方外邦物色寻找王储，年少的轩辕在艰苦中虽然腿带有残疾，但仍被歧伯选中带回西陵，这就是嫫祖和轩辕有早期的婚缘的原因。到西陵氏，轩辕后来并没有当上国王，而是被北方白马族绑架到了中原，并奇迹般地又当上黄帝族的首领。

4) 从马云“科商”支付宝说摇钱树桑林生臂手

《淮南子·说林篇》记载“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道理是桑林表明代指市场交易使用帛币。这是从女媧--嫫祖时代到今天马云的支付宝表现的“科商”。据日本传来的消息报道，继全面进入中国城市公交系统后，支付宝正联手欧力士，一举打入日本城市公交系统。欧力士是日本最大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双方决定从今开始，首先在日本旅游胜地冲绳试验手机，“滴”一声完成所有购票流程，快速进站乘车。这将是中国的移动支付首次进入日本交通系统，日本人出门搭公交地铁，也将被支付宝承包。“马云要来了”，日本媒体甚至不惜动用头版头条报道。欢呼终于可以像中国人一样刷机坐车了；冲绳的一家单轨铁路公司宣布，全面接入中国的支付宝。

将把原本只能读取纸质车票的自动检票机全

面大改, 实现可一秒读取支付宝的二维码。马云在女媧--嫫祖“科商”时代的基础上再创新科商“全球付”---支付宝已覆盖全球超 200 个国家和地区, 服务着这个地球上超 8 亿的人口。从女媧--嫫祖发明蚕桑、丝绸到黄金、货币, 再到马云的支付宝, 这种“科商”最明显的改变是, 去一个国家, 不用再兑换这个国家的货币; 而是拿着支付宝, 用人民币结算---让全世界的货币都可以在支付宝上高效的流通, 无国界、无种族、无宗教---支付宝每天十亿、百亿的货币流通, 背后的本质是千千万万陌生人正因此建立信任---货币流通驱动信用流通, 这样的中华文明科商模式一旦从中国复制到全世界, 支付宝将成为全球人民的“移动世界银行”, 放大格局, 是少搞点争权夺利情商和智商结合的窝里斗。

但中科院原电子所研究员宋文淼教授, 最近的博文似乎说马云的支付宝成功不算“科商”。但按“科商”定义条款中的“科商指在有正当的生计条件下, 对前沿科技的争论或难题的参与, 不计较个人功利追寻前沿科技原理的思考、探索、学习、资料收集、研究不懈的兴趣、恒定或组织和收获的实在---科商主要是后天获得的一种特殊的区别智商与情商概念的能力”, 这其中的追寻前沿科技原理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 就包括马云类似的“科商”。

而宋文淼教授说的理由是: “马云只是一个能够用大数字计算来赚钱的人, 就像我们中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很多富可敌国的大商人的记载。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延绵不断的‘晋商’、‘徽商’的记载。直到今天中国登上世界的《财富》杂志上留名的豪富也不少。但是所有那些‘豪富’和‘资本家’是不同的, 和西方的资本家, 特别是美国的 19、20 世界的资本家集团, 从政治、经济和科学的概念上, 完全不是同一种‘概念’。看起来我国的大陆地区,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节中的‘资产阶级’, 还没有真正的独立地站立起来过! 其实‘资产阶级’是无法独立站起来的, 资产阶级必须通过他的知识分子才能独立的站立起来! 就像地主阶级必须通过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才能站立起来一样”。

看来宋文淼教授没有认真研究过什么是“科商”---“科商”定义条款中还有“且是可变的”。例如, 宋文淼教授在读清华大学和研究生以及在中科院原电子所工作期间, 和他的清华大学同班同学比较起来, 他的“科商”算是高的, 不然考上研究生就不止他一个人。从他 2006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实物与暗物的数理逻辑》一书来看, 他对经典电磁学理论的理解“科商”是正确的, 也很高的。这表明他当时的学习是“跟随国际国内科学界主流前进”, 这跟他工作环境能从实验重复证明和能收

集到相关资料也有关。但《实物与暗物的数理逻辑》书中, 从他对以霍金为代表的现代量子宇宙学等前沿科技原理的批评, 看出从政治、经济和科学的概念上, 他完全不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理解“虚数”是同一种“概念”, 也不是再“跟随国际国内科学界主流前进”。这与他年纪大, 也缺乏对国际科学界主流类似“超弦理论”数理深入学习的师资条件, 不如经典电磁学理论有关。

5) “科商”改写“修昔底德陷阱”

古巴蜀盆塞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 如果把当时游团、部落、酋邦组织的大联盟, 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 那么今天联合国的这种多元一体, 因是战争对抗的结果, 其功能松散, 就比不过那时。那时的“科商”就有是团结救灾、抗灾的结果。这是约公元前 8000-3150 年在川、甘、陕为一个大地震多发地区, 长江三峡和剑门关山峡因大地震的山崩地裂有合有开, 在川西北地区造成过无数的堰塞湖。如果其中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 造成长江三峡山崩堵塞而剑门关山峡地裂分开的组合, 引起长江断流, 黄河通过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剑门关山峡分开的峡谷流入四川, 古蜀盆地就有可能从堰塞湖演变为盆塞海。

而在约公元前 4170-2070 年相反的组合, 如有的大地震的山崩地裂, 造成长江三峡地裂溃坝而剑门关山峡山崩堵塞的组合, 引起盆塞海下面的长江三峡溃坝, 而盆塞海上面的渭河与嘉陵江连接的通道剑门关山峡的重新堵塞, 黄河重新向东流入大海, 那么巴蜀盆地的盆塞海就会干涸, 发达的盆塞海文明大部分就会向中原转移。以此类推第一次长江三峡上面的盆塞海地裂大溃坝, 发生在良渚河姆渡文化产生之前; 第二次同样的长江三峡大溃坝, 发生在江汉湘楚文化产生之前。

而今天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 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 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他认为,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 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正如公元前 5 世纪希腊人, 19 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公元前 5 世纪, 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 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 长达 30 年的战争最终毁了这两个城邦。

而自 1500 年以来,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 15 例, 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 11 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 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 1914 年和 1939 年, 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日本崛起之后, 就想挑战欧洲维京人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 确立以日本

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但科商说明是本无“修昔底德陷阱”的。

2015年习主席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习主席醍醐灌顶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反驳说：“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指出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 and 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华夏（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伦（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四大古文明。其实是统一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早已在民族、城邦王国间的征战和残杀中灰飞烟灭，仅有中国的华夏文明，能绵延数千年，得以很好传承至今，就是证明。古巴比伦文明衰亡最早，现在所说古巴比伦文明，主要指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古巴比伦的兴衰是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现在在伊拉克一带，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又叫两河文明。

公元前3000年，巴蜀人的一支族群迁移生活来到这里，被称作苏美尔人。在这富饶肥美的平原上，类似古巴蜀山寨城邦文明，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独立的城邦国家。到公元前1895年阿摩利人灭掉苏美尔乌尔第三王朝后，建立起强大的巴比伦王国，开创古巴比伦文明。经历了300年被赫梯人灭亡，古巴比伦文明消失了。赫梯王国兴衰是公元前1595年--公元前626年；在公元前1595年，北方维京人入侵者赫梯人，灭掉古巴伦王国，建立起赫梯王国。由于常年征战，特别与埃及近百年的战争国力下降，在公元前13世纪赫梯王国解体，成若干个城市小国历经900年，后被日益强大的亚述帝国毁灭。

亚述帝国兴衰是公元前626年--公元前558年；到公元前626年迦勒底人那波帕拉沙尔，建立起新巴比伦王国，历70年，在联合米底人攻陷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后，亚述帝国也彻底灭亡。波斯帝国的兴衰是公元前558年--公元前400年；公元前558年伊朗地区强大的游牧民族建立波斯帝国，经过近20年战争，征服了吕底亚、大夏和新巴比伦王国，成两河流域的新统治者。波斯是个落后但十分强悍的少数民族，它居然征服了比它先进的古巴比伦、埃及、印度三大文明中心，并统治近200年，这段历史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希腊文明”。

马其顿王国的兴衰是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46年；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领导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帝国，经过10年征战将波斯帝国灭亡，并带兵攻占埃及。在统一中亚地区后，东征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在波斯原有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地跨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的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成几个独立国家，各自沿着自己方向发展，到公元前146年马其顿被在意大利崛起的古罗马国打败而结束。罗马帝国的兴衰是公元前146年--476年；罗马继承了马其顿时期的古希腊文化遗产，建立起庞大和更先进的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古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西至西班牙、高卢（法国）与不列颠；东到中亚幼发拉底河上游；北至莱茵河、多瑙河一带；南到非洲北部古埃及，面积达5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世古代史上最大的君主国之一。

古罗马与中国汉王朝关系密切，张骞出使西域就在这一时期。罗马后来由共和国改封建帝国，最高统治者自称皇帝，也许是学习的中国。古罗马中后期，帝国处在皇室宫廷阴谋和相互残杀，及持续对外扩张和各部族的混战中，经历600多年被斯巴达克斯不断反抗暴君的斗争中灭亡。这期间处于奴隶制社会的罗马民主制度得到高度发展，公元前450年世界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在雅典问世，开创民主政治的先河。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自己的日耳曼雇佣军叛变所灭。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兴衰是公元476年--1453年中世纪时期；公元286年罗马皇帝戴克里把帝国一分为二，到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乌斯，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交给他的两个儿子。西罗马帝国首都在意大利米兰，由霍诺乌斯管理，并于公元475年灭亡。东罗马帝国首都定在君士坦丁堡，即现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由阿卡迪乌斯管理，东罗马帝国后来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1453年，后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灭亡。

古埃及文明起源於非洲尼罗河两岸。在公元前5000年，在尼罗河沿岸的埃及人，是游牧民族。尼罗河上游叫上埃及，下游叫下埃及，以孟菲斯为界。到公元前31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前后共经历31个王朝。最大特点是，多次被外来的入侵者占领和统治。古埃及文明宣告终结，是公元前333年马其顿亚历山大，继波斯人之后统治埃及，完全希腊化长达300年。公元642年阿拉伯帝国占领并统治埃及，直至1258年阿拉伯帝国被蒙古军队灭亡，所以埃及至今一直信奉伊斯兰教。从公元前333年马其顿占领并统

治埃及后，分别被罗马，阿拉伯帝国占领，占领者早已把古埃及文明摧残得荡然无存。如今在埃及的土地上，除了法老们的陵墓金字塔，尼罗河畔的狮身人面兽，古埃及文明早已灰灰湮灭。

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实际上在《盘古王表》记载的“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6210--5770年，在远古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巨灵氏，句疆氏，樵明氏，涿光氏，钩陈氏，黄神氏，巨神氏，犁灵氏，大隗氏，鬼隗氏，掩兹氏，泰逢氏，冉相氏，盖盈氏，大敦氏，云阳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等22支族群中，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南面地段的，就有少部分族群人在苦行僧式练功的头人的带领下，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向现在的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印度的西北部迁移---这就是公元前2300年生活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人的来源。是远古联合国中南迁的原始部落游牧民族，所以学习到文字及青铜雕像等较高水平影响的技术，进入农耕的哈拉巴文明。但在公元前2000年遭雅利安维京人的入侵，到公元前1750年时，哈拉巴文明已经消亡。现在所讲古印度文明，应是发源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

但类似吠陀时代的公元前1800年印度南部的恒河流域，已进入“吠陀”的前期，称为的“犁俱吠陀”（从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000年）和吠陀后期（从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00年），也仍然保留有远古联合国“叩向自身时期”西南面部分族群中苦行僧式练功人的影子。而且社会进化出现阶级分化，分为四个互纳尔等级的社会阶层。

就是印度持续到如今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的原因。种姓制度形成后，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种姓，还不能跨种姓通婚。

到公元1526年--1858年的莫卧儿王朝时，蒙古人巴布尔于1526年打败德里苏丹最后一位国王后，建立印度最大封建王朝---莫卧儿帝国。再到公元1858年后，印度后被英国占领沦为殖民地国家，直到1947年在圣雄甘地领导下，印度才获得独立。

6) 从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说螺祖科商

用“科商”研究螺祖解答“李进难题”，把盐亭说是“螺祖诞生地”，这与国内其它省市争“螺祖诞生地”的各地还有一点不同，是同时分清“螺祖教民育蚕”的民间传说，与远古历史真实“科商”进程的区别。这就是把“螺祖教民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类比袁隆平院士引领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发展的“科商”在研讨。这是为啥？

在我国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遗址，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同时期分等级墓地、祭坛，一系列以象征其信仰体系的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为其

内涵及价值提供了有力佐证，以及此地的农业经济在稻作之余，良渚的先民们还学会了使用多余的稻米酿酒。除了农作物之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竹编器物和丝麻织品。如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已经有丝织工具的图像。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已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面对另一个话题是，延续了一千余年的良渚文明虽然灿烂辉煌，为啥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忽然消亡？

其次，在远古连尼加拉瓜和拉伊尔的历史都流传在这些地区，虽然未使用通常意义上的货币，但已采用纺织品作临时货币。因为他们的先民有的懂得用石头打制树皮等植物纤维，纺线织网做衣服；有的懂得用棕榈叶纤维，织成精致的贡布。古埃及6000多年前已出现了麻布。古印度5000多年前已出现了棉布。另外，笔者在家乡盐亭收集螺祖民间传说，遇到很多人对螺祖“教民育蚕”的“科商”从哪里来？回答不出来，于是他们也如同各地争螺祖诞生地都是大同小异：像盐亭螺祖育蚕的故事---只从打“智商”牌、“情商”牌的真实，才被一批人认可，才能说明中国古代有科学一样---相传远古时螺村山有一家人生下一女，取名螺凤。当时人间还没有衣服，以岩洞栖身，吃树果野菜。螺村山长有许多桑树，螺凤每天摘果孝敬父母吃。

一次螺凤没采着果子，又渴又饿又累，又不敢空手回去，就在大桑树下哭起来。哭声直冲天庭，玉帝拨开云雾看见凡间一孝女在树下伤心哭泣，就发了善心，命七彩仙将罪仙“马头娘”带下凡间，变成天虫吃桑叶吐丝，为民造福。又饿又渴的螺凤，发现果子掉下来，拣起来放到口里一尝，又香又甜。从那以后，螺凤每天都要出去摘桑果。时间长了，螺凤发现有虫在吃桑叶，后来竟吐出一根丝，还做成了网子。她觉得很奇怪，就顺着网头，把丝拉出来。这样越拉丝越多。她把丝拿回去，给二老做睡垫，暖和得很。螺凤想，要是把这些细丝编织起来，那该多好。她就再将拉出的线，以十字形编成很多方块，由小方块连成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丝披在父母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后来，螺凤将摘下的网茧拿回去，不久发现蛹变成蛾。蛾子交配后，生下很多虫蛋。螺凤把虫蛋保存起来，观察它的变化。第二年，她将虫蛋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编的浅筐内，不久变成了小虫子。她把这些虫放在家里，每天给这些虫弄桑叶喂养，等养大了后让它做网子，再抽丝。这件事一传出，邻近的百姓也来学养天虫.....笔者不是说这类民间传说、神话不真实，而是说人们都共同只看重生活的“小环境”，没有考虑“大环境”。

即使像西平从螺祖与黄帝的婚姻考虑，认为螺祖只有出生在河南，离黄帝近，婚姻才有可能，其

他嫫祖诞生地都离黄帝远,争嫫祖诞生地就不真实。但在盐亭有关嫫祖的民间传说、神话外,笔者还收集到“天垣盘古王表”、歧伯是嫫祖的舅父、夸父精卫是嫫祖的父母等传说,而且和笔者亲身经历印象难忘---解放初笔者还在童年,陪伴母亲在村里水沟边洗衣服,常看见一群群灰黑花色的类似黄豆雀的小鸟雀,沿水渠飞翔出没,笔者问什么鸟?母亲说是叫“精卫”。母亲没有文化,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其次,那时村里还有临时用煮饭的铁锅,和简易木架+踏板+转轮自家缫丝木机的人家,看到大人一手用长竹筷子挑动热水锅里的蚕茧,一手理丝;一只足踩踏板,不但缫丝的轮子转动,而且木架上竖立的长杆端做的木鸟也在转动,并发出“拐乖阳”的响声,如同家乡农村春天里早晨的布谷鸟的叫声。

笔者家乡农村,把布谷鸟也称“拐乖阳”。笔者好奇问大人们:“为啥装个‘拐乖阳’?”他们也说是“精卫”鸟。这种缫丝也许家乡80岁左右的老年人都见过。现在明白,那是纪念嫫祖的父母夸父和精卫---夸父追日一去不复返,精卫在寻找丈夫。奇特的家乡天垣远古得到的印证是,1961年笔者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父亲当时还是村上生产大队的副主任,他带社员在如今天垣盘垭“盘古庙”旁边的石坡修建“氨水池”。一天中午回家吃饭,父亲告诉说:“今天挖氨水池,挖出板块残缺的石碑,上面的文字真奇怪,像传说的古文字鸟爪子和蝌蚪图形”。当时农村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再加上搞阶级斗争,深怕出事,也就不了了之。2019年年初,笔者接到成都有位女士打电话来问,她在寻找何拔儒先生曾用过的“盘古王表”龟碑的临摹拓片,还能找到吗?笔者只能告诉她:“不知道。唯一的办法是找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披露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6000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说是来自甲骨学者的天津王襄老先生公布的一块从盐亭县得来的石碑,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而刊出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也许与此有关”。

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或者说:“真有科学”,只是没有被部分现代人“发现”、“认定”和“视而不见”---如中医传统的“阴阳”、“五行”概念,如果分别引进“量子起伏”的卡西米尔平板对效应和“量子交流”的“柯召-魏时珍猜想”理论---“空心圆球内外表面不撕破,能将内表面翻转到外表面”,请证明---联系智能手机和二维码支付---手机类似一个“膜面”,照扫的商家的二维码平面类似平行另一个“膜面”---“量子信息交流”移动支付“新型卡西米尔效应”的兴起,使用手机刷卡坐车、买东

西等都很便利---也使中医理论得到长足理解。对历史不懂,对中医不懂,对世界医学和基础科学前沿现状不懂,偶尔“崇洋媚外”、“仇洋排外”---汪品先院士说是有可能治理的。

联系华夏文明“嫫祖教民育蚕”,即使《淮南子·说林篇》记载“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以及南宋《路史》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嫫祖为帝妃,始教民养蚕制丝,以供衣裳”,即约公元前5070-4170年立足山海的女媧氏时期,已发明桑蚕缫丝,并使用帛币,也还不是很普遍。正如中国水稻栽培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然而袁隆平院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稗育稻开始,引领着我国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22年间为我国突破增产3300多亿公斤粮食,仍不失为一位水稻发明家,而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5000多年前的嫫祖在女媧之后普及发明桑蚕缫丝,正类似今天的袁隆平院士。按“科商”定义,追寻前沿科技原理思考,要么是有理论创新研究的提出,要么是有组织应用收获的实在。从后者说,袁隆平院士和嫫祖元妃都有“科商”。

从欧洲“维京人”与中华“天下人”的“科商”划段区分来说,西方资本主义“以工促农”生产方式的“科商”诞生和对外扩张,才打破嫫祖“以农带工”生产方式的“科商”---嫫祖开拓桑、蚕、茧、丝、绸、销,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实现农业与工业的现结合---这种“以农带工”生产方式的“科商”,从嫫祖延伸到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既然不能指望传统的“以农带工”或“以工促农”生产方式的“科商”,搞出石破惊天的技术和消灭战争,“维京人”与“天下人”的统一,只能是如2019年7月8日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举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讲的: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巨变,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主张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毫不动摇地推进经济全球化,构建合理、有效的共商、共担、共治、共享国际秩序。现在网上有篇公号文章《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奇文共赏想说的的问题是: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名不副实;“给我们米饭吃”的人,除了袁隆平还大有人在;袁隆平的成就被“过度放大”,应该被“暂时遗忘”,把“舞台”留给其他科学家。

杂交水稻属于基因学说原理的应用,袁隆平虽然不是基因学说原理的提出者,但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即使不说是“科商”,那么他在对“基因学说原理”的理解、敏锐的洞察、超强组织和坚定执行上,有没有过人的“科商”,让业界对袁隆平佩服的?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

所长李平教授说：受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我国当时与国际科技界基本为“零交流”。袁隆平院士的原创性发现，在于开创了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扬州大学潘学彪教授说：“1971年找到雄性不育系，1974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此后成立‘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6年我国就实现了三系配套大规模制种。不到六年时间，在国际上都尤为惊人”。安徽农科院研究员朱启升教授说：“袁先生是杂交稻研究领域的‘旗手’和战略家。在他思想指引下，科研工作者才知道怎么去寻找和创造不育、保持、恢复系等材料，进而培育杂交稻组合”。

以上专家虽然肯定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上的功绩，但并没有说明袁隆平在“基因学说原理”的“科商”高过他们——其实“科商”定义已经挑明存在“意识形态划线等暴力相威胁”。“以苏解马”以“东西方对立”为“科商”，并没有获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存在“虚数”物质超前认识的“科商”，而是拱手把一些自己同胞的前沿科技原理的发现，送给西方，这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例如，米丘林学说部分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短期环境改造能改变物种的“李森科发挥”，能否打倒代替西方的“基因学说”，并没有通过“东西方交流”的“进攻性马”类似华有的实践，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强行推开，后来以失败告终；在我国至今在存在反相反量反中医的极端“科商”者，而不重视类似“柯召-魏时珍猜想”的引力量子学创新等，也是“以苏解马”遗留下的惯性。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是百多年西南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的“科商”过人在哪里？实际就在对基因学说的理解上，袁隆平懂英文，他在大学的外文书刊中自学知道摩尔根的理论，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很稳定，但麦克林托1947年提出的基因可移动的“转座因子”理论，是1932年发现类似我国农村说的“花包谷”——某些玉米的颜色会跳跃一样改变位置，而麦克林托已潜心观察了15年。西南农学院一位姓蒋的教授，1930年代留学日本掌握家蚕基因育种，回国后在西南农学院讲授遗传基因困难重重，直到1957年被错化“右派”放去“劳教”。1980年代蒋教授获“平反”已经残废。1950年代初蚕茧有两种颜色：黄色和白色。而野外蝴蝶的颜色更是多彩。这对大学时代袁隆平的“科商”是一次激发。2016年袁隆平院士谈过“转基因”，有人说他想搞“转基因食品”。其实，“转基因”分为“人工基因剪接”和生物间自身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袁隆平开创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稻，是属于“后者”；至于人工基因剪接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问题？不是袁隆平的

科商主攻的对象。

都世民教授对笔者说：“科商概念在百度网没有这个关键词，一个科学家能否被社会承认？是天时地利人和所决定，不是贡献所决定。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概念，很难说清楚”。都世民教授说对了一部分——百度网不是科学编写的垄断，况且百度网本身就有一种封闭性之嫌。其次科商的定义本身就强调后天的学习，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复杂分化的说服力，而不是“学霸”论天下。例如西南大学公布的袁隆平的学籍卡和大学成绩单，袁隆平1950年入读西南农学院（后并入西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53年毕业。他在大学4年8个学期的平均成绩（百分制）是：76.5、70.8、74.9、71.3、72.1、76.4、73.8、75.5。重要的专业课成绩是：植物学（一上）65，（一下）75；农场实习（一上）67，（一下）75；作物栽培学（二下）75；新遗传学（二上）63（二下）63；遗传育种学（三上）72。为啥袁隆平不是“学霸”？“科商”有眼。

1953年大学毕业时，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安江农校。在当年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如果他是“学霸”，那么也许会与他同届毕业的学霸们一样，很可能留在大学担任老师。袁隆平没成“学霸”却“科商”有眼。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教授说：“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但卢晓东博士不赞同向仲怀教授的解释，他说：“我们不能说学霸们的实际能力不高。这个简单的评论并没有抓住科商要害”——“米丘林学说”是遗传学中的“范式陷阱”——卢晓东博士对“以苏解马”一针见血。

卢晓东博士说：“1949年后，米丘林学说很快成为中国国家公认、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立即进入了农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高校教学中，成为相关学科的主要范式”——米丘林学说构建的“范式陷阱”危害是：“学生在既有的旧知识范式之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好、掌握知识更精确、考试成绩越高，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很可能在认知基础上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范式陷阱渗透在“新遗传学”等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认知方面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非常幸运的是，袁隆平没有陷进去。“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让中国和苏联的农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20几届的学生都受到影响。那些基础扎实、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容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可能精力充沛、能力高强，但却因为少了对教材、教学和理论的怀疑，而在基本方向上形成了错误认知，因而难以在后期研究、实践中，轻易地改变方向。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但“学

霸”不会认账；袁隆平一旦引路，他们跟上后就争功劳。

再看争嫫祖诞生地，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若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从“嫫祖教民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说过去的；若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符合现代人“口味”的“现代”科学，是说得过去的：没有“盘古王表”，就没有“中国化”——这与从古到今人类开创科商凝结的科技原理起的变不变有关。“盘古王表”联系女娲造人和伏羲造八卦等传说，可以认定人类开创科商凝结科技原理的起源时间，最早是在“立足山海时期的约公元前5070-4070年年”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远古联合国时代，代表人物就是女娲氏和伏羲氏。从远古联合国的“全球移民”、“世界贸易”来说女娲、伏羲等传说英雄人物，他们类似既是远古联合国的“秘书长”、国王，又是盆塞海世界贸易中商船商队的船长；山寨城邦的首席执行官、帮主、寨主；还是市场经济的商人、老板、厂主。天时地利人和强迫他们善于长期的仰观俯察，对发现发明科技原理是小事一桩。

例如，玻璃透镜的发现发明可从观察露水珠的放大现象，到类似四川平武等大山中有天然的水晶石矿，联系河流中有冲击出的鹅卵石，同理，鹅卵石状的天然的水晶石球，女娲、伏羲等船长、商人、老板、厂主也就能捡到。做望远镜和放大镜是商品制造，以及盆塞海洋中商船商队的需要，需要对发现发明出望远镜和放大镜是非常可能的。再具体地说，“女娲造人”类似“物质造人”、“基因造人”、“量子论”，这也许是看到蚕蛾对尾交配、产卵、孵化小蚕、吃桑叶变大蚕、老化作茧子等变化循环，使女娲明白的“桑林生臂手”，而不是“神创论”。生活在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的鼎盛时期的伏羲，在教人结网捕鱼，遇到湖塘水面上的旋涡，以及教人制土陶生火做饭，看到锅中沸水的翻滚时，就已领悟和觉察到了圈态的线旋。为了表达和传授这一数学概念，他动了不少脑筋，例如他把摆卜爻文字用的草节茎棍带来的蓍茅草叶，圈起来扭转比划，终于发现了一个我们不妨称之为伏氏几何的智慧现象。用基础研究的话来说，就是“代数几何”——湖塘水面上的旋涡、锅中沸水翻滚的圈态线旋，演变对应易经的太极图徽所积淀的东西，现在反过来倒推再看太极图，这种“太极体”实际是今天基础研究的“量子”和弦论圈体。而摆八卦卜爻阴阳用的三条、六条横放的平行线，取两条平行线对应今天基础研究的“卡西米尔效应”平板和虚量量子起伏波动看，实际才能真正解释清楚《易·系辞》中说的一些互联互通的符号动力学效应。

再解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已有丝织

工具的图像；延续了一千余年的良渚文明，为啥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忽然消亡？道理是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的科商产生科技原理的中心，在远古联合国的巴蜀盆地。河姆渡和良渚文明说到底还是盆塞海溃坝，古长江水流向东入海的河姆渡和良渚地区，灾难造成远古联合国派大量的能工巧匠和劳力、物资，到东海沿岸地区救灾，团结起那一带的古人修建城墙、排水渠等大工程，以及生活、生产物资的丰富、鼎盛，留下内部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矛盾等痕迹。等到公元前2300年前后在盆塞海彻底干涸，迁徙转移到的中原文明，女娲、伏羲等的“科技原理”变为老子、孔子等的《易经》、《道德经》和《黄帝内经》等阐述的“0”变1、2、3等万物的“无中生有”、阴阳五行、气血经络等隐、显性传输，以及巴蜀的“宽窄学”。再到新中国解放产生“柯召--魏时珍猜想”的类似庞加莱猜想外定理、量子“三旋理论”等。没有科商产生科技原理的中心的河姆渡和良渚地区文明，消亡也很正常。

这也正像古希腊文明的出现科商产生科技原理的中心，也与在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就有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远古联合国时代的一部分产生科技原理的科商领军人物，迁徙转移到古中东、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等沿海、沿江地带一样，即超越了我国中原文明而产生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现代”科学解读一样。

7) 从任正非总裁的华为说嫫祖科商

科商和智商、情商不同，科商类似生物基因作用从古到今是不变性。变的类似只是生物的水平、发挥和组织应用收获的实在性。

科商是自然进化阶段的产物，受控自然全息的约束——具体起源于约公元前5070--公元前4171年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远古联合国的女娲、伏羲鼎盛时期，所以科商这以后组织应用收获实在型居多。例如，量子起伏的“藏象论”和“0”变1、2、3等万物的“无中生有”、阴阳对称破缺的“藏数论”等，是不分维京人和“天下人”，国家、民族、人种，即使语言、文字不同，表达的方式方法不同，但凡是被时间、历史、众多检验证实的人类自己发现发明的基本科技原理、公理，类似自然国学分为的“藏数论”和“藏象论”，本质都是统一的。从任正非总裁的华为说嫫祖的科商，是因为如果说女娲时代已经出现桑蚕发明，嫫祖是在这基础上有类似袁隆平院士搞杂交水稻等发明的提高推广，解决了广大人群吃饭难的“科商”；同时也类似华为任正非总裁在2G、3G、4G手机的基础上，组织攻关推出5G智能手机和刀片式基站，铺平了东西方高科技信息交流差距的“科商”一样，但嫫祖科商似乎与“化干戈为玉帛”更直接一些。

赵蕤为盐亭嫫祖山嫫轩宫写的《嫫祖圣地》称：

嫫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这里嫫祖的“科商”即使超群，但当时嫫祖面对发明野蚕家养，还有《嫫祖研究》一书中《嫫祖年谱》称：“公元前3140年，嫫祖轩辕寻找马头娘、菀窳。嫫祖参与发明养柞蚕”。以及元朝王祜的《农书》讲：“汉祭菀窳妇人、寓氏公主，蜀有蚕女马头娘，又有谓三姑为蚕母者”等，说明当时和以后与嫫祖竞争“教民养蚕制丝”就有“菀窳妇人、寓氏公主、马头娘”等很多杰出妇女，也说明李进难题“嫫祖诞生地除绵阳市盐亭县外，国内其它省市也还有争诞生地的”，事出有因---类似学雷锋。而且嫫祖与“菀窳妇人、寓氏公主、马头娘”等教民养蚕制丝的很多杰出妇女的科商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嫫祖年谱》称：“公元前3126年，嫫祖谏诤黄帝，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确立发展经济的道路.....公元前3124年，为发展蚕桑，嫫祖轩辕北上巡视东北三省。公元前3123年，为发展蚕桑，嫫祖轩辕南巡视江西、湖南.....”---化干戈为玉帛，永远的嫫祖，产生了永远的“科商”。

这一点，今天在“天下人”任正非体现得更明显---永远的任正非，永远的“科商”，这可以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华为总裁任正非接待中外媒体记者发表的一系列谈话来体会。例如他说：

A、欧洲在科技基因上还是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根本是数学，世界上数学最发达的是两个国家：第一是法国，第二是俄罗斯。纪尧姆·格哈雷问：虽然法国有这么多研究者，问题是过去40年间没有一家公司成为巨头，而华为、谷歌、阿里都是在过去40年间崛起的，您怎么看？任正非说：基因还在，但是基因不能自动转变成组合体，这就需要企业家和政府合理地推动。我们公司的生产系统是使用法国达索的软件，怎么说欧洲不伟大呢？是很伟大的。你们去看一看我们的生产线，回去采访达索，怎么华为买你们的产品用得那么好？法国是一个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国家，法国以数学为中心，是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区，这与拿破仑在几百年前确定“数学立国”有很大关系。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数学，我们在人工智能上要加大发展，在法国的投资发展还会继续加强，继续深入。现在我们刚刚初步体会到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手机的照相技术目前是世界上最好的，其实就是法国的数学家设计的，用数学的方式合成图像。未来人工智能将会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还要吸纳更多优秀的数学家加入到我们公司。“一切新产品和新工艺都不是突如其来、自我发育和自我生长起来的。它们皆源自新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新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则必须来自最纯粹科学领域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如果一个国家最基础的前沿科学知识依赖他

人，其产业进步必然异常缓慢，其产业和世界贸易竞争力必然极其孱弱”。

B、任正非的“科商”再一次昭示：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划时代的科技和产业创新，必定源自划时代的思想创新。唯有创新的思想才能激发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思想创新的重要性高于一切。正如伟大的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所说：凡是人能想到者，必有人能实现之。任正非总裁说：幸亏世界上还有爱立信、诺基亚能担负起人类5G时代，我们是高兴的。排斥我们的国家也不会没有5G使用，所以就像我赞赏苹果一样，我也要赞赏爱立信、诺基亚。严格来说，爱立信、诺基亚是我们的老师，交换机是一百多年前爱立信发明的，诺基亚原来是做橡胶木材的公司，上世纪是全世界手机做的最好的公司，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尊敬老师。5G标准来自土耳其教授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数学论文，我们投入了几千名科学家和专家来分解这篇论文，全世界其他公司也投入了几万名科学家和专家，努力去做出5G的标准来了。土耳其教授写了一篇论文，但他不知道论文有什么用，然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专家一起把它做出5G来，这位土耳其教授本人也感到震惊。

C、任正非总裁还说：5G将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就是一个工具。三位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他们已经是人工智能理论的领袖了，为什么加拿大不能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袖国家呢？如果加拿大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形成能力，假设人工智能辅助人类提升十倍的生产力，那么加拿大就相当于变成3亿人口的工业大国。2017年我去加拿大，三位人工智能之父，我见到了其中两位，另一位当时不在加拿大。现在美国、中国都在人工智能领域猛追，加拿大有先发优势，一定要抓住这个战略机会。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改变在加拿大大规模投资的策略。记者问：在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有三位比较资深的人士，他们三人以前都在北电工作，包括他们的下属也有一些是在北电工作的。华为是不是把北电的技术偷过来了，并把他们剩余的人招过来了，然后在加拿大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逐步发展壮大？任正非总裁说：是北电破产以后，我们招聘了北电的一些人员。那时北电并没有现在的技术，只是有人才，人才失业之后要再就业，这永远都是必须的。北电破产的时候，实际上世界连3G都才刚刚开始，经过3G、4G到5G，这些人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了，作为人才，他们头脑里的思维方式是有贡献的，但没有知识产权问题。北电当年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光传输容量提高到了10G，但由于IT泡沫的破灭，把北电拖垮了。我们现在的光传输能力，已经做到了800G。当然，我们肯定是踏着前人的脚步往前走，但这没有知识产权问题，是新

的创造。我们曾经想收购北电，最后因为商业考虑也没有做。

8) 从郭光灿院士的量子通信说嫫祖科商

从嫫祖公元前 3083 年随轩辕南巡死在路上以来，“天下人”的科商坐了 5000 多年的冷板凳。发展进化到今天的“科商”是与“量子霸权”相连。一个尖锐的问题是，马克思和列宁开辟了 20 世纪人类革命的新纪元，但马克思和列宁承认数学中虚数存在的“科商”，并没有得到“以苏解马”的重视，以致造成类似反相反量反中医的极端表现的“反科商”，被当成硬“科商”，作为对抗所谓“伪科学”的口实，在老中青一代一代人前仆后继出现。这种发展演变中的转折，在维京人和“天下人”早期内部出现的微妙分歧不大。

例如，东西方古代的“炼丹术”实验，以及“天下人”太极、阴阳和维京人的“以太”等概念，虽说也藏象藏数类似与科商的基本科技原理、公理有联系，但与 16 世纪开始成熟起来的科商，根本的不同是后者把基本科技原理、公理和实验方法广泛交给人民群众去学习、重复，且成效被精炼的基本科技原理、公理和实验方法，已经是通过学校专科、专业机构、专门书刊，在一代代没有间断地传授、仿效发展，并有国家、国际的权威机构的监督或评判。即使远古嫫祖发展女媧的养蚕制丝的科商，也不同于女媧。嫫祖是广泛交给民众去实践收获，所以嫫祖比女媧被认可为“先蚕”，也才能化干戈为玉帛。

当然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的《大学是一段用来修补世界观拼图的安静时光》文章另有分析，他说：世界观的结构由真理之维，伦理之维、审美之维这三个要素的圆面积交集的外延，构成了一个人的认知视界（或格局）。因为事实大体分为实证事实与哲学/概念事实；实证事实大多是源于生活经验，数量少质量不高；相反来自哲学/概念事实则依赖于认知格局的大小。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认为：完美圆周运动事实和匀速运动事实，这些都是哲学/概念事实。正是这一套世界观体系支撑了古希腊的科学认知，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则缺少这些哲学/概念事实，这一切源于我们文化所塑造的世界观拼图的差异。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16 世纪开始），西方人的世界观拼图面积远超我们的世界观拼图面积。

李侠教授说：世界观拼图构成的圆面积越大越好。如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世界观拼图的面积 S_1 小于以牛顿理论为基础形成的世界观拼图的面积 S_2 ，而 S_2 小于以爱因斯坦相对论等成果为基础所形成的世界观拼图的面积 S_3 。还可推论：宏观层面拥有世界观拼图面积越大的时代、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科技发展与人类创造力的发展都呈现

出明显的优势，反之亦然——拿中国的教育来说，长期鼓励与重视数理化等学科（真理之维的内容），导致中国学生在这个维度上的表现不输给世界上任何国家，但在伦理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教育方面薄弱，导致中国学生的世界观拼图结构扭曲并出现认知格局严重狭窄化倾向（即圆的面积较小）。李侠教授说反了，要害是回避了“科商”与政治的联系和区分。政治曾宣传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

从郭光灿院士的量子通信说嫫祖的科商，是他 2019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坐了 20 年冷板凳，我们离“量子霸权”还有多远？》一文——这是他在《中国经济大讲堂》的演讲，他把“科商”发展演变中的转折，联系“量子霸权”说到了量子信息计算、传输的要害。但说嫫祖的科商从嫫祖上溯到伏羲、女媧，他们都并不知道现代生物学的“基因”概念——这类似今天量子纠缠信息隐形传输中，存在里奇张量引力量子虚数超光速一样不可思议。但科商是一种奇妙的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进化集群现象——不是“穷则思变”闹革命了或致富了，就一定有科商。作为一种基本的科技原理、公理，看似简单，但即使国家有几亿人、时间有数千年，也难“冒”几个。

其次，政权和掌权者有换位，“科商”发展也会出“反科商”，但这不是暴力和法院、检察院能解决的，而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解决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导，给机会实践见分晓。这也正是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郭光灿教授与潘建伟教授等团队之间，存在认识分歧解决的归宿，也是遵循从嫫祖上溯到伏羲、女媧的“科商”与后代“反科商”之间存在认识分歧昭示解决的归宿。因为郭光灿院士说：什么叫量子，凡是运动规律遵从量子力学的那些客体，统统叫量子。一个遵从牛顿力学、电动力学这经典物理的，叫做经典世界，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确定的世界，而量子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概率性的世界。只有通用量子计算机得到实际应用，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宣称量子时代到了。这是郭光灿院士才认可的“确定的世界”。但郭光灿院士似乎并不认可潘建伟院长说的事实——2016 年 8 月 16 日，经过中国科大、上海技物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光电所、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等十多个团队历时 5 年的合作，“墨子号”成功发射，提前一年完成星地量子纠缠分发、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地星量子隐形传态三大既定科学目标；近期潘建伟院士与范桁教授两团队合作，研制出 24 个比特的高性能超导量子处理器，超过 20 比特的相干调控，为研制量子计算机迈出重要一步。

但问题类似郭光灿院士不认识量子“奇点”的不确定性——类似王春教授的《星旋态宇宙模型》一

书，开篇就说“奇点”并不完备：“自然力的二重性足以抹平‘大爆炸宇宙’的奇点”---2011年6月18日王春送书给笔者，应该感谢。王春教授是江汉大学余其云教授曾教中学时的学生；余其云教授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现在已经退休。余其云教授说：王春利用十年的业余时间写出这本书，“十年磨一剑”的执着精神难能可贵---王春早在青年时代起，就自学《周易》、《黄帝内经》、《道德经》、《论语》等古代典籍，同时关注现代物理学前沿的进展，为写好这本书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王春教授自己也说：“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身不懈的追求。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碰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又必须涉足一些前沿的科学问题。倘若学历高一些的话，可能不会感到如此艰难。如果说‘智慧的第一涵义是创造力’，那么作者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对于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人类科学事业的热忱关注”。王春教授是亿万中国奋斗者的缩影；他的话也解答了“科商”难题：重视有机自然观和宇宙观的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反之机械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西方，为何能够产生近代科学？因为“在没有完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又必须涉足一些前沿的科学问题”，不能成为“量子霸权”旗手。

潘建伟院长就说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奥地利科学院量子隐态传输世界权威蔡林格教授指导下学习过。他还说：照此，他也是将优秀的学生有针对性地送到国际顶尖团队学习和开展合作，再将掌握的关键技术带回国内。如陈宇翱去德国马普所、赵博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研究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张强去斯坦福大学研究参量上转换探测器，陆朝阳去剑桥大学研究量子点光源，张军去瑞士日内瓦研究单光子探测器……潘建伟回忆说：“当时国内实验室很缺人，不把人送出去学习的话，将来这把火肯定烧不旺。所以尽管国内对人才极度渴求，还是把人送走了……如今随着这批年轻人的集体归国，这把量子通信的火真正烧起来了，他们个个成为独当一面的研究室负责人。而研究超导量子计算的朱晓波，也是从兄弟单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加入创新研究院的。朱晓波团队已成功实现12个量子比特的多体真纠缠态‘簇态’的制备，刷新了超导量子比特纠缠的世界纪录”。

朱晓波自己也说：超导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量子计算方案之一，也是谷歌、IBM等商业公司投入最大的方案。在创新研究院，朱晓波除了自己的学术团队，还有一支近30人的团队为他们提供支撑服务。“创新研究院的作用就像土壤”。潘建伟说，“在单个研究小组中，很多种子只能长成花盆中的盆景，但在创新研究院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

新的模式下，我们希望每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读《星旋态宇宙模型》一书，深感王春教授是亿万中国奋斗者的缩影。笔者近10年之所以读完《星旋态宇宙模型》书后，并没有给王春教授回信，是怕伤害他---“奇点”不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能抹平的。笔者同他中学时代的班主任余其云教授一样，“文革”在武汉读大学。在当时大学的课本里是读不到前沿科学最新介绍。而且武汉市31中李育德老师还在重庆大学的《新物理探讨》杂志上发文说：霍金的黑洞辐射理论只对西方各国的能源危机有吸引力。笔者懂得“奇点”要分清环面与球面不同伦，是自学《漫谈拓扑学》、《微分几何》、《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等书后。

看王春教授说：“在西方，玻尔的‘互补性’、爱因斯坦的‘波粒二象性’、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哥德尔的‘不完备性’都是令人费解的、一时难以接受的新观念，其影响力是革命性的：导致了确定性的终结，动摇了近代科学‘主客二分’的基石。在东方，这种革命性的观念之所以被充分理解、欣然接受，其原因是它与《周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不谋而合。于是，一些思想家、科学家起头从东方科学文化传统中寻找智慧。21世纪，最古老的东方科学与最前沿的现代科学将形成跨时空的完美链结”---但王春教授的“星旋态”和“星旋体”才只是一种球面拓扑自旋态---实际是玻尔、爱因斯坦、海森堡、哥德尔的科学革命的“反其道跟之”。但这能说吗？

我国的科技评奖有几十个项目，都是实在的，都有贡献，都应该获奖。而且基础科技原理获奖还是排在前面的，然而却少得类似可以忽不计。这不是这种科技评奖不对。很多人业余喜欢打麻将，不打麻将的喜欢写诗，这无可非议。而且这正是中国很多人，在伦理之维与审美之维的教育方面，并不是李侠教授说的薄弱的和安分守己的体现。

在《坐了20年冷板凳，我们离“量子霸权”还有多远？》一文中，郭光灿院士说的第一个例子：“量子纠缠可以实现超光速的通信”，正是科商在目前我国难说的“纠缠”。但郭光灿院士说：量子纠缠的例子是A和B，A自旋要么向上，要么向下，只有两种可能，那它自旋到底是向上、向下？不一定，不确定。所以它就有50%的概率向上，50%的概率向下。量子世界就是不确定的，但不管A和B的自旋在哪儿，它们两个自旋总是相反，A已经说是向下了，B肯定向上对不对？如果A不测量，那么B有一半概率向上，有一半概率向下。先测量A，B发生变化，说好像应该有个什么东西过去才会变，那我们现在不做这样的实验，我同时测量A和B，同时测量没有先后了，没有因果了，我不需要什么

传过去了,我不需要任何信息传过去。同时不传什么,发现的结果一样,A只要向下,B一定向上,A要向上,B一定向下,它们总是相反,纠缠就是这个性质。是一种量子关联。所以纠缠幽灵它的本质。有人说我们到纽约去,以后不用买飞机票。他根据的是一个实验叫做量子隐形传态。但郭光灿院士的此说不全。

然而郭光灿院士说:有个物理科学家说把经典跟量子一块儿来用就可以做到量子信息隐形传输。但这个里面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纠缠、一个是经典通信。有经典通信就不会超光速,所以隐形传态,你把一个态传到那儿去,绝对不可能超光速。这是郭光灿院士反对“虚数超光速”,不提彭罗斯的量子引力信息里奇张量效应,存在“虚数超光速”量子信息隐形传输。彭罗斯的量子引力信息韦尔张量效应,是不能实数超光速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郭光灿院士把经典跟量子一块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与量子水、量子按摩、量子鞋垫、量子医学等假的市场量子产品广告相提并论。但郭光灿院士称的迎接的“第二次量子革命”,到来的量子信息技术却类似实数超光速的伪技术。

例如,在郭光灿院士的《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纠缠之谜》一书中,在“超光速狂想曲”这章中的“探寻绝对”这一节,他提出“波函数坍缩过程的规律很可能违背相对性原理,从导致绝对参照系的存在”问题,可成为今天中国最新的既批爱因斯坦又批玻尔---用非连续性批爱因斯坦,用“最小本体论”批玻尔---这也是该书最精华也是最矛盾之处。蒋春暄高工评论说:郭光灿院士这本书是讲“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机等广泛应用,是和超距、超光速联在一起的”。

郭光灿院士念念不忘的“时间分割”和“实数超光速”问题,涉及量子信息隐形传输的所谓 EPR 源现象---从 EPR 源被分成纠缠对的两个量子态,分别到发送者和接收者手里后的时间,接收者是在发送者之前。所以,发送者能把未知量子态与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的合并操作,只能在接收者接收到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的时间之后---这两者静止同时性的非纠缠性时间差,正是郭光灿院士论“时间分割”和“实数超光速”问题的基础---但是对于沿着接收者到发送者方向高速行进观察者来说,彭罗斯认为,则应是发送者测量未知量子态与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合并的时间,是发生在接收者接收到自己一方的 EPR 源缠结量子的时间之先。

其原因是,彭罗斯首创了量子发散态(U)过程和收缩态(R)过程的自主知识产权理论---U过程对应韦尔张量,R过程对应里奇张量。于是彭罗斯用韦尔张量和里奇张量清楚地简化了爱因斯坦的

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也能清楚地说明量子退相干和量子宇宙学的一些难题。当然彭罗斯也没有用虚数超光速直接解释纠缠性量子幽灵,他是把虚数超光速隐藏在量子发散态(U)过程和收缩态(R)过程的纠缠性解释中的---这代表了1935年爱因斯坦的原始 EPR 效应图像。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前沿转向量子信息学应用型学科的研究,实际是用虚数超光速直接解释的纠缠性量子幽灵的。因此彭罗斯才把发送者的测量发散U操作点,和使得位于接收者的R态收缩同时点的这两点的连线,是用过去时联系的非因果量子纠缠态的点画线标注的---这实际就是一种虚数超光速解释。这条过去时联系的非因果量子纠缠态连线,实际在哪里?我们说,就在“点内空间”,它变成了“点内空间”类似毛毯一样折叠的连续的多层膜路,或者一种额外维。这里的“点内空间”,也类似人们常说的“赛博空间”。

彭罗斯教授与郭光灿教授分别代表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量子信息学应用型的两类对立研究,但因超光速是解释纠缠性量子幽灵避不开的话题,郭光灿教授却没有掌握类似量子发散态U和收缩态R的自主知识产权理论,也没有用虚数超光速解释的“点内空间”、赛博空间一类像毛毯一样折叠的膜理论、额外维理论,造成我国“量子力学二次革命”论坛长期部分学者之间不断地死斗---“以苏解马”哲学自主知识产权的实数超光速传留解释,是我国基础科学落后的原因。

那么《盘古王表》求真有没有收获?仅举3例。A、韩国丝绸学会会长朴在明,编辑出版了《世界蚕丝绢年表》---他以1927年我国山西夏县发现的蚕茧科学测定的时间,即约公元前3000年为开始作纪年。那么中国模糊上古历史的惯例,要杜绝类似两岁的嫫祖和80岁的黄帝结婚生子的笑话,很简单又科学的办法,就是以常识统计的一个人能活的寿命的年龄段、能生育的年龄段、能干国家大事的年龄段,来限定比较校对我国惯例的模糊上古历史更精确的误差。于是在十多年间,笔者利用何拔儒破译流传的盐亭天垣《盘古王表》,搜集了全世界亚、欧、非、美、澳洲近百个重要国家的通史,以其中有大约纪年的远古人类活动事件、考古发现和科技发明作比较、鉴别、选择、调整完善。例如我国的考古发现,约公元前3000年前的商代才有青铜器的使用,但乌克兰的考古发现,约公元前6000年前就有青铜器的使用。如果作“远古联合国”看待,青铜器的使用就不应该在约公元前3000年前,而应在约公元前6000年前也有可能。所以《嫫祖年谱初探》在《四川丝绸》发表后,引起吉林省蚕业研究所所长李景洛教授的重视,被介绍韩国和朝鲜,才引起韩国和朝鲜的重视。

B、笔者的《嫫祖年谱初探》最初公开，是在《四川丝绸》1993年第3期上发表的。因年谱中提到：约“公元前3092年，为开辟丝路，嫫祖轩辕巡视东北，并到了朝鲜”。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主席重视朝鲜上古史研究，据《参考消息》报道，1994年金日成主席生前为此视察了檀君陵。因为朝鲜自古就有“檀君神话”，传说天帝之子桓雄天王率领3000人马自天而降，来到太白山顶的一棵神奇的檀树下，造就了古朝鲜开国鼻祖檀君王俭，在平壤市郊江都郡的檀君陵现还存在。尽管日本曾盗掘过该陵墓。在金日成主席的指示下，后朝鲜社会科学院还是在陵墓中发现86块人的遗骨和一些遗物，经现代科学手段的多次检查，证明遗物的年代是约公元前3016年的。这可以说《嫫祖年谱初探》经受了一次严峻的国际考验。

C、在盐亭和绵阳，反对嫫祖的人不说，就是赞成嫫祖的人，也有90%反对《嫫祖年谱初探》。理由是远古历史研究只能“宜粗不宜细”，这是惯例。有的人还讽刺说：“有人连他的妈、他的婆的历史都不清楚，还能知道嫫祖妈、嫫祖婆？”甚至有的说：“四川地区落后，中原先进，嫫祖配已经是皇帝的黄帝，就像今天年纪小的打工妹，嫁给发达地区年纪大的大老板，只能做二奶一样”；而赞成嫫祖的人也说：“连司马迁都没搞清楚嫫祖的很多事情，今天谁还能搞清楚？”《嫫祖研究》一书出版后，绵阳日报社送给了绵阳《剑南文学》杂志的主编谢宗年主编几本。1993年开盐亭县嫫祖研究会成立大会，邀请谢宗年主编作特邀嘉宾参加，他写出《上古文明史的新发现——浅析〈嫫祖研究〉的学术价值》的论文，并打印出了五、六十份，准备带到会上去宣读。后来他回来告诉笔者，他根本不敢宣读论文，只能改作泛泛的发言，并把他打印出了论文带回来送给笔者。他说，他论文中涉及高度评介《嫫祖年谱初探》的内容，到会一听，才知连主宰大会的大部分人也反对“嫫祖年谱初探”。所以他后来在绵阳市社科联的《绵阳论坛》杂志正式发表时，就把这一部分内容删去了。

谢宗年主编当然清楚，绵阳有作家在他主编的《剑南文学》上发表文章，写传说三千年前黄帝到过三台县的三元丝厂那个地方。因此如果说《嫫祖年谱初探》“假”，没有比惯例的模糊上古历史“假”的了。所以直到国家公布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后，这种众口一词的局面才被打破。嫫祖教民养蚕制丝，在远古联合国类似英国开启工业革命之前开

启满山遍野的乡村企业，也到处开启养蚕制丝等原始社会手工作坊的“乡村企业”，而放飞的嫫祖“科商”。但为何以后消失？是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在盆塞海干涸后，转移到中原的黄土农耕文明，不适应养蚕制丝“乡村企业”规模发展。

科技生产力的持续依赖于全球产供销产业链系统的制约，是在形成世界的统一性中产生。“远古联合国”的解体，各国家或民族、群体，通过类似法律手段的克服战争或大的自然灾害等形式，只能艰难曲折。如果中华民族的上古史，存在盘古文明式的“远古联合国”现象，那么可说直到鸦片战争时的这种“天下莫非王土”的远古联合国的追思，才被后来维京人“持剑经商”的全球产供销产业链系统破灭。

因为天下莫非王土的“王”字，不是指“国王”，而是应作全球化“统一”解读。如果宇宙的起源，发生于150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科学家们连宇宙大爆炸时的万分之一秒一秒的事情，都能搞得很清楚，那么中华民族起源不过一万年，就喊“宜粗不宜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融进全球产供销产业链科技系统的表现。对属于“科商”的一些基本科技原理和实验方法，没有近10万到100万粉丝事先形成的兴趣；有实验，甚至论文公开发表，也不能像近100多年来诺贝尔科技奖评审、验证，产生的“以下推尖”的集群效应和集聚效应。

参考文献

1. 文扬，“70年对话5000年”之中华早期文明（1）--（12），“观察者”网，2019年1月--7月；
2. 何新，西方无信史等，“新浪”网“何新老家伙的博客”，2019；
3. 何新，希腊伪史续考，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年；
4. 王德奎、赵均中，嫫祖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
5. 王德奎，“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文史杂志，2000（2）；
6. 王德奎，嫫祖文化研究与经济建设综述，凉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7. 岳定海、王德奎等，嫫祖故里大揭秘，伊犁人民出版社，1998年；
8. 王德奎，绵阳丝绸话沧桑，绵阳日报，1999年10月7日。